



## 【论 文】

# 民族主义、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之纠葛<sup>1</sup>

——1919~1924 年外蒙古“二次独立”问题研究

冯建勇<sup>2</sup>

**摘要：**1917 年俄国国内政局动荡，北京政府趁机于 1919 年夏派遣军队进驻库伦，并于同年 11 月 22 日正式宣布撤消外蒙自治地位。其时，外蒙古的一些下层民族精英分子组建了蒙古人民党，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着手实施民族国家构建的动员，最终在苏俄政府的扶持下，于 1924 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揭示了东北亚地区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外蒙古精英希冀拾起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旗帜，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中国政府基于政治意义上的需要，仍然声称拥有对于外蒙古的主权地位，虽然它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苏俄政府则从地缘政治考量，将外蒙古视为一个天然的缓冲带；日本亦高举泛蒙古主义旗帜，试图拓展利益空间；英国政府则以构建“亚洲边疆”为目标，想象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的关联性。

**关键词：** 外蒙古 撤治 二次独立 地缘政治

## 前 言

根据 1913 年《中俄声明文件》、1915 年《中俄蒙协约》，外蒙古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大致确定了下来：被俄国人强加的“宗主权”关系让外蒙古方面确立了“自治”地位；同样，中国政府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地位亦被确认。至此，外蒙古开始进入“自治”的历史时期。随后，按照条约的相关规定，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地区设置了驻扎库伦办事大员衙署及相关地方佐理办事大员衙署。肇自 1916 年首任办事大员陈箴驻节库伦，北京政府对于外蒙古仍抱怀柔主义之宗旨，陈箴亦持无为主义，与外蒙古地方上层精英相处甚洽，北京政府与外蒙古地方之关系摆脱了此前愈益疏离的趋向，并向日渐转好的趋势方面发展。此外，陈箴与俄国驻库伦领事馆官员亦能和平相处，这就使得外蒙古的地缘政治保持了一个脆弱的平衡。

然而，这种小心翼翼获得的平稳局面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了。1917 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旧俄帝国政府垮台，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开始主持俄国全局。受此事件影响，外蒙古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图景至少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随着俄国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与之毗邻的外蒙古地区直接受到冲击，白俄军队与苏俄红军的武装冲突使得外蒙古地方难以独善其身；其二，辛亥革命以来，外蒙古的独立、自治行为受到俄国人的襄助，伴随着旧俄帝国的覆灭，外蒙古地方精英最可倚靠的伙伴骤然消失，原有的中、俄、蒙政治平衡框架业被打破，这让它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确立新的地缘政治框架，以便能够在此变局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不言而喻，外蒙古地方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局，对于既定的利益相关者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就中国而言，北京政府的历任领导者一意强调中国对于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地位，并且孜孜以求地推行怀柔主义，其目标即在于获得一个契机，摆脱《中俄声明文件》与《中俄蒙协约》之规限，再次将外蒙古收入自己的直接管辖之下。那么，伴随着旧俄帝国势力的退出，中国政府

<sup>1</sup> 本文刊载于《新视角》杂志总第 79 期（2017 年 12 月），第 96-120 页。

<sup>2</sup>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



究竟应当在外蒙古的政局发展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是北京政府不得不予思考的问题。对于另一个利益相关方，即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府来说，亦面临着与北京政府同样的问题：如何认识外蒙古之于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又该采取何种策略予以应对？

有关外蒙古“二次独立”问题的研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供参考。本文将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以往的先行研究讨论外蒙古“二次独立”问题，多数时候将其置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框架下予以考察，有意无意地将本为“利益攸关方”的外蒙古视作一个“缺席者”。给人们的印象是，外蒙古的命运完全由苏俄与中国两个关联方所决定。那么，相关情形是否如此呢？外蒙古人民，尤其是它的精英对于外蒙古独立或与中国关系、苏俄关系究竟持怎样的立场？这应当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重要问题。（2）相关先行研究对于外蒙古“二次独立”问题往往仅从中国、苏俄两个利益相关方的视角进行探讨，忽视了围绕该事件而展开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为此，本文希冀呈现日、英两国对该事件的关注及其策略。（3）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外蒙古统合的问题，自民国以来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利益代表的立场，对此问题的评价不尽相同，本文将尽可能地在此问题置于历史现场，以期对之进行相对客观的考察与评述。

## 一、从“外蒙古撤治”到“撤治外蒙古”

根据民国外交史专家张忠绶的研究，“外蒙古自治官府成立后的翌年，外蒙王公即已有主张取消自治者，并会同中国驻库伦大员接洽，请求中国加封哲布尊丹巴，并以大宗款项援助外蒙”<sup>1</sup>。这表明，外蒙古自治官府成立之初，一些外蒙古上层精英就表露了“主动撤治”的心思。然而，如前所述，1915年恰克图三方协约已经明确规定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彼时的中国政府不敢开罪相对强大的俄国，故取消自治之说终究未能付诸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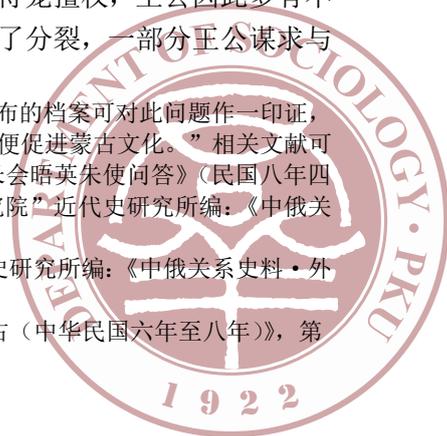
时至1917年，俄国国内政局动荡，先有“二月革命”，后又爆发“十月革命”，白俄军队与苏维埃红军缠斗不休，中国这个北方邻国的实力大大地削弱了。彼时，因为俄国内战，外蒙古地区的边境安全面临威胁；稍后，日本人扶持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声势及于外蒙古东部，谢米诺夫（又译为“谢苗诺夫”——编者注）派人来库，要求外蒙古与内蒙古、海拉尔、布里亚特人一道趁中俄两国无力兼顾之际，联合成国，脱离羁绊。站在外蒙古上层统治者的立场观察，日本人允以蒙古民族之民族自决地位固然美妙，但民族自决“须自身有自由之能力，若借日本人求自由，有何好处。外蒙立国，不独于中国有损，并于外蒙为害无穷，外蒙何苦为之？”<sup>2</sup>此外，外蒙古统治者还担心，与布里亚特人联合成国，后者必定借日本人之力喧宾夺主，王公喇嘛们的既得利益或将受损。故为维护自身利益计，外蒙古自治官府向时任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表示拟“取消自治”，进而依赖北京政府，以谋求中国发兵援救。<sup>3</sup>

外蒙古上层统治者提出“撤治”事，还与1919年前后外蒙古内部的政治生态演变息息相关。原来，依照前清旧制，外蒙古地方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领，王公、喇嘛各司其职，分理管行政、宗教事务；但自治官府成立以来，喇嘛得以参预政治，且恃宠擅权，王公因此多有不满。基于此诸因素，当面对外力干涉之时，外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王公谋求与

<sup>1</sup> 张忠绶：《外蒙问题的回顾》，《独立评论》1936年第198号，第4页。现已公布的档案可对此问题作一印证，当时中国外交部答称：“决不轻易更动外蒙自治制度，但愿取消俄蒙协约，以便促进蒙古文化。”相关文献可参阅《收代总长会晤美芮使法柏使问答》（民国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代理总长会晤英朱使问答》（民国八年四月二日）、《收驻义公使（王广圻）电》（民国八年八月一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1959年，第353、362、450页。

<sup>2</sup> 《收驻库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六月二十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15页。

<sup>3</sup> 《收驻库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20页。



中国取得联系，进而有“撤治”之议。不过，站在北京政府的立场，由于担心引起与他国外交纠纷，故对于撤治事有所瞻顾<sup>1</sup>。缘于此，1919年1月5日，外交部指示驻库伦大员陈毅，寻找时机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另订条款，用以代替1915年《中俄蒙协约》，以便将来承认俄国新政府之时，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的一种。稍后外交部在审阅徐树铮拟定的《筹边办法大纲》之时，亦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外蒙古自治一节，“不惟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表示，国家大信所关，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昔之态度，对中央深表亲赖之意。如近日谢米诺夫勾煽蒙人独立，外蒙官府竟不为所动，足为明证。在我正应一意怀柔，按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毁已成局，不惟阻遏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致来外力干涉，因之数年之功，败于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sup>2</sup>据此可知，这一时期，针对徐树铮提出以强力取消外蒙古自治地位之建议，外交部未予认可。

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向中国南北政府发表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中声称自愿将“俄皇政府自行侵夺，或借日本及他联盟国公共侵夺之中国人民之所有者，一概归还中国人民”，亦即苏俄政府放弃帝俄侵略外蒙古的全部成果。这一表态对于北京政府而言，意味着即便趁此时机对外蒙古自治制度做出调整，亦不会承受来自苏俄政府方面的外交压力；对于外蒙古地方而言，则意味着失去奥援，这难免不让外蒙古王公喇嘛内部充满恐惧，害怕既有的特权地位难以得到保障。为此，外蒙古自治官府召集会议，商讨对策，期间一些王公再度提出“撤治”的主张，希冀在权力的重组中获得北京政府的援助。观察到这一点，陈毅向北京政府建议：“外蒙诚心内向，机不可失，即宜顺势收回。”<sup>3</sup>然而，因为害怕破坏恰克图条约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责任与卷入不必要的外交纠纷，外交部的表态颇为谨慎，惟希冀外蒙古方面以“全体名义”，主动向北京政府提出撤消自治，以消解北京政府外交方面的顾虑。<sup>4</sup>

尽管北京政府在外蒙古撤治事上持保守主义，但这不代表其对外蒙古问题没有做出相应的筹划。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驻恰克图佐理员张庆桐、李恒，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等人纷纷致电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和北京政府，报告边境纷乱情形，请求政府早作准备，派兵驻蒙。1918年2月，陈毅亦致电国务院，内称：“无论蒙人允否进兵，能否负责，乌淪驻兵，万不可缓，请转催参谋部，迅饬察队出驻为要。”<sup>5</sup>北京政府听取其建议，派遣察绥的高在田部驻守外蒙古与内蒙古的边境地带。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即派遣参谋长李如璋及西北军第三旅旅长褚其祥，“驰往库伦，一面和蒙人联络，一面同驻军高在田团长接洽”。<sup>6</sup>同年8月，中央派遣军和外蒙古自治政府军队协同作战，收复了俄国占领达五年之久的唐努乌梁海。此期北京政府通过派遣徐树铮西北军入蒙，就外蒙古政局表明了自身立场。恰如此间北京政府外交部政务司所言：“近年全俄鼎沸政变迭起，俄人既无东顾之余暇，实为我国

<sup>1</sup> 一个可以佐证的史料即是，1919年1月时任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询问北京政府对于外蒙古究竟持何种主张，外交部回复称，政府主张取消1912年《俄蒙协议》，但外蒙古自治地位不宜轻易变更。（参见《外交部致驻美公使电，如能将条约障碍摒除，较易促进文化》（民国八年一月五日），吴丰培辑录：《关于外蒙古问题议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第1辑，第106页。）

<sup>2</sup> 《西北边防筹备处拟具筹边办法大纲·外交部批注》，吴丰培辑录：《关于外蒙古问题议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第1辑，第112页。

<sup>3</sup> 《收驻库伦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八月十四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61页。

<sup>4</sup> 《（外交部）提国务院会议蒙事说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民国八年八月二十日），第471—482页。

<sup>5</sup> 《收驻库伦都护使（陈毅）电》（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66页。

<sup>6</sup> 徐道邻：《〈外蒙问题回顾〉的疑问》，《独立评论》1936年总第203号，第11页。



恢复外蒙权利之机会。说者或主张废止协约或声言取消自治，虽尚未能实行，而外蒙增派兵队，已成事实，即唐努乌梁海边远之区，亦已实行设官，是我国在外蒙已有逐渐恢复势力之势。”<sup>1</sup>

其时，在外蒙古内部，自一部分王公提出“撤消自治”主张以来，陈毅曾与一部分外蒙古王公议定“待遇蒙古上层六十三条”，但并没有获得上层喇嘛的同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发给徐世昌的电文中明白指出：“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sup>2</sup>这间接表明，所谓“取消自治”，不过是部分王公的一厢情愿；对于哲布尊丹巴等上层喇嘛阶层来说，亦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其进入实际运作阶段，并对喇嘛阶层的利益造成可预见的损害，必加以反对。正因为喇嘛阶层的阻挠，外蒙古主动撤治进程迟迟未能推动。<sup>3</sup>迨至1919年10月29日徐树铮进驻库伦，陈毅执掌的库伦都护使署与徐树铮负责的西北筹边使署在外蒙撤治交涉由谁来主导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sup>4</sup>其结果，由于徐树铮兵权在握，外蒙古所有原设办事大员暨佐理员各职一律裁撤，西北筹边使署获得督办外蒙古善后一切事宜的权力。<sup>5</sup>

徐树铮认为外蒙古系国家领土，其本人身为外蒙古长官，自然有弹压地面之责，故力主对外蒙古撤治事采取强硬手段。1919年11月11日，徐树铮在与陈毅会晤中明确提出，撤治以后政权应收归北京政府，“不能以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实”；并且，“政教分设，王公喇嘛不可畸轻畸重”。<sup>6</sup>11月15日，徐树铮亲拟外蒙古自治新条例八条，要求外蒙古官府内务总长巴德玛多尔济签字应承。外蒙古当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最后同意先行取消自治，至于撤治条件，可于将来再行商定。11月17日，外蒙古自治官府向北京政府递交撤治呈文，内称“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计图人民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sup>7</sup>11月22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命令的形式，正式宣布撤消外蒙古自治。

综观这一时期外蒙古地区演绎的历史，大致可以对1919年外蒙古撤治之原因作如下归纳：一方面，因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外蒙古自治官府内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王公不满喇嘛的擅权，投向了北京政府，拥护“外蒙古撤治”；另一方面，还应观察到，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得以保障，乃是缘于较中国实力更为强大的俄国的担保之故，随着1917年以来俄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国家力量的削弱，中国政府借此机会收复此前丧失的主权符合正常的民族国家利益诉求，故于1919年夏派军进驻了库伦。

## 二、民族精英的利益诉求与国家构建实践

外蒙古自治官府的取消典礼于1920年1月13日在库伦举行，乔巴山在《蒙古革命简史》一书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写其亲身经历的这场典礼。根据乔巴山的记述，是日清晨，由绿庙起至大库伦前扎哈河，排列着蒙古兵，由东南至哲布尊丹巴活佛黄宫大门两旁排列着中国武装士

<sup>1</sup> 《政务司关于外蒙问题之提案·外蒙古问题总论》，吴丰培辑录：《关于外蒙古问题议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第1辑。

<sup>2</sup> 《收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汗呈大总统书》（民国八年十一月四日发），《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73页。

<sup>3</sup> 《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98页。

<sup>4</sup> 详情参酌张建军：《西北筹边使及相关问题史事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2-54页。

<sup>5</sup> 《政府公报》，1919年12月2日，第1372号。

<sup>6</sup> 《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86页。

<sup>7</sup> 《收库伦都护使（陈毅）电》（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92页。



兵；大炮三声过后，哲布尊丹巴活佛从侍卫、仪仗及蒙古兵间走出，进入中国兵仪仗队，走向正门，折而东，出中国兵仪仗队，由宫之正门的左门进去；随后，在中国士兵的簇拥下，伴随着各色旗子与奏乐声，徐树铮乘坐汽车抵达黄宫正中大门的影壁前下车步行，同时将大总统像置于轿上，差人抬着由正中大门进入；宫前的门上飘扬着五色国旗，蒙古兵仪仗队止于宫墙之前，中国兵仪仗队则进入宫中；徐树铮进入宫中以后，将大总统像置于案上，恭立其前，领导行礼，哲布尊丹巴活佛对大总统像行三鞠躬礼，然后徐树铮授予哲布尊丹巴印册。哲布尊丹巴活佛与徐树铮又互相行礼毕，外蒙古王公、仕官一致行跪拜礼。<sup>1</sup>

乔巴山之所以对这场册封仪式进行如此细致的描述，乃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典礼象征着外蒙古“独立自主”地位的消亡，“蒙古人民都成为中国军阀的奴隶，而又受到民族的压迫了”，“从此以后，蒙古人民反奴役的斗争运动意志也益为激烈了”。<sup>2</sup>该书还特意记载了典礼进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行礼时发生了冲突，喇嘛们将宫门上的旗子撕扯下来。意在表明，外蒙古自治取消之后，当地人民的心中酝酿了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场册封典礼对于外蒙古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sup>3</sup>自此以后，描述这场册封仪式的具体经过，成为外蒙古民族精英实施民族国家构建动员的手段之一，其意图在于激发外蒙古普通民众的屈辱感，唤醒蒙古人的民族独立意识。

册封仪式过后的次日，徐树铮即率部以武力接收外蒙古官府各衙门。此间所有衙门的印信均被收去，每个衙门前由全副武装的西北军站岗护卫。西北军原本在进驻库伦之初，就已经与当地军民发生过冲突，经过徐氏一再使用褚其祥、高在田的兵力威吓蒙人之后，军民间的摩擦自属难免，华商的态度亦日渐傲慢。这些因素直接刺激了外蒙古各个阶层的情绪。据乔巴山的《蒙古革命简史》记载，这一时期，外蒙古的一些下层民族精英分子开始利用“爱民族，爱宗教”的热潮，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组织起了平民的政治团体。1920年1月，由乔巴山和苏赫尔巴托组织的两个革命团体进行重组，成立了外蒙古人民党。该党自成立的那一刻起，一直得到苏俄政府的帮助，“与驻库伦的俄国革命者霍齐林科、科木布尔维斯基等发生关系”。<sup>4</sup>人民党“党誓书”第一条规定：“外蒙古人民党的宗旨是肃清阻碍黄教民族的敌人，恢复失去的主权，忠诚的保护与发扬黄教，真诚的护卫民族与改革内政，力谋贫苦人民的利益与永久固守自己的政权，以建立没有压迫与被压迫的生活为首要。”<sup>5</sup>由此可以看出，在最初阶段，人民党为最大限度动员外蒙古人民，力主维护黄教统治的正统地位及其合法性。

在王公和高级喇嘛方面，除了因积极参加蒙古自治官府取消工作而获得封赏的既得利益者外，原来主张取消自治的外蒙王公竟多数转变立场，反对取消自治。一些僧俗贵族自哲布尊丹巴受到折辱之后，更视中国之辖治如地狱，进而重新团结在哲布尊丹巴周围，急切而盲目地寻觅外援，希冀恢复昔日的自治权力。关于外援问题，一部分王公喇嘛主张向美国求援，致书当时身在库伦的一个美商代表拉尔斯汪，转呈美国政府；另有一部分王公喇嘛主张向日本及白俄军队求援，故而做成求援书，加盖了活佛印，并经拉克察公转达。此外，他们还派出一个使团奔赴哈尔滨，以山林矿产为抵押，向日本方面商洽借款购买军火。

颇为吊诡的是，最初因拒绝谢米诺夫一党“泛蒙古运动”的威胁，哲布尊丹巴才不得不倒向北京政府，同意施行有条件的撤治，可在受到徐树铮折辱以后，欲求谢米诺夫帮助已不可得。原来，彼时谢米诺夫受苏俄的压迫，声势已不如前，由其领导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已经解体。他们可

<sup>1</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第12-13页。

<sup>2</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12-13页。

<sup>3</sup> 札奇斯钦：《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和“撤治”》，《蒙古史论丛》（下册），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年，第1218-1219页。

<sup>4</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16页。

<sup>5</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18页。



能接头的，惟有谢米诺夫残部——“疯男爵”温琴率领的一群溃兵。需要指出的是，恩琴溃兵进入外蒙古之时，其用来动员的口号乃是“消灭中国政府在外蒙古地方的军事力量，解放蒙古人民免受中国压迫”。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恩琴提出的这一口号迎合了一部分王公、喇嘛的意愿，否则不会有像乔巴山所描述的那样：“被中国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奴役的蒙古人民，是怀着极大的仇恨，所以王公、喇嘛们很愿意欢迎恩琴。”<sup>1</sup>换言之，虽然徐氏终以兵威强迫外蒙古屈服，但外蒙古已存离贰之心。嗣因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哲布尊丹巴与恩琴一拍即合，结成了同盟。

而在北京政府方面，徐树铮在完成那件极有历史意义的典礼后不久即离开了库伦，回到北京从事庙堂政争。原来，自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以来，利用张勋、靳云鹏联结八省，排挤段祺瑞。不久安福系迫于直、奉两系的压力，削去徐氏兵权，并于7月4日明令免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的职务。7月9日直、皖战起，皖派失利。8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陈毅为西北筹边使<sup>2</sup>，9月10日又改任为库、乌、科、唐镇抚使<sup>3</sup>。毋庸置疑，这场不合时宜的内部政争给中国政府统合外蒙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徐树铮的长子徐道邻事隔多年后的回忆，肇自直皖政争爆发，北京政府执权柄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内部政治权力的争夺上来，徐树铮作为皖系的一个重要人物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二陈之所以能先后坐镇外蒙，是因为他们在政府中没有敌人，不虑中央财政之无接济，而且开销又不大。在先君则不同：他本人尚在国内之时，已经不容易为蒙事筹款，若是到了库伦坐镇之后，中央一文不发，这四千士兵如何生活？生活都成问题，还说什么坐镇？还说什么开发？”<sup>4</sup>由于钱款、粮饷均无着落，徐树铮一手筹建的西北军在库伦陷入困境。

亦就在中国内部政局风云变幻之际，外蒙古地区已经变得动荡不安了。1920年9月13日至10月19日，恩琴率领的白俄军队迫近库伦，与中国驻军发生激战。此间中国驻军当局唯恐哲布尊丹巴活佛背叛，乃对其加以逮捕。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各地，库伦及其附近的僧俗大为震动。彼时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人民之中尚有很大的威望，而中国驻军对活佛如此欺侮，遂激起了当地全体人民的仇恨浪潮。时任镇抚使陈毅惊慌失措，无处着手<sup>5</sup>，惟勒令外蒙古四部的王公及沙比地的宰桑们大量征收马匹、骆驼，以及蒙人的蒙古包、牲畜、草料等物资，用以对抗恩琴；随后，中国驻军则又在库伦附近征收给养，抢掠马匹、牛羊，同时还禁止库伦居民出城，搜查街道上的行人，搜刮其银钱财物；此外，还将库伦北面的巴达尔济雅庙的全体喇嘛和附近的居民集合起来，藉口他们欢迎白党匪徒，对其加以惩罚，并洗劫庙里的财物，然后把庙宇付之一炬。<sup>6</sup>至此，由于中国驻军的暴行，加之恩琴以建立“自治蒙古”为号召，大批蒙古普通民众加入了恩琴的军队，声势越发壮大。

1921年2月3日，白俄军队在一部分外蒙古军队的协助下攻陷库伦。随后，库伦的中国驻军完全被肃清，陈毅率领中国驻军及其官员乘汽车逃奔恰克图。2月28日，哲布尊丹巴被迎回库伦，宣布重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诚如乔巴山所言，这个恢复的自治政府名义上是外蒙古的，而在事实上，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全权操诸恩琴之手。恩琴军队进入库伦以后，并没有如其允诺的那样，为外蒙古人民带来和平与自由。相反，恩琴大举扩军，在外蒙古抢劫、杀戮中俄商人及侮

<sup>1</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26页。

<sup>2</sup> 《政府公报》，1920年8月16日，第1618号。

<sup>3</sup> 《政府公报》，1920年9月10日，第1643号。

<sup>4</sup> 徐道邻：《再论外蒙撤治》，《独立评论》1936年总第209号，第11页。

<sup>5</sup> 此间国务院对于陈毅对外蒙古情形的处理颇有不满。在1921年1月21日发给陈毅的电报中指出，“惟敌国外患，若不洞见其内情，则因应无由着手，即如前此俄匪攻库，迭经剿击，而后地之警报又至，以致叨库等处，重见惊惶（皇）。究竟此项俄匪，实数约有若干，共分为几股，以何处为根据地点，其首领是否仍属巴龙，抑别有匪酋与巴龙并行为虐。屡次入寇，侵我边陲，有无政治作用，或系流寇性质，以抢掠为主。凡此种种，均与用兵有关，应望分别查明，详晰具报，以便核办”。（《收院交抄复库伦陈镇抚使电》（民国十年二月五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1975年，第1页。）

<sup>6</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27-28页。



辱残余的华兵、蒙古平民，此诸事件引起了外蒙古统治者及普通民众的很大不满。<sup>1</sup>

稍后，在恩琴的授意下，外蒙古政府向北京政府提交了一个照会。这个照会中提到，外蒙古军队与中国军队的作战，不是为了同中国割断一切关系，而是为了“恢复主权”。<sup>2</sup>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还向苏维埃俄国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建议双方建立善邻关系、签订贸易协定。<sup>3</sup>事实上，从1920年开始，中国军队及恩琴白匪军队在外蒙古的活动，一度让苏俄政府感到非常紧张。苏俄政府认为，直系军阀指使下的中国政府军队执行着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恩琴及其匪军则是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在苏俄看来，无论是中国军队背后的英美国家，或是恩琴背后的日本政府，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方完全控制了外蒙古，将对新生的苏俄政权造成很大的东方威胁。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苏俄政府对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在恰克图开展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大力扶持。<sup>4</sup>

1920年8月，外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以成文的形式阐述了关于外蒙古和中国未来关系问题的纲领，内中提出：力求根据1915年的恰克图条约恢复外蒙古自治，与中国各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接触，扩大自己对所有蒙古地区的影响，并在将来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完整的、以联邦或自治的形式与中国结合的国家。<sup>5</sup>1921年3月1日，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恰克图附近召开，苏赫巴托尔作了关于国家处境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外蒙古的国际地位，提出“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靠它的帮助来对最凶恶的敌人恩琴及其拥护者——王公和喇嘛——进行斗争”。并且还宣称，蒙古人民党规定自己的最终目标为要建立蒙古人民独立的国家，最近的目标则是要加入“中华联邦”，恢复不久以前被破坏的外蒙古自治。<sup>6</sup>3月7日，外蒙古人民党举行了第二次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人民党的宣言，提出要复兴蒙古各部人民权利，解除人民苦难，以和平生活，和外国建立平等外交；建立蒙古民族自主、自治的大家庭，呼吁远隔各地的蒙古民族一致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国家。<sup>7</sup>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蒙古民众反抗白俄军队与中国军队，蒙古人民党借用了哲布尊丹巴的影响力，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了告人民书。根据乔巴山的自述可知，“在这里人民党对于佛汗的推赞，乃是因为哲布尊丹巴活佛在人民间仍有声望，故用其名义，以便成事，使群众信服”。<sup>8</sup>

1921年3月13日，外蒙古人民党选出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为整合武装力量，临时政府通过了将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的决定，编制了四个骑兵团。临时政府决定向中国军队驻守的恰克图进发，在他们看来，占领这个城市能使临时政府在蒙古领土上获得一个重要据点。3月18日，人民党军队攻破了恰克图。临时政府于3月19日发表宣言，宣告蒙古人民关于成立临时人民政府的消息，内称“临时人民政府的目的在于从中国军阀和白匪统治下解放祖国，并召集全民的大呼拉尔”。3月25日，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告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工会、学生和各革命民主党派、中国真正的爱国人士”的宣言，旨在阐明蒙古展开革命斗争的意义：“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一切受世界帝国主义者压迫奴役的人民，特别是亚洲不自由的殖民地人民的团结和共同利益，为了同样受本国的和外国的吸血鬼和强盗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蒙古人民的深刻的

<sup>1</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28-31页。

<sup>2</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62页。

<sup>3</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62页。

<sup>4</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64页。

<sup>5</sup>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2，案卷4，第3页。转引自C·Г·卢加宁著，阿拉腾奥其尔译：《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蒙古（1920-192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8页。

<sup>6</sup> 详情参阅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65页；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2，案卷9，第34页，转引自C·Г·卢加宁著，阿拉腾奥其尔译：《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蒙古（1920-192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8页。

<sup>7</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39-41页。

<sup>8</sup> [蒙]乔巴山著，谢再善译：《蒙古革命简史》，第43页。



共同利益的理想，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蒙古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坚决要求北京政府立刻停止向蒙古派遣军队，同时向中国人民和上面所提到的最优秀的、最高尚的人士致以友好和诚恳的敬意，并请支持我们的要求。”<sup>1</sup>

大体而言，在外蒙古二次独立前夕，外蒙古人民党人以自治为目标，提出了加入“中华联邦”的口号，究其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蒙古革命党人的立场主要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在中国将来有可能实行各民族联邦这一背景下，蒙古革命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革命合理性；二是旧‘恰克图系列协定’及其三角关系的妥协方式对他们的影响和外蒙古的自治地位”。<sup>2</sup>

因中国军队兵败恰克图，稍后的一段时期内，外蒙古境内的政治角逐势力只剩下外蒙古自治官府和外蒙古人民党临时政府。至此，两股政治势力的直接对抗被提到日程上来了。此间外蒙古自治官府内务部以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土谢图汗部的阿拉特发出一个特别告示，竭力颂扬恩琴的功绩，同时谴责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民党人擅自同苏俄建立联系，“这就意味着他们想反抗汗的政府。这个意图就在文明的大国中也是难以实现的，何况在我们蒙古”。<sup>3</sup>稍后，恩琴还以“真正的蒙古政府”之名义发布各种宣言，号召外蒙古民众支援他——蒙古民族的“救星”恩琴，同时积极准备发动对人民党人的进攻。<sup>4</sup>作为回应，人民党最初试图利用王公喇嘛与恩琴之间的矛盾，请求自治官府的王公喇嘛们和其联合起来，共同击退恩琴与中国军队，为此，他们给王公和喇嘛写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信，然而均未得到对方响应。<sup>5</sup>

自1921年5月开始，恩琴指挥的自治官府军队与人民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军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最初，恩琴方面由于人数及武器弹药的优势，占据了主动，人民党人的军队则节节败退。直至1921年6月28日苏俄红军开入外蒙古境内，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人民党的方向发展。在苏俄红军和人民党的双重压力下，恩琴军队不得不退守库伦。7月6日，人民党先遣部队击溃恩琴军队，率先进入库伦。两天后，即7月8日，临时人民政府、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与主力部队汇聚库伦。7月10日，外蒙古人民党成立了正式的“人民革命政府”。至于哲布尊丹巴的个人归属问题，考虑到其在外蒙古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很高地位，当局不敢贸然施以激烈措施，而施以虚与委蛇之手段，为其保留了君主的虚席，但通过颁布条例，对其固有的特权做了严格限制：条例规定解除哲布尊丹巴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仅保留其领导喇嘛教事务的职权。其时，人民政府还设法限制王公喇嘛的权力和特权，先是废除了呼毕勒罕领地的权利，后又取消了呼毕勒罕制度，要求寺院牲畜同阿拉特牲畜交纳一样的税捐。<sup>6</sup>

其时，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及认定自身的政治地位，成为外蒙古当局对外交往过程中首先予以考虑的问题。研究表明，外蒙古当局在1921年10月苏蒙双边谈判开始前夕即已经不满足于自治官府成立以来的“自治”地位，从而将外蒙古视作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正基于此种立场，当1921年8月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致外蒙古人民政府的照会中使用“自治的蒙古”的提法时，引起了外蒙古当局的很大不满。为照顾外蒙古领导人的情绪，嗣后“自治的蒙古”的说法不再出现在苏蒙正式文件当中，而代之以较为中性的“自由的蒙古”。<sup>7</sup>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丹巴去世。就在当天，外蒙古“人民政府”宣布将哲布尊丹巴印鉴收归政府大厦。

<sup>1</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70页。

<sup>2</sup> [俄]С·Г·卢加宁著，阿拉腾奥其尔译：《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蒙古（1920-192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9页。

<sup>3</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71页。

<sup>4</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72页。

<sup>5</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71页。

<sup>6</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77-278页。

<sup>7</sup> [俄]С·Г·卢加宁著，阿拉腾奥其尔译：《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蒙古（1920-192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9-111页。



6月7日，外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实行共和政体。人民政府遵循该会议精神，通过了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6月13日，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在国内实行共和政体的决定。<sup>1</sup>至此，留存于外蒙古地区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政教合一喇嘛君主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亦标志着由外蒙古民族精英一力推动实施的民族国家构建实践基本完成。

### 三、北京政府统合外蒙古问题的检讨

以上对1919~1924年北京政府统合外蒙古问题做了简要梳理，同时还从外蒙古的视角考察了外蒙古“二次独立”前后的有关情况；为再现北京政府统合外蒙古的种种面向和检讨政府统合外蒙古的举措，在此拟将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发展历程划为两个阶段即（1）撤治外蒙古、（2）库伦乱事，对其逐一加以检讨。

#### 1. 撤治外蒙古：在强权、寡力与怀柔之间

现今讨论外蒙古问题者，多将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归结为中国力量的弱小致使外交不力，所谓“弱国无外交”。如果对外蒙古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做细致考察将会发现，此说法看似有理，然又不尽能解释近代外蒙古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

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前，尽管外蒙古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宣布独立，但北京政府对于外蒙古地方精英仍然一意优待。在袁世凯看来，外蒙古问题终究属于一国内部兄弟之间的事情，尽管短期关系发生了龃龉，但从长期来看，外蒙古问题的解决终将依赖于双方的和解，而非武力。以此理念为准绳，1916年袁世凯乘登基大礼举行之际，邀请多名外蒙古王公喇嘛入京，并给予其高规格礼遇，这一度让外蒙古王公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其他外蒙古王公、喇嘛听闻此事以后亦深受感动，并径直向时任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策表达独立前后所行之事的歉意。因此之故，陈策在外蒙古地方精英中的声望颇高，稍后由其推行的外蒙古贵族册封事、唐努乌梁海佐理员设置事、聘请中国电报员等诸事务均得以顺利推进。

1917年之后俄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对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社会舆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一些人看来，外蒙古的独立自主端赖于俄国政府，如今帝俄业已成为历史，外蒙古地区内部中俄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逆转；既然曾经因外国强权而失去外蒙古，那么，于此之际同样亦应依靠强权来收复曾经拥有的权利。时任西北边防军陆军团长的高在田即在致国务院电文中提出：“详察俄蒙现状，困弱不堪；拟请乘此时机，增兵外蒙，极力进行，复我疆土，挽回利权，以厚国基而固边防。”<sup>2</sup>高氏认为，趁此机会收复外蒙古，“势必探囊，情同破竹，与民国元年取消蒙人独立之旧事，其迹虽异，其理则同”。<sup>3</sup>对于高在田主张武力一节，外交部提出了异议。1919年3月5日，外交部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国此时经营外蒙，只可设法代取俄人势力，以为将来扩充权力张本，未可操之过蹙，有损蒙人权利，转令生疑，致怀携贰，于我进行上发生障碍。”“况我许外蒙自治，为时已久，一旦欲以兵力规取其地，破其自治，深恐蒙人必不甘心，发生反抗，自在意中。万一兵力不支，外借强援，以图反抗，则垂涎外蒙者，固不仅俄国一国，设复有强有力者，阳假维持之名，阴行侵略之策，而蒙局前途，益将不可收拾。是以该团长所称，增加兵力收抚外蒙各节，据本部意见，似不宜过于操切从事。”<sup>4</sup>

事实上，此间对外蒙古事务有所了解的官员多持怀柔外蒙古上层之立场。时卸任科布多佐理员徐时震即建言，“政府苟能厚结蒙人，使怀德威，咸知内向之利，则所谓自治者当可渐即取消，

<sup>1</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88页。

<sup>2</sup> 《收国务院函》（民国八年三月三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30页。

<sup>3</sup> 《收国务院函》（民国八年三月三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33页。

<sup>4</sup> 《发国务院秘书厅函》（民国八年三月五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37页。



而外蒙主权不难复为我有者也”。具体来说，可从对外蒙古各旗实行抚慰、代偿外蒙古官府积欠俄债等两个方面加以笼络。<sup>1</sup>外交部对此意见评价为，“不为无见，拟并交陈都护使等酌核”。<sup>2</sup>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亦持同样主张：“至以为外蒙本无自主之实力，必将有所依赖，其欲逐逐，存心叵测，报载之言纵虚，我国亦不可稍忽。然默察蒙人心理，其附就于我之观念，究较其对待某国为亲近可靠……似宜趁此时机，遣派声望素著大员，驰往库伦，会同陈都护宣布政府德意，令咸晓然五族共和互相唇齿之利益。……如此办理，虽不敢遽期其完全归我，或可藉以钳制某国之阴谋。”<sup>3</sup>

彼时，尽管北京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外蒙古问题存在分歧和争议，但总体来说在怀柔派与武力派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历史惯性还稍稍向怀柔的天平倾斜；然而，随着徐树铮驻节库伦，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在时人看来，“徐氏对外蒙的处置，所得的只是降低了优待蒙人的条件，而所失的则是外蒙的人心”，外蒙古自治官府因此勾结恩琴军队，与中国则渐行渐远。<sup>4</sup>1920年8月，北京政府又拟任陈毅出镇库伦。其时，陈氏提出改设库乌科唐镇抚使，并拟定公署编制十三条，大规模扩张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地方的权力。熟悉外蒙古事务的毕桂芳认为此诸举措，“俨然以全蒙改为行省也”。鉴于“外蒙前受徐之逼迫，已蓄异志，今陈所定官制似将外蒙全境改为行省之势，蒙人心理恐有种族、宗教消灭之虞”，毕桂芳谏言大总统徐世昌：“查蒙人心理，不愿顿改旧习由来已久，熟悉蒙情者莫不尽知。前清时代，间有条陈改蒙古为行省者，卒因困难种种，不克实行。蒙人闻此建议，恨之入骨，我大总统知之最详，现在何以出此打草惊蛇之举？”徐世昌答称：“伊等均愿如此办理，奈何！”<sup>5</sup>

大体而言，在1919年前后，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地区上演了一幕从“外蒙古（主动要求）撤治”到“（北京政府主动）撤治外蒙古”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北京政府抛弃了一贯使用的怀柔手段，使用了强力的手段，试图先发制人，收回曾经失去了的外蒙古主权，然而因此亦失掉了外蒙古上层精英及其庇护的外蒙古普通民众的人心。其结果，“撤治外蒙古”的成果未得善终，库伦乱事进一步发酵。关于这一点，日本《朝日新闻》曾做如下评述<sup>6</sup>：

“原来北京政府此次对于蒙古处置，非常拙劣，遂致结果如此纷杂。……盖当初俄蒙军队迫至库伦之际，守备大小官吏，悉数遁往买卖城，忽而投入恰克图，因兵寡不能固守库伦，虽属事不得已，然不知彼等何故舍却活佛，而不系以同伴，或于此点亦有几分思虑，但当时活佛既已归入维盖恩掌中，亦不可知乎。惟考蒙古之政治，以及收揽蒙古之人心，实以将活佛付与敌人，为第一大忌。观于康熙帝时之往事，蒙古受加尔坦侵略之际，或者主走往俄国，或者主倚于中国，纷纷苦于去就结局，叩问活佛意见，活佛毫无迟疑言，应走北京，蒙古遂入中国保护之下，以是可知康熙帝不早有所怀柔活佛，则不能有收至好成绩之事也。活佛之威望，今日虽云不如从前，然乃属程度问题。今日情形，北京政府对于活佛不能取得适当之措置，实为在外官吏之无状，致大局受此一大损失，吾人所不胜反复为中国政府叹息也。”

## 2. 库伦乱事：北京政府内部的权力博弈

如果说，北京政府在实施“撤治外蒙古”过程中失掉了外蒙古上层精英的人心，以至于为北京政府统合外蒙古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那么，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围绕统合外蒙古问题所

<sup>1</sup> 《收卸任科布多佐理员徐时震上大总统呈（民国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56页。

<sup>2</sup> 《附说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59页。

<sup>3</sup> 《收田中玉条陈治蒙计划（民国八年四月十一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73页。

<sup>4</sup> 张忠绶：《外蒙问题的回顾》，《独立评论》1936年总第198号，第7—8页。

<sup>5</sup> 毕桂芳：《外蒙交涉始末记》，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1—352页。

<sup>6</sup> 《收驻日大使馆函》（民国十年四月二十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55页。



表现出来的北京政府内部政争，则应视作库伦乱事的直接原因。

徐树铮以武力推行“外蒙古撤治”后不久，北京政府内部直皖派系政争爆发。彼时，政府执权柄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内部政治权力的争夺上来，徐树铮作为皖系的一个要员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一时人多认为，“西北筹边使”的设置，“完全是因人设官，也就是为徐树铮而设”。<sup>1</sup>如果说，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不过是皖系军阀维护所在政治集团利益的需要，那么，徐氏一旦成为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地区的代言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国家利益之代表，然而因由皖系的失败，徐树铮经营外蒙事开始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稍后演绎的徐氏解职一幕，人们依稀看到这仍然是不同政治集团间利益冲突的持续，违背了国家利益。当徐树铮去职的消息发布之初，外蒙古恰克图商会正副会长齐溥、张佩弓等曾率工商界众人联合致电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和参众两院，请求收回徐树铮免职之成命。电文内称：“国家设官，布政在民，进退之间，惟民是赖。中央更动徐筹边使，民等逊听之余，惊愕罔措，直若大难将临，曷胜切肤之痛！”“徐使一人之进退，关系于蒙疆之得失，及万民之生死。”并历陈徐树铮去职之“六不可”。<sup>2</sup>尽管徐氏在外蒙古华商的心目中是众望所归之人选，然而大总统徐世昌并不为所动。1920年9月9日，北京政府以《西北筹边使官制》“不合现情”为借口，转而由国务院飭法制局改订《库乌科唐镇抚使暨所属各官署组织暂行条例》，“此后库乌科唐等处事宜，即由镇抚使督率所属各员依照暂行条例办理”。<sup>3</sup>至此，“西北筹边使”一职正式取消。

上述北京政府内部的权力博弈与政治冲突，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二次独立”以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依然存在。不过，在这一阶段，它主要围绕争夺征蒙主导权及与之相关的军备军资问题予以呈现。当库伦沦陷警报传递至内地之际，无论奉系的张作霖，还是直系的吴佩孚、曹錕，均站在道德制高点，通过媒体发表高谈阔论，传递出兵外蒙古之意。北京政府曾于6月间在怀仁堂召开会议，张作霖、曹錕、王占元、靳云鹏、贡桑诺尔布、雍和宫活佛呼图克图及内蒙诸王及喇嘛均列席，徐世昌亲自演说，张作霖更是自告奋勇，“且谓事若不成，曝尸疆上”。最终，会议决定由张作霖出任蒙疆巡阅使，付以讨蒙全权，负责征蒙事宜。然而，张作霖“视援库伦之问题小，而视取得援库总司令地位之问题大”<sup>4</sup>，一旦获得此职务，则故意延宕，稍后还故意推举其政敌即曹錕部下之冯玉祥率兵讨伐外蒙古。冯氏因平日就外蒙古问题曾口出大言，不能明言拒绝，惟附列四项条件，故意刁难北京政府。针对“讨伐外蒙古”呈现出的种种怪状，有日本报纸发文慨叹，各派军阀“全无爱国忧民之志”，至于北京政府，则不过为各派军阀之傀儡，“其威令则不出都门”。分析其原因，该文指出，各派军阀不愿意出兵外蒙古，乃是因为如遽舍其根据地而去，或致其部下兵力单薄，则将因蒙古问题而危及自身地位；因此之故，举荐其他派系军阀出兵外蒙古，则可使之疲于奔命，可保自身不虞。<sup>5</sup>

#### 四、国家利益与革命外交的双重性：苏俄政府的外蒙古政策

苏维埃俄国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际上，日、美、英、法等国不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策划武装干涉，希冀一举将其消灭；在国内，旧俄残余武装的反抗此起彼伏。于此背景下，为打破西方列强和日本在远东的封锁，苏俄政府迫切希望获得中国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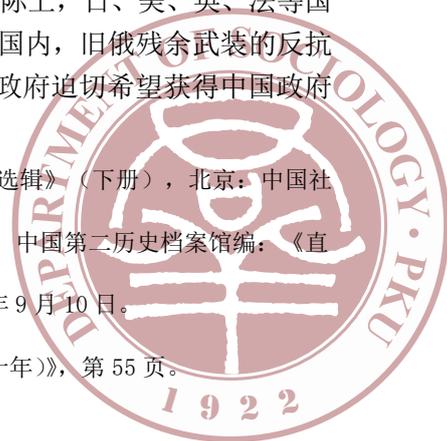
<sup>1</sup>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杜春和、丘权政主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2页。

<sup>2</sup> 《蒙古恰克图商会请收回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免职成命电》（1920年7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97页。

<sup>3</sup> 《政府公报》第1618号，1920年8月16日；《政府公报》第1643号，1920年9月10日。

<sup>4</sup> 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606页。

<sup>5</sup> 《收驻日大使馆函》（民国十年四月二十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55页。



对苏维埃政权的承认，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此它发布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皇政府时期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利益。<sup>1</sup>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展自身的统制空间，苏俄在远东地区还将余光投向外蒙古。早在1918年2月，苏俄政府就曾联络外蒙古自治官府，称其有权独立建国，并表示要与之建立“平等关系”。1919年8月，苏俄政府发表《告蒙古人民和政府书》，内中提出：“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蒙古人民。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古的内部事务……苏维埃政府大声疾呼地向蒙古人民宣布这一立场。并建议立即同俄国人民建立关系，希望派遣自由蒙古人民的使者去迎接红军。”<sup>2</sup>

时至1919年底，苏俄红军打败了旧俄军队与协约国军队的第二次进攻，稳定了苏维埃政权。其时，列强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1920年1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在互利的基础上与苏俄通商。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好转，苏俄开始有余力经营外蒙古地区。如前所述，1920年9月间，恩琴率一部白俄军队残部闯入外蒙古，声势颇为壮观，这让苏俄政府感到非常紧张。在苏俄政府看来，外蒙古为一重要缓冲区，事关苏俄安全，倘若该地方为恩琴残部所占，遗祸无穷。基于此种想象中的担忧，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于1920年11月10日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直指恩琴军队窜入外蒙古地区，妨害中国与苏俄国家利益，进而提出由苏俄向库伦派兵，以辅助中国军队击退之。最后，契切林还承诺，“一俟滞留蒙古之白卫队扫除净尽之时，该军即算已达目的，应立即撤回”。<sup>3</sup>鉴于时隔多日未得中国方面的回应，契切林于11月28日再度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表达了同样的诉求，并一再表示，苏俄政府以不侵略他人土地为政治原则。<sup>4</sup>此间中、苏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为加强与中国政府方面的沟通，苏俄政府还通过该国驻英代表联络北京政府驻英公使施肇基，请求后者将苏俄政府的态度转呈中国政府。北京政府对于苏俄政府的说项表示疑虑，以外蒙古系中国领土为辞，指示外交部就苏俄提议出兵外蒙古一事，严词拒绝。<sup>5</sup>外交部第一时间将北京政府之立场告知施肇基，要求其转告苏俄驻英代表，“蒙边防剿事项，我方布置极为周密，无须俄政府越俎代谋。请其转电政府，彼此尊重主权，即将前意取消，以免误会为要”。<sup>6</sup>眼见中国政府方面不为所动，苏俄政府退而求其次，开始联络外蒙古自治官府。1920年底，苏俄政府照会外蒙古自治政府，请求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外蒙古当局消灭恩琴军队。<sup>7</sup>由于对“赤化”抱有一种恐惧感，外蒙古自治政府亦未对苏俄的照会做出回应。

1921年3月，恩琴军队已经攻陷中国驻军把守的库伦，稍后挟持哲布尊丹巴，以“建立自治蒙古”为号召，声势盛于一时。如前所述，苏俄政府关注外蒙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构建缓冲区，防止旧俄残余军队借道外蒙古边境袭扰苏俄。目睹中国军队已不能将恩琴军队驱离外蒙古，苏俄政府再次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请求出兵外蒙古，声明“此次出兵入蒙，确系拯救俄华人民起见，不受报酬，无须交换利益，且不生条约关系，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外交部则以“不劳代谋”为由，婉言谢绝。<sup>8</sup>

<sup>1</sup> 马蔚云：《国家利益变迁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49—59页。

<sup>2</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52页。

<sup>3</sup>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中国外交部电》（民国九年十一月十日），《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九年）》，第371—3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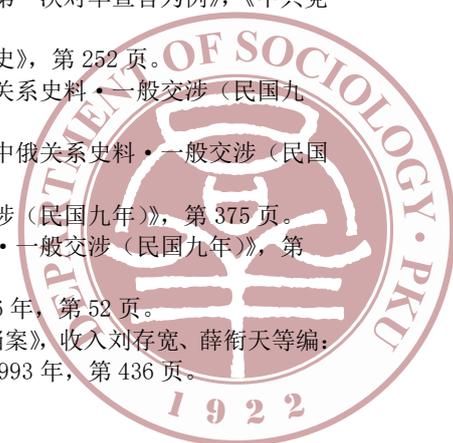
<sup>4</sup>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中国外交部电》（民国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九年）》，第372页。

<sup>5</sup> 《外交部收国务院函》（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九年）》，第375页。

<sup>6</sup> 《外交部发驻英公使施肇基电》（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九年）》，第375—376页。

<sup>7</sup> [蒙]乔巴山著，张惠卿译：《蒙古人民革命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2页。

<sup>8</sup> 《外交部收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函》（民国十年三月四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收入刘存宽、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6页。



时至 1921 年 5 月 8 日，苏俄政府通过驻英代表致函北京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请求其代为转达北京政府。该函件大致表达了两层意思：（1）日本煽惑俄白党及呼图克图，使外蒙古与中国脱离关系，以图独立，从而成为中俄间瓯脱地，仍由日本从中操纵，外蒙古地区形势危急；（2）蒙古人民党正竭力反对呼图克图、日本以及俄白党首领恩琴，该党宗旨在使蒙古自治，不受日本拘束，仍为中华民国一部分，受治中国主权之下，而苏俄政府现与蒙古人民党表示同情，如中国不欲放弃蒙古，应即与该党接洽，并与协力反对呼图克图。<sup>1</sup>通过该函件可知，随着外蒙古人民党力量的壮大，苏俄政府已经不再将与北京政府的交涉重点放在出兵外蒙古的问题上了，转而寻求协助蒙古人民党，依靠“蒙古革命者”来保障其利益。

对于前项苏维埃政府所提新要求，中国政府内部抱有极大的警惕，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问题即为：在彼是否仅为抵制在蒙白党，以为自卫之计，从而并无他野心？在我如果因利便与之接洽，是否可收绥抚蒙人、歼灭白党之效，将来有无后患？为详细解明此诸忧虑，外交部专门训示下属俄事委员会就此诸问题进行通盘研究，希冀俾无遗算。稍后，俄事委员会提出了以下两点意见：

（1）基于意识形态之考量，蒙古人民党与俄国新党携手，其主旨在于希冀恢复自治，我若经劳农政府与之接洽，有太阿倒持、引狼入室之弊，将来难免会重蹈从前俄国指使蒙人独立订立自治之覆辙。（2）基于外蒙古内部两股势力之力量对比研究，蒙人历来信奉活佛，蒙古人民党系少数受俄新党勾结之人，与呼图克图派相比寡众悬殊，难操必胜；且此辈沾染“赤化”，为传播过激主义之危险分子，似尤不宜引为我兴。亦正基于意识形态和力量对比的双重考虑，俄事委员会认为，“按照目下情形，蒙人内部虽分新、旧两派，然其实则皆为外人所利用，是以此次蒙乱，于事实上已不能视同匪党内乱，其得失盈虚，动关外交地位，影响国土主权，惟在我总以人为国内事件，不容外界公然之干预为上策”。<sup>2</sup>

对于上述俄事委员会之意见，国务院经过国务会议公同核阅，准允照办。国务院在 5 月 18 日发给顾维钧的电文中明确指示，“蒙匪与俄新党携手，图复自治，已占恰城，证已劳农代表所云，俄蒙合谋恰情事益显。若更与俄接洽蒙事，非特蒙人听其播弄，易蹈从前覆辙。此辈民党究系少数，难操胜算。且虑传播赤化，政府对蒙只认为国内事件，不欲外界公然干预。对该代表可告以蒙事正力图平定，对恰蒙人当派员前往抚辑，并办理善后事宜。所请接洽之处，应俟华员到恰查核办理”。<sup>3</sup>尽管国务院赞同俄事委员会的意见，但国务院秘书厅对此意见提出了异议。在一份说帖中，秘书厅特别指出，俄国旧党盘踞库伦等处，实为新党所深忌，蒙古人民党虽系少数，然则合新党全力图之，无论俄、蒙，欲以抵御劳农，无异腐肉之齿利剑；在中国政府方面而言，如果苏俄政府不以攻取蒙境、而以铲除旧党为词，恐亦非我笔舌所能阻止，届时或引起日俄之争，关碍更大。基于此，秘书厅认为，根本办法“仍应以削平库乱为上策，惟其如此，盖我靖我乱，自可绝他人干预之源，否则新旧党之争，日俄之争，恐终不可免”。<sup>4</sup>秘书厅还判断，在俄国境内新旧两党之争中，俄旧党已无死灰复燃之望；新党有提倡“民族自治”之议，即可虑者又不止蒙疆，北京政府对于此点应给予格外注意。<sup>5</sup>

结合上述考察可知，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内部对于外蒙古地区形势的估计大概可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抱着对“赤化”的恐惧，而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地区大力扶持蒙古人民党，输出共产主义，这让北京政府感到颇为忌惮；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对外蒙古自治官府的实力过于自信，认为人民党即便得到苏俄政府的支持，亦难以与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自治官府抗衡，正是基于此种估计，北京政府从维护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将外蒙

<sup>1</sup> 《收驻英顾（维钧）公使电》（民国十年五月八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 78 页。

<sup>2</sup> 《俄事委员会说帖》（民国十年五月十二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 80—81 页。

<sup>3</sup> 《发驻英顾（维钧）公使电》（民国十年五月十八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 82 页。

<sup>4</sup> 《收院秘书厅函·说帖》（民国十年五月二十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 85—86 页。

<sup>5</sup> 《收院秘书厅函·说帖》（民国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十年）》，第 89 页。



古问题视为国内问题，不允苏俄干预。

在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就出兵外蒙古问题进行多方交涉之际，在外蒙古境内，恩琴指挥的自治政府军队与人民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军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最初，由于人数及武器弹药的优势，恩琴方面占据了主动，人民党的军队则节节败退。显而易见，外蒙古境内的此种军事政治发展趋势不符合苏俄的利益，苏俄政府势难容忍。于此情形之下，苏俄已经决定出兵外蒙古，惟在出兵前夕，契切林再度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与以往函电中请求中国同意苏俄出兵不同的是，该函件惟强调苏俄出兵之意义，即在于消灭中俄公敌恩琴军队、维护两国主权，同时在函件的最后不忘再次声明，“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sup>1</sup>不言而喻，于当时情形下，苏俄军队出兵外蒙已成定论，是故，苏俄政府不再要求在此问题上获得中国政府谅解。1921年6月28日，苏俄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派兵进入外蒙古，协助人民党军队一举将恩琴军队剿灭。由于担心来自中国军队的讨伐和恩琴残余势力的反扑，外蒙古人民政府请求苏俄红军仍旧留驻外蒙古，直至将恩琴军队彻底消灭为止。苏俄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计，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这一请求<sup>2</sup>。

彼时，苏俄政府未经北京政府允许出兵外蒙古，在中国朝野各界引起很大不满，这对尚处于培育阶段的中苏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苏俄政府内部亦有不同意见：一方以越飞为代表，从革命外交与世界革命的初衷出发，致力于建立对华外交关系，故主张停止在外蒙古的活动；另一方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代表，基于维护现实利益的需要，坚持认为苏俄为自身安全计，不能不插手外蒙古事务。<sup>3</sup>在契切林看来，“理论上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或者不得已承认其主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蒙古始终是个半独立的国家，它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不是设有中国管理机构和中国督军的东突厥斯坦”。基于这样的现状，契切林提议：“可以向中国政府宣布，我们的军队应蒙古政府的请求，在蒙古尚未能自我保护之前留在蒙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军队不能无限期的留在蒙古。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撤兵的期限。我们只能宣布，我们的军队的驻扎是暂时的。”<sup>4</sup>

上述契切林的主张为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对华外交和谈判确定了基调。1921年7月30日，身在北京的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中外记者表示，苏俄绝无侵略中国领土之意<sup>5</sup>。8月，远东共和国在向北京政府提交的一份特别补充材料中亦提到：“蒙古地位将由俄中关系于蒙古的旧沙皇条约来确定，远东共和国不允许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sup>6</sup>10月，优林在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的谈话中再度阐明了苏俄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前述立场。然而，就在苏俄政府向北京政府做出承诺后不久，即1921年11月5日，苏维埃政府和蒙古人民政府签订了“友好关系协定书”。协定书规定，双方在政治的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必须执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并且不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任何对另一方面有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编撰者称赞该协定为“蒙古第一个完全平等的国际协定”，认为这个协定提高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和国内地位、巩固人民政权，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方面，因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sup>7</sup>如果说外蒙古当局将“友好关系协定书”视为一份荣耀，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则是一种耻辱，这一行为再度激起了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愤怒。为了平息来自中国方面的不满和责难，1921年12月，苏俄政府代表裴克斯赴华与北京政府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其

<sup>1</sup> 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4页。

<sup>2</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75页。

<sup>3</sup> 田保国：《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年，第118—119页。

<sup>4</sup> 转引自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55页。

<sup>5</sup> 《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北京中外各报记者发表讲话》，《民国日报》1921年8月2日第6版。

<sup>6</sup> 田保国：《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1917—1949）》，第113页。

<sup>7</sup>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80—282页。



时，颜惠庆当面质问裴克斯：“外蒙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安得与之订约且驻兵库伦，此诚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举，是何用意？”裴克斯虚应称：“本国此举对于贵国在外蒙之主权毫不侵犯，缘此系根据1915年三方之协约。按照该约，贵国承认外蒙之独立。而此项独立即在1919年被贵国所强迫取消者也……本国政府之意，对于前俄帝国所缔结之各项条约，均须修改，并非根本全取消之谓。1915年中俄蒙三方协约亦应修改。”颜惠庆坚持认为，中国—外蒙古关系为中国内政，无须第三者调停；即便苏俄方面出手调停，亦只能以友人身份进行非正式的调停。<sup>1</sup>裴克斯则一再强调1915年《中俄蒙协约》的法律效力，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苏俄对于外蒙古事务的政治权利。<sup>2</sup>

由于双方在外蒙古事务上的分歧严重，裴克斯的对华外交不可避免地陷入停顿。在此情形下，1922年7月，苏俄政府派遣越飞接替裴克斯的工作。其时，苏俄政府给越飞下达了两条纲领性指示：第一，外蒙古的法律地位以及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问题，应由俄、中、蒙三方协议解决；第二，前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与苏俄政府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sup>3</sup>越飞对这些指示感到不可理解，他在给列宁、斯大林、加拉罕等人的信件中坦白指出，“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的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后，越飞认为，接下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找到一个摆脱现状的出路，以避免俄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为此，越飞在华期间展开外交活动，先是拉拢吴佩孚，随后又与孙中山合作，其目标即在于从中国军政实力派中寻求合作伙伴，希冀通过他们来影响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重塑苏俄政府的“革命形象”。<sup>4</sup>需要指出的是，当越飞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之际，外蒙古方面一度感到非常紧张，乃因西方报纸盛传外蒙古问题亦在谈判日程当中，并且外蒙古问题“仅可根据蒙古旧有自立条约解决”，这不由得让他们回想起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绕开外蒙古当局对外蒙古地位进行处置的不愉快经历。为此，其时外蒙古当局专门照会劳农政府驻库伦代表陆巴尔斯克，要求苏俄政府将此事之始末“登报声明，务使普通人民心目中亦明了此事，而对其作正当之推想”<sup>5</sup>。

尽管逗留中国期间一直以对华友好的面目示人，但由于中俄双方诉求的不可调和性，越飞的对华外交活动步裴克斯之后尘，再度以失败而告终。1923年9月以后，谈判在苏俄政府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代表之间举行。这一次谈判最终有了结果，双方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内中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高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sup>6</sup>至此，横亘在中苏两国之间的外蒙古地位问题再次以条约的方式得到确认。

## 五、泛蒙古主义旗帜下的利益诉求：日本的涉蒙政策

<sup>1</sup> 《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苏俄代表裴克斯》（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刘存宽、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49—450页。

<sup>2</sup> 《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苏俄代表裴克斯》（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刘存宽、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0—452页。

<sup>3</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

<sup>4</sup> 详情参酌刘敬忠：《苏俄占领外蒙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第70—77页。

<sup>5</sup> 《蒙古外交总长致驻蒙劳农代表陆巴尔斯克照会》（1922年12月23日），收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会务处编：《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555页。

<sup>6</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外交》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3—835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爆发，后来，旧俄军队在苏俄红军的进攻下陷入溃乱，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已不能得到保全。对此情形，日本最初抱有跃跃欲试的心态，希图有所作为。原来，20世纪初，日本政府与俄国政府订立了多项密约，双方就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利益分割，随着旧俄政府的崩溃，苏维埃政府声明相关密约作废，远东地区的利益面临重组，趁此机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是日本人乐见其成的事情。正基于此，日本政府决心扶助俄国帝制派之势力，以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对抗。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政府除乘机占领俄国滨海地区外，并欲将俄国旧政府在中国北满、外蒙之一切权利，经俄国帝制派之手让渡于日本；与此同时，它还鼓吹“泛蒙古主义”运动，依靠流散于远东地区的旧俄政府溃军运作成立“大蒙古国”。

除了在远东地区进行大蒙古国运动的运作以外，此间日本政府还联合美国，鼓动北京政府参加协约国武装干涉集团。最初，中国政府保持了克制和中立，北京政府曾不断谕令中苏边境地区军政当局对俄国“红白党争，严守中立”，对苏俄内部事务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一政策虽未能在所有中苏边境地区严格执行，但从整体上约束了一些边疆大吏的鲁莽行为。然而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基于诸种考虑，于1918年加入了协约国集团，并表示派遣参战军开拔俄国远东地区。在随后协约国集团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政权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虽然只是起了象征性的作用，但毕竟是协约国的一员。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日本共同出兵远东地区，但在一些边疆地方大吏看来，与日合作不啻于与虎谋皮，必将面临更多的风险。陈毅听闻中日共同出兵之事，即感到非常紧张。根据他的观察，日本扶助谢米诺夫，三番四次地联络动员外蒙古王公贵族，发起了“泛蒙古主义”运动。在此情形下，“至于中日共同出兵，应只限于满洲里一路，蒙古新疆实无日驻武官之必要。证以日人在蒙举动，当初实抱有伟大阴谋而来，而我不知日人乃世界之毒，有何亲善可言。总以设法早日撤出，免贻害累为宜”。<sup>1</sup>对于日本之立场，时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亦有所察觉，他在“条陈治蒙策”中指出：“阅观报章迭载，内外蒙古各代表至赤塔与蒙匪首领富森阿开大会议，因有某国人暗中主使，欲合内外蒙古及俄属西伯利亚之蒙古部落名布里亚特者，组成独立国，推富森阿为大统领。又谢米诺夫阴受某国之唆使，屡诱外蒙独立各等语。无论是否属实，但某国近来覬覦内外蒙之心，已日见昭著，倘不事先预防，使彼事机成熟，则后悔又将无及。”<sup>2</sup>彼时，陈毅还向北京政府报告，在库伦的布里亚特人巴德马热夫受日本军官指使，撰写《蒙古问题》一文，用俄、蒙文字印刷散布，企图煽惑蒙人，内中声称“中俄政治不良，均无好意待蒙，又中国内讧不已，宜乘机独立，急求外援。如求外援，自有为之援者。在布人受西欧教育，可扶助蒙人”。在陈毅看来，所谓外援，即日本方面的援助，此可谓“阴谋毕露”。<sup>3</sup>

彼时，日本政府确曾有经营外蒙古的计划。自从以协约国名义出兵西伯利亚之后，日本对盘踞沃木斯克（今译为“鄂木斯克”——编者注）的旧俄远东政府首脑高尔察克及占据赤塔之旧俄将领谢米诺夫予以种种援助，其目标即在于将俄国在满、蒙地区的权利让渡于己。1918年5月16日，日本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中国将领靳云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关于这一协定的意义，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做了如下评估：“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

<sup>1</sup> 《收驻库伦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3月19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47-349页。

<sup>2</sup> 《收田中玉条陈治蒙计划》（民国八年4月11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73页。

<sup>3</sup> 《收驻库伦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7月1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22页。

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加快帝国经济的发展。”<sup>1</sup>据此可知，通过该“协定”，日本可派遣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填补旧俄政府的权力真空。就外蒙古问题而言，该协定的实施细则有“日本军队一部得由库伦进入贝加尔”之规定，此即日本取得了堂堂正正经营外蒙古之途径。

随后，在建立“大蒙古国”的号召下，受日本扶持的谢米诺夫数次遣员前往外蒙古，试图联络、游说外蒙古王公喇嘛，开展联合建国运动。迨至1919年11月外蒙古宣布取消自治、还政中央，虽然苏维埃俄国政府认为该事件与己无关，而日人则视为与日本经略外蒙有重大之妨碍，故“阴扰外蒙古之举”愈加汹涌。期间，中外媒体迭载日本政府扰乱外蒙古的密电。根据这些来自于日本军方、外交机构的文档提供的信息可知，日本政府曾派出多拨情报人员，携带巨款，分往内外蒙古各地，游说王公，陈以利害，并表示愿意承担军费政费借款及军械各项，以助其恢复自治权的名义，谋求对蒙古地区的渗透。时人观察到，“日本联络蒙匪，着着奏效。民国九年九月，日本仍招谢米诺夫至大连，协议仍由日本供给款械，令其残部，与蒙匪结合，攻取外蒙为根据地。遂肇民国十年二月，谢米诺夫部将恩琴，与蒙匪合力、攻陷库伦之事，此由于日本经营外蒙，以演成现在蒙祸之实际情形也”。<sup>2</sup>

事实上，最初日本政府对外蒙古地区的经营，主要是通过谢米诺夫一部及其鼓吹的泛蒙古主义运动予以间接实施的。伴随着谢米诺夫一部在远东地区军事上的失败，以及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扶持的蒙古人民党政权的建立，日本在外蒙古地区的经营动力逐渐衰竭。根据张作霖的观察，原来，这一时期恰逢朝鲜独立运动高涨，日本政府深恐该国受外蒙古独立运动影响，故而对于扶持谢米诺夫联合建国行动之热度稍减。<sup>3</sup>另据驻海参崴联络员周家树报告，外蒙古独立问题，皆言为日人及谢米诺夫所惑，然而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观察。根据他与日本司令部高柳少将的交谈中所了解到的信息，“现在萨拜喀尔及外蒙等处煽动蒙古独立之日人，为该国之流民，如由我国拿送日领，必当尽力惩办”。<sup>4</sup>此间日本政府逐渐减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干涉，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必须予以提出，即中国因素。根据“中美新闻社”的观察，日本最初支持谢米诺夫，乃是企图借其力量抵制苏俄政府军队；然而随后日本政府认为谢氏经营外蒙古之野心于日本不利，“日本若助谢氏，将失去其北京友人（即武人派）之同情，盖中国在蒙丧失势力，其意味即为北京武人派大失威信也”。<sup>5</sup>迨至1921年11月，苏俄政府与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签订了“友好关系协定书”，双方互相承认主权，并正式建交。日本政府对此追悔莫及，束手无策。日本出兵西伯利亚长达4年零2个月，耗资九亿日元，其目标原本是为了援助谢米诺夫，并乘机将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防止出现瓜分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的竞争者，然而这一计划因苏俄军队的介入最终化为泡影。事后，日本军事评论家伊藤正德称出兵西伯利亚为日本国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sup>6</sup>

综观此间日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举措，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泛蒙古主义实施的大蒙古国构建运动，努力将自己的力量渗透至外蒙古地区；但这种主观愿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还需进一步考量。不可否认，在与日本毗连的远东地区，日本自认为其拥有无可置疑的利益，亦愿意为此利益展开各种外交、军事行动，这也是日本政府扶持高尔察克、谢

<sup>1</sup>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1967年，第594页。

<sup>2</sup> 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

<sup>3</sup> 《收参陆办公厅函·张巡阅使作霖函》（民国八年五月七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93页。

<sup>4</sup> 《收参陆办公厅函·驻海参崴联络员周家树报告蒙边之动静》（民国八年五月七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93页。

<sup>5</sup> 《外蒙现状之西讯》，《申报》1919年6月29日第6版。

<sup>6</sup>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1—182页。



米诺夫等部的原因所在。但对于外蒙古地区，日本是否抱有志在必得的愿望，值得商榷。毕竟，当时的外蒙古地区已经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日本，以及英、法、美、俄国残余势力、中国政府和“自治”外蒙古上层的博弈之地。因此，日本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延伸至外蒙古地区，不得不面临多方力量的反制。在此情形下，日本政府推动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并未获得预想的收益，其结果，日本政府不得不战略放弃外蒙古，进而在稍后的一段时期内开始逐步退出外蒙古。

## 六、构建“亚洲边疆”：英国人的外蒙古想象

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当1919年中国发起对外蒙古的收复运动之际，英国人亦颇感紧张。当然，这种紧张的缘起并非无迹可寻，1919年初，北京政府开始尝试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英国人看来，“这是自1910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sup>1</sup>。原来，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正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北京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修约”，试图将西姆拉会议签订的一纸协议落到实处，同时拟再将昆仑山以南、唐古拉山以北等处划入内藏地区，是以对影响恢复中英西藏问题谈判的相关情形颇为关注。

鉴于上述中国政府在西藏施展的“进取性”政策，证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国外交部将1919年中国政府的征蒙行动视同1910年赵尔丰在西藏实施的改土归流，认为中国政府正谋求单方面改变西藏的既有地位。1919年4月，外界风传中国政府拟出兵外蒙古。为此，英国公使朱尔典专程会晤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篆，直指中国政府派兵入蒙破坏了中俄协议。陈篆解释称，此举实为自卫起见，以防俄国过激派之窜入；另外，恰克图条约所规定俄国维持外蒙古地方秩序一层，现在已经不能正常履行，且俄人将来组织何种政府，中国政府亦无从推知，故向外蒙古派遣军队实为中国政府职责所在。然而朱尔典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出兵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或另有其他企图。<sup>2</sup>迨至1919年11月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领军队抵达库伦，强力取消外蒙古自治地位，英国人感到更加紧张。为维护英国在西藏利益计，11月22日朱尔典致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内称：“徐树铮在蒙古恢复主权无疑对西藏问题有影响，强化了中国军方拒绝对西藏人让步的立场。”<sup>3</sup>在朱尔典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它将使中国人民更加有理由相信，既然外蒙古可以取消自治，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西藏亦将难允自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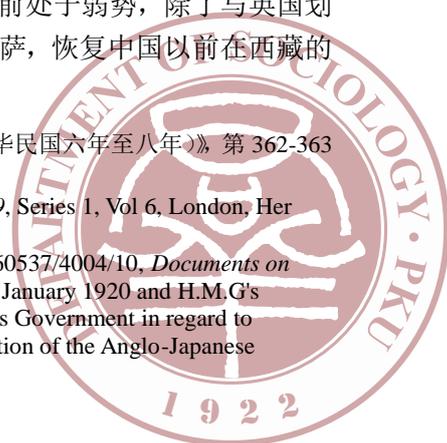
英国人的担心并非多余。1919年12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答复英国外交部有关西藏修约谈判问题的电文中即指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西藏的地位与外蒙古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有些类似。后者现在已经请求取消自治，如果政府在当前这个时候与英国政府就西藏问题签订一个协议，那么，中国民众将会很难理解政府的这一行为。我们一直以来非常体谅英国政府签订一个协议的良好愿望，但鉴于当前的政治局势，双方开展谈判是无益的。”<sup>4</sup>朱尔典还联想到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发表的一纸“艳电”，内中声称“西藏本属中国领土，多年来与川构怨，兄弟阋墙，自应兄弟解决，万不能由他人干预”，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弱势，除了与英国划定边界以外别无选择，但中国最终将毫无疑问地想要派遣军队前往拉萨，恢复中国以前在西藏的

<sup>1</sup> C. Bell,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London and Glasgow, 1946, p. 217.

<sup>2</sup> 《代理总长会晤英朱使问答》（民国八年四月二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62-363页。

<sup>3</sup> E. L. Woodward, Rohan Butler, ed. *Document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Vol 6,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56, p. 847.

<sup>4</sup> Note from the Chinese Minister in London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December 6) 160537/4004/10,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 Volume 6: Central Europe, June 1919 - January 1920 and H.M.G.'s Relations with Japan, June 1919 - April 1920, CHAPTER II Attitud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 and in reg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June 28, 1919-April 1, 1920, pp. 873-874.



地位。根据朱尔典的观察，这代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在西藏问题上的真实看法，同时亦表明，中国方面对于英国政府提出的西藏修约问题并不心甘情愿，仍然期待使用武力重新征服西藏。并且，自中国政府恢复其在外蒙古的主权以来，这样一种态度日渐得以强化。<sup>1</sup>正是基于前述那样一种想象中的担忧，此间朱尔典在与陈篆的谈话中表达了强硬立场：“中国一定会通过威胁西藏人，就像威胁蒙古人一样，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但她可能发现这项任务是非常不同的。”<sup>2</sup>

随后，为进一步研判外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演变及其对西藏局势的影响，英国政府于1920年8月前后派遣领事官员台克满赴库伦考察。台克满于1920年8月28日在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书中谈到了他在库伦的工作，“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怀疑，我最初的意图是，尽可能地拒绝直接与博格达汗及一些蒙古王公喇嘛进行接触，但自从我到达这里后不久就接到了来自外蒙古官府的邀请，后者迫不及待地要求与我会面。”在外蒙古逗留期间，台克满与外蒙古最有影响力的三个王公在一家美国公司的房子里进行了会谈。谈话中，外蒙古方面明确提出，希望英国方面给予必要帮助。在台克满看来，外蒙古方面之所以对于英国政府有所期待，乃是基于蒙古人与西藏人的密切关系，并且他们也知道，英国政府一直以来非常支持西藏自治。

在与台克满的交谈中，外蒙古王公将中国政府1919年以来在外蒙古地区实施的种种行为视为一种欺诈性手段；并描述了中国人是如何将外蒙古的自治予以取消，并使之看起来像是蒙古人自愿宣布取消的那样。王公们还谈到，现在俄国已经崩溃，他们不得不直面中国，但他们对中国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感和不信任感，因此，惟有求助于美国和英国，以期恢复他们的自治权利。台克满从与王公的交谈中得知，大部分外蒙古人主张用暴力手段将中国人驱逐出外蒙古，另有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将中国人礼送出境。对于外蒙古王公喇嘛的请求，台克满则虚与委蛇，惟向他们解释称，他本人访问库伦纯属一次旅行，自己所说的也只是私人性质的谈话而非代表官方，同时他还告诉外蒙古人，英国政府在外蒙古地区的利益纯粹出于商业性的，尽管英国对于他们努力追求自主的愿望抱有同情，但他们不能期望从英国政府这里获得恢复外蒙古自治的支持。然而，外蒙古王公并不灰心，进而将话题转向西藏，称既然英国政府可以维护西藏的自治地位，那么对于外蒙古亦应持同样的立场。台克满解释说，英国政府在这两个地区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对于西藏而言，英国和其有条约关系，并且基于英印政府漫长的边境线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原因，英国政府在该地区拥有独特的利益；而对于外蒙古地区而言，英国政府并不存在此诸方面的诉求。

这些王公还明确提出，希望由台克满捎信给英国和美国政府，请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并询问这样做是否明智。台克满的回答是，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但鉴于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受到条约保护，并且美国 and 英国政府均没有收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取消自治的照会，不应指望在当前阶段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显而易见，中国政府不会欢迎外国政府干涉其内政。在场的外蒙古王公对于台克满的表态感到明显不满，一再要求台克满对外蒙古的未来走向提出建议，并一再提醒台克满，外蒙古与西藏有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利益。但在台克满看来，或许因为宗教的原因，一些喇嘛会往来于库伦与拉萨之间，但要说哲布尊丹巴与达赖喇嘛之间有密切关系，实在值得怀疑。

台克满建议蒙古人可以利用当前的机会直接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和平恢复外蒙古自治：“如果他们仅仅向大总统表达自治的愿望，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中国共同体当中，享受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五族平等，而不是希望以任何方式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许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台克满坦率地跟王公们说，不要过于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帮助而恢复自治，更

<sup>1</sup> Sir J. Jordan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January 13, 1920),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CHAPTER II Attitud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 and in reg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June 28, 1919-April 1, 1920, pp. 860-861.

<sup>2</sup> E. L. Woodward, Rohan Butler, ed. *Document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Vol 6*,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56, pp. 867-869.



可能的是，或许可通过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来实现自身的期望。王公们亦承认陈毅的复职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但他们向台克满抱怨，如果没有第三方力量的干预，外蒙古地方直接与北京政府开展的谈判将会面临很大困难，在他们看来，通过他们自身不太可能经由中国渠道与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取得联系。最后，台克满建议，在北京的蒙古政要们没有返回之前，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后者很有可能正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获得解决当前外蒙古问题的办法。

台克满在报告中谈到了跟外蒙古王公多次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即这些外蒙古人在谈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的时候，和其所接触过的西藏东部的藏人使用的措辞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不厌其烦地谈及当前中国政府不值得依靠，以及中国官员承诺和保证的虚伪性。<sup>1</sup>关于西藏问题与蒙古问题的关联性，台克满在《访问库伦报告》中指出：一直以来，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的发展，自1909~1911年中国试图通过军事力量确立对蒙古和西藏的直接控制以来，结果却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导致了两者的独立，他们均将汉人驱逐出境，隔绝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历史再度重演，1919年徐树铮进入蒙古与1910年赵尔丰进入西藏有极大的相似性。在两个案例中，伴随着中国军队开进两个“国家”，“中国人提出了各种毫无价值的承诺和各种特殊的借口”。1910年的西藏事件中，“中国提出的借口是维护商业的必要性”；在1919年的外蒙古事件中，“则是声称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入侵”。在这两个案例中，结果是相同的，即“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政府被推翻”，中国人接管了当地官府的行政，并且由中国军队完成了对两个地方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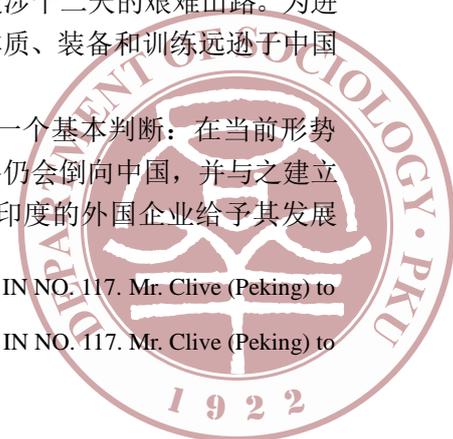
与朱尔典、寇松对最近发生的中国军队征蒙行动抱有极大警惕相异趣的是，台克满主张从“积极的方向”看待此问题。台克满认为，最近发生在库伦的事件，包括哲布尊丹巴蒙受中国士兵的侮辱，拉萨方面已经有所了解，这也许会动摇藏人本已脆弱的心灵，使他们坚定反对中国政府的决心，而不再受到中国人的“哄骗”再次接受中国人的统治。因为，“1919~1920年徐树铮领导下的中国军队在外蒙古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被视作对藏人的一次警示，即如果中国军队被允许使用军事手段控制拉萨，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不管中国政府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保证，不管北京政府提出‘五族共和’的陈词滥调以保障藏人的利益，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几千人的中国军队进驻拉萨，西藏自治的遗迹将会被一扫而尽，很有可能那些加诸蒙古人身上的虚假借口（即西藏人自己想要回到中国的怀抱）将再次被提出”。

此外，台克满还从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了西藏与外蒙古地区面临的不同形势。他认为，西藏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从张家口到库伦，是穿越一个平原，一个士兵徒步行军需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但如果乘坐汽车的话，只需要四到五天的时间。除此之外，这一线路非常适合铺设铁路和开设飞机航线；至于从打箭炉到拉萨，需穿越世界上最为难行的山地，需要花费两倍于前者的时间，并且，在这里建设从东到西的铁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除此之外，作为中国政府对蒙行动基地的张家口，有一条铁路与北京相连，从张家口到库伦乘坐汽车行军只要几天的时间；作为从中国到西藏的门户的打箭炉，与成都之间需要跋涉十二天的艰难山路。为进一步宽慰英国外交部，台克满还特别强调，成都不是北京，川军的体质、装备和训练远逊于中国北方军队。<sup>2</sup>

基于前述诸种因素，台克满对于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俄国就此一蹶不振，那么，基于地理上的原因，外蒙古最终仍会倒向中国，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而对于西藏方面来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同意通过来自印度的外国企业给予其发展

<sup>1</sup> Report on a Visit to Urga by Mr. Teichman, URG, August 28, 1920. ENCLOSURE IN NO. 117. Mr. Clive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December 1) No. 663 [F 3009/152/10].

<sup>2</sup> Report on a Visit to Urga by Mr. Teichman, URG, August 28, 1920. ENCLOSURE IN NO. 117. Mr. Clive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December 1) No. 663 [F 3009/152/10].



“自己国家”必要的帮助，与之保持友好关系，那么，可以确认，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以及其与印度的天然联系，西藏当局必然长久地倒向英国政府这边，而不是中国。尽管西藏面临的安全环境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糟糕，台克满依然强调，为有效保护英国政府与藏人利益，需在英印政府的帮助下大力发展西藏，允许藏人加强自身的力量，这样一来，“他们才会在一个相对团结和强大的中国面前保持一个确定的位置而不为所动。单靠一个三方的协议并不能完全保证一个虚弱和封闭的西藏免受中国的侵略，因为中国人会一直寻找一个将该协定置于一边、强迫藏人自己废除该协定的机会”。<sup>1</sup>

台克满访问库伦期间，外蒙古官方为拉拢英国，特意向其说项，邀请英国政府在库伦设立领事馆。台克满认为，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西藏问题紧密相关：如果英国政府接受外蒙古官府的请求，在库伦设立了领事馆，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则是，设若美国政府和其他的外国政府打算在西藏设立领事馆，英国政府又将如何应对？其结果，此诸情形将置英国政府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台克满看来，如果其他国家亦在西藏设立领事馆，西藏势必成为一个面向各国开放的地区，那么，英国在西藏地区的独占性地缘政治优势和影响力将会因此而丧失。<sup>2</sup>不过，台克满观察到，对于在外蒙古设立领事馆事，美国人显得更为迫切，基于这方面的原因，似乎不会对西藏的现状造成尴尬的影响。尽管台克满对于设立领事馆一事抱持谨慎的乐观，但英国外交部似乎并不这样认为，通过细致入微地比较研究与不研究的得失，它最终放弃了这一设想。

彼时，英国政府还深入考察了外蒙古问题中的国际性因素，即日本人在中国政府征蒙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英国人看来，日本人拿了一手好牌，他们已经开始收获他们的丰硕外交果实。随着高尔察克在俄欧地区的败退，由日本人一手扶持的谢米诺夫一旅的实力逐渐壮大，有日本人的支持，并开始以完成独立为号召。<sup>3</sup>围绕此问题，英国政府曾与日本政府有过多次交流，要求日本政府承诺不对西藏抱有任何幻想。尽管日本对此做过解释，但英国人并未感到释怀，根据相关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他们做出如下判断：日本人试图填补俄国人在内亚中央的权力真空，基于这样一种诉求，日本人除了对外蒙古有所企图外，对西藏亦必有相应的图谋，亦即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对英帝国在亚洲的边疆形成了重要挑战。根据英国人的观察，最近的事态表明，日本不仅追求对中国的完全统治，而且还试图在内陆亚洲事务中发声，并拥有更大更多的决定力。<sup>4</sup>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1919年8月14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在向寇松的报告中表达了日本人正在努力取代俄国人在外蒙古地位的担忧。该报告认为，从1907年开始，日本通过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权益。在英国人看来，随着俄国人的日益衰落，日本努力追求在该地区北部的扩张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蒙古人在多大程度上会默许这种既定的命运，仍有待观察。<sup>5</sup>朱尔典还在报告中声称，根据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中国政府不得干涉外蒙古地区的内政，而徐树铮的所作所为直接与中俄声明文件的相关条款精神相悖，这表明，中国政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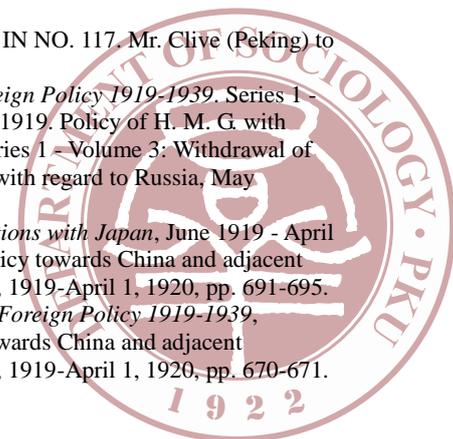
<sup>1</sup> Report on a Visit to Urga by Mr. Teichman, URGA, August 28, 1920. ENCLOSURE IN NO. 117. Mr. Clive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December 1) No. 663 [F 3009/152/10].

<sup>2</sup> Report on a Visit to Urga by Mr. Teichman, URGA, August 28, 1920. ENCLOSURE IN NO. 117. Mr. Clive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December 1) No. 663 [F 3009/152/10].

<sup>3</sup> Foreign Office Memorandum on Siberia [165784/11/57],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 Volume 3: Withdrawal of German Forces from the Baltic Provinces July-December 1919. Policy of H. M. G. with regard to Russia, May 1919-March 1920. Eastern Galicia, June-December 1919. Series 1 - Volume 3: Withdrawal of German Forces from the Baltic Provinces July-December 1919. Policy of H. M. G. with regard to Russia, May 1919-March 1920. Eastern Galicia, June-December 1919.

<sup>4</sup> Series 1 - Volume 6: *Central Europe, June 1919 - January 1920 and H. M. G.'s Relations with Japan, June 1919 - April 1920*. CHAPTER II Attitud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 and in reg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June 28, 1919-April 1, 1920, pp. 691-695.

<sup>5</sup> Sir J. Jordan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October 21),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CHAPTER II Attitud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 and in reg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June 28, 1919-April 1, 1920, pp. 670-671.



在撕毁中俄声明文件的有关条款。<sup>1</sup>英国人之所以对徐树铮的征蒙军队保持高度关注，乃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徐树铮背后所代表的皖系军阀与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由得让英国外交部产生一种联想：徐树铮征蒙是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日本人的利益？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对于外蒙古问题的关注，最初因其维护西藏既得利益而引起。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有极大的关联性，通过管窥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处置，即可预见到西藏地位之未来。基于同样目的，英国外交部亦非常在意日本人在外蒙古乃至远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其初衷仍然服务于维护其亚洲边疆安全之目标。关于这一点，寇松曾做了抒情式的阐述：“疆界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部每天每时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最为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一项艰苦卓绝、无休无止、需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发挥最敏锐的智慧和最刚健的精力来从事的工作。”<sup>2</sup>不言而喻，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领土收益之后，英国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边疆体系，用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往前扩张疆界，希冀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就英国政府在印度实施的边疆战略来看，诚如寇松所言，其目标在于为大不列颠帝国构建“三重边疆”：（1）内缘由英印实施行政管辖的边疆地带；（2）中间地带的“杜兰线”，或者说实施积极防御的疆界；（3）作为外部或者高级战略疆界的阿富汗边界。在寇松看来，由他具体实施的以印度为核心的边疆体系是当时世界上组织最有效的边疆体系，完全可以与古代的对应该案例和原型——罗马边疆体系相媲美。<sup>3</sup>

## 结 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1919~1924 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推动，即外蒙古自身、中国因素和苏俄因素。受此影响，1924 年以后的外蒙古政治地位表现出“三重性”：首先，在外界看来，它被认为是“红色帝国主义”，外蒙古就像沙皇俄国时期一样属于苏俄的“势力范围”；<sup>4</sup>其次，在政治意义上而言，中国仍然声称拥有对于外蒙古的主权地位，虽然它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最后，外蒙古地方精英坚持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21 年苏俄政府认可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并与之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sup>5</sup>当然，考察日、英两国对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的关注及其策略，必能进一步增进对该事件的整体性认识。

### 1. 外蒙古因素

需指出的是，有关先行研究对于外蒙古独立问题的考察，经常会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外蒙古地方精英多数时候是一个缺席者，外蒙古的命运完全由苏联与中国两个关联方所决定。<sup>6</sup>那么，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

16 世纪“新航路”开辟以降，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体系逐渐得以确立，“民族国家”的面孔亦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迄至 20 世纪初，一些落后的国家（如中华民国）亦步亦趋，

<sup>1</sup> Sir J. Jordan (Peking)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October 11).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CHAPTER II Attitud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 and in reg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June 28, 1919-April 1, 1920, pp. 691-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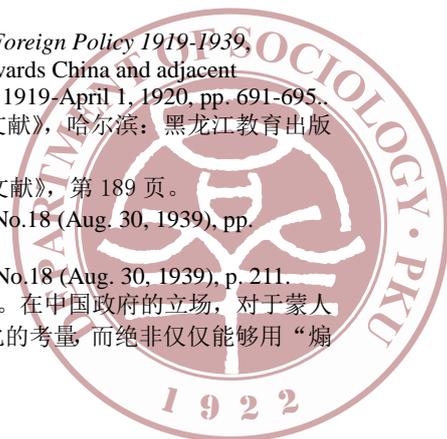
<sup>2</sup> 寇松，《论疆界》，张世明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158 页。

<sup>3</sup> 寇松，《论疆界》，张世明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 189 页。

<sup>4</sup> Kathleen Barnes, "Outer Mongolia on the World Stage", *Far Eastern Survey*, Vol.8, No.18 (Aug. 30, 1939), pp. 210-211.

<sup>5</sup> Kathleen Barnes, "Outer Mongolia on the World Stage", *Far Eastern Survey*, Vol.8, No.18 (Aug. 30, 1939), p. 211.

<sup>6</sup> 诸多研究均将外蒙古独立诉求的表达视为受“煽惑”的结果，事实并不尽如此。在中国政府的立场，对于蒙人之独立可称为“煽惑”；然则对于蒙古而言，宣布独立则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而绝非仅仅能够用“煽惑”一词所能涵盖。



开始向这一标准和模式看齐，努力迈入近代民族国家的门槛。彼时，与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历程相一致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决主义理念亦开始弥漫于东方世界，该理念经常被一些弱小民族的精英分子加以利用，服务于本民族的“独立建国伟业”。

回顾历史，最早于 20 世纪初，历史上讲蒙古语的各族人内部形成了“泛蒙古主义”运动，希冀将内外蒙古、新疆阿尔泰和俄国布里亚特等蒙古人居住的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大蒙古主权国家。“泛蒙古主义”作为一个现实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一部分外蒙古上层精英发起了外蒙古独立运动。1918 年之后，伴随着俄国旧政府的坍塌，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再度拾起了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旗帜，试图联合外蒙古上层王公喇嘛，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然而伴随着恩琴主导下的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垮台和拥有苏俄一共产国际背景的苏赫巴托尔领导下的蒙古人民党的上台，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接力棒开始传递到外蒙古革命者的手中。

彼时，“具有神权政治基础传统泛蒙古思想体系奇怪地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相结合，变成了独特的革命的泛蒙古主义”，然而其终极目标依然设定为：以某种方式将内外蒙古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sup>1</sup>其结果，1920 年至 1921 年期间，受苏俄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外蒙古革命党人将中国在外蒙古的统治及其昔日庇佑的神权政治视为革命对象，一个新的“蒙古国”得以生成。

## 2. 中国因素

中华民国成立以降，中国已经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乃是基于领土主权与国际法观念而构建，在这一国家政治体系框架下，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利益，被视为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必要前提。亦正基于民族国家的基本诉求，1919~1924 年期间北京政府针对外蒙古地方发生的形势变化做出了回应。

毋庸置疑，对“现实利益”之解读，是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历程的一把钥匙。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北京政府并非没有力量和客观环境来处理此等事件。最初，徐树铮能够提一旅之师慑服外蒙古王公喇嘛，并且外蒙古能够主动上书请求撤治，这可以作为明证。而随后一段时期，在北京政府内部，由于派系、集团的利益之争，段祺瑞的安福系被研究系从执政台上赶了下来。徐世昌上台以后，对安福系的徐树铮进行重点打击，致使其对外蒙古的统合缺乏必要支持，最后导致失败。稍后，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内部的政治派系、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纠葛，北京政府主导下的讨伐外蒙古运动仅停留在计划阶段而未及实施，国家的核心利益终未能得以保障。

## 3. 苏俄因素

早期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加强与亚洲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他们所奉行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列宁时期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旗帜即是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布尔什维克的外蒙古政策即是这样一个例子。

综观 1919~1924 年苏俄政府围绕外蒙古问题而展开的对华外交，既与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利益关切息息相关，又在一定程度上服膺于推进中国革命进程这一目标。具体来说，从推动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设想出发，苏俄政府不得不考虑到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反对外蒙古独立建国的声音；但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它又不得不将外蒙古置于自身的影响力之下。其结果，外蒙古的政治前途在苏俄领导人的心目中就像一张重要的“可兑换的牌”，这就直接造就了外蒙古政治地位的双重性：一方面，新近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依附于苏联，却是以主权国家的实际形态而存在；另一方面，苏俄政府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它

<sup>1</sup> (俄) E·A·别洛夫、C·Г·卢加宁著，陈春华译：《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书中蒙古问题的论点》，《蒙古史研究》第九辑，第 356 页。

在形式上又是“中国的一部分”。<sup>1</sup>

#### 4. 日、英因素

根据本文的研究，外蒙古二次独立前后，日、英两国对外蒙古政治形势的演变颇为关注。其时，日本政府透过由其扶持的代理人，高举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旗帜，一方面是为了将旧俄在中国东三省的权益尽数收归己有；另一方面则是趁外蒙古局势混沌之时，将自身的国家利益扩张至外蒙古。然而，就其结果来看，尽管日本试图在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有所作为，但收效聊胜于无。

英国人对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的关注缘起，大体而言，并非基于对外蒙古地缘利益本身的考量，而是出于维护对英国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战略边疆——西藏的独占性地缘政治利益的要求。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诉求，台克满外蒙古之行的考察重点，乃是将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进行关联性想象，预判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否可能对西藏当局采取类似外蒙古地区的行动。透过英国因素，我们应当认识到，边疆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性的问题，它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深入认知涉外的边疆问题，还需从世界史的视角予以观察。

数年以后，英国人如此评价 1924 年后外蒙古的政治地位：在外蒙古，由于苏联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干预，中国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了，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纯粹是一种姿态，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苏联将要放松控制外蒙古的意图。

## 【论 文】

### 现代性与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研究

黄 莹<sup>1</sup>

<sup>1</sup> (俄) E·A·别洛夫、C·Г·卢加宁著，陈春华译：《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蒙古问题的论点》，《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 年，第 357 页。

<sup>2</sup> 本文为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蒙古语言文化方向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年）。



**摘要:** S. 巴达姆哈坦 (С.Бадамхатан, 1934-1998 年) 是蒙古国著名民族学家, 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学科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借鉴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将真正民族学学科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引入了蒙古游牧社会的研究范畴, 其民族志代表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开启了蒙古国民族学田野研究的先河, 成为蒙古国民族志研究与书写的典范。在民族学理论方面, 他在蒙古国的语境下对民族学进行了准确的学科定位, 并对蒙古国境内主体和少数民族群的起源问题、民族形成问题、民族关系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 通过自己的学术劳动, 对蒙古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命题进行论证, 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学术层面的历史性建构。本文在掌握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总结。重点通过对《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部民族志研究著作进行解读, 分析 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志写作中对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贡献, 进而发掘其民族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对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理论贡献的探讨中, 笔者从他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对喀尔喀部族形成的论证、对蒙古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分析入手, 提出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学术上完成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关键词:** 民族志 民族学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 现代性 民族国家

## 导 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概况

#### (一) 选题意义

S. 巴达姆哈坦 (С. Бадамхатан, 1934-1998 年) 是蒙古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他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蒙古国境内各民族的族源历史、游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家庭、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 他曾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并加以研究, 全面把握了蒙古国这一社会实体的丰富面貌。

20 世纪中期, 民族学在蒙古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兴起, 作为蒙古国第一批民族学家, S. 巴达姆哈坦在借鉴西方学者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 将田野调查引入了蒙古游牧社会的研究范畴, 他的民族志代表专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开创了蒙古国民族学实地考查的先例, 成为蒙古国民族志书写的典范。他所描述的民族志, 运用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调查和研究方法, 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蒙古民族传统生活为背景的小部落, 而是游牧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他从民族学的整体理论高度对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社会变革做了详尽描述和科学评价。

在民族学理论研究方面, S. 巴达姆哈坦首次在蒙古语语境下规范了民族学的术语表达。他的研究著述, 反映了一个民族学家对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把握。他将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从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 转向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 使民族学从历史学研究领域脱离出来。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长期调查工作中, 他以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的调查研究为基础, 将一些部族模糊的族源问题加以考证, 完成了众多氏族部族地区文化、身份划分等界定工作。他明确提出喀尔喀蒙古人是蒙古民族的主体, 喀尔喀文化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集合。他所领导的《蒙古国民族志》三卷本等学术著作编纂工作, 对确立现代背景下蒙古国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建构蒙古国境内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蒙古国国内外学者对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地位给予了肯定, 对他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借鉴, 但对于这样一位在蒙古国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学家, 其民族学思想研究还存在

<sup>1</sup>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蒙古研究项目负责人。

比较广阔的拓宽空间。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实践等方面进行初步梳理和总结，进而探寻在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蒙古国民族学如何书写游牧文明、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如何促进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独特过程。同时希望本文能够为我国国内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蒙古国民族学的崭新视角。

## （二）研究概况

蒙古国学者 A. 敖其尔明确指出：“哈坦先生对蒙古国民族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已经到了对他的学术遗珍进行研究整理的时候，并且应该对他的自传、生平进行研究。”A. 敖其尔《S. 巴达姆哈坦及其家族研究》专题论文（2004）中，通过对 S. 巴达姆哈坦家谱和《蒙古秘史》的研究论证，考证了他来自黄金家族的事实，但未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评析。G. 策仁汗达、D. 策旺道尔基、L. 毕力格图、O. 普列布等学者或是对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生涯撰写了概念性文章，或是对他的某项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做了纪念性评议，在蒙古国迄今为止还未曾有人对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做出全面深入地探讨。

在国际上，S. 巴达姆哈坦的一部分著作已经被俄、法、日、英等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受到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然而人们在认识和接受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成果时，大多数是将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定论加以引用，关于他的学术思想的专门研究至今还是空白。

在我国，蒙古学界的民族学人类学家，虽然对他的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却没有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同时对他的接受也仅限于直接引用而未加以分析；而在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中，他的学术思想更是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with 资源来源

###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其中包括：对民族学基本知识的掌握、对相关学术流派演进的梳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分析和民族志写作的析理，以及族群理论和现代性有关理论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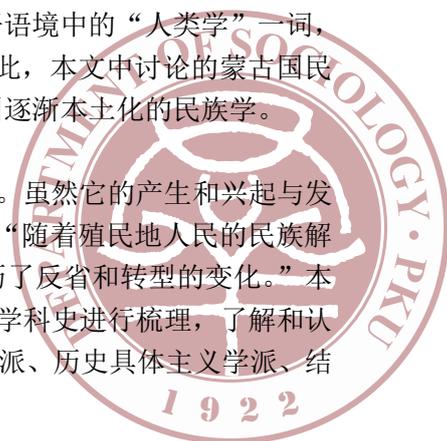
#### 1.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差异

人类学（Anthropology/Хүн судлал）和民族学（Ethnology/Угсаатны зүй）都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学科。一般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问，其中包括四个分支学科：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生物或体质人类学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关联，而后三者侧重于人文社会学科分类的文化主旨，狭义研究则仅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然而由于学术研究的传统不同，学科发展存在着关联性和复杂性，如果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人类学具有英美传统，民族学具有德法俄传统。”尽管如此，“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仍是相通的，学术研究的多元领域叠压与趋同也相当明显，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也在名称上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加以并称，以调节那些或多或少的看法上的差别。”

蒙古国的民族学继承了带有欧陆传统的前苏联民族学学科特点，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加以区别，主要围绕民族工作的任务开展对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和部族的研究，对族源考证、民族识别、族群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关注，蒙古语语境中的“人类学”一词，则偏重于“体质人类学”，注重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研究与测量。因此，本文中讨论的蒙古国民族学是受欧洲民族学传统（主要为俄苏学派）的理论影响，在蒙古国逐渐本土化的民族学。

#### 2. 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梳理

人类学民族学在 19 世纪中期才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虽然它的产生和兴起与发现新大陆、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但是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的挞伐，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也经历了反省和转型的变化。”本文在解读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时，首先是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史进行梳理，了解和认识其理论的推进过程（从古典进化派到传播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具体主义学派、结



构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发展进入反思与重构阶段,“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更加开阔,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使这些学科的现实性显著增强。”本文试运用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来评析 S.巴达姆哈坦作为学科带头人所领导的蒙古国民族学研究。同时我们也应注意,这些理论在形成和发展中都是相互依赖和补充的,在使用时应该结合观察,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 3. 田野工作 (field work/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 与民族志 (ethnography/этнoграфи) 的分析

“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sup>1</sup> S.巴达姆哈坦将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蒙古国民族学,奠定了蒙古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以1959-1962年赴蒙古国库斯古勒省森林地区进行的调查活动最为重要。通过四年的长期考察与深度访谈,他撰写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以及多篇研究著作。本文以 S.巴达姆哈坦所描述的典型民族志为文本,结合他本人的相关理论研究著述,分析 S.巴达姆哈坦如何将西方的民族学经验进行本土化、规范化的过程。另外,重点以克利福德·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为依据,将他对文化“最深刻的解释”(即被研究对象自我讲述的理解)在文中加以展现,深入探讨 S.巴达姆哈坦对游牧文明命运变迁,以及现代社会变革等问题的关注。

### 4. 跨文化比较:与中国民族学经验的比较

在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史入手进行探讨的同时,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与蒙古国的情况相比较,对 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的民族学最初由西方传入,20世纪三十年代初,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建国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多数人主张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民族学的对象是民族。”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民族学家又掀起了对民族学人类学反思的热潮。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研究中,也是中国民族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蒙古国境内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S.巴达姆哈坦通过多篇论著,反映出他的民族学研究思想从未脱离对蒙古国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从未放弃为繁荣民族文化做出的贡献。关于 S.巴达姆哈坦总体学术思想的把握,可以借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费老的文章中涉及了民族“多元起源”、“凝聚核心”、“多元交融和汇集”等问题,提出了“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等观点,这对我们的思考和研究都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然而仍需注意,在进行比较借鉴时,也不可一味类比,忽视中国民族学与蒙古国民族学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另外,因 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涉及到中蒙俄三国边境历史问题,在此将参考我国连续史地研究相关资料,以补充 S.巴达姆哈坦在论述中的不足。

### 5. 全球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现代性的思考

S.巴达姆哈坦的学术论著,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以来蒙古国境内民族、部族的研究范围,他将学术研究置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不平等、阶级冲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来唤醒民族情感与理想,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中,铸就了现代化的蒙古国家和新的民族概念。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的作品与民族解放运动、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 (二) 资料来源

本文写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有:S.巴达姆哈坦学术著作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sup>1</sup>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编,《写文化》,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一版,第1页。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ан”）（УБ, 2002）、《S.巴达姆坦论著集》第二卷（“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үтээлүүд II”）（УБ, 2004）、《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үтээлүүд III”）（УБ, 2005），以及 В. 巴达姆奥云（S. 巴达姆哈坦的女儿，蒙古国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研究员）所提供的相关出版著作、刊物、相片等珍贵资料。

## 第一章 解读民族志经典著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sup>1</sup>》

### 第一节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生平

蒙古国民族学家 S. 巴达姆哈坦于 1952-1957 年留学前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师从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 С. А. 托卡列夫（С. А. Токарев）<sup>2</sup>学习民族学。回国后，他就职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并于 1959—1962 年在蒙古国库斯古勒省先后进行了长达 4 年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部专著，并以此获得了莫斯科大学民族学副博士学位。他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工作了 38 年，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学科独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蒙古国第一代民族学家，S. 巴达姆哈坦在借鉴东西方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将真正民族学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田野调查引入了蒙古游牧社会的研究范畴，其民族志代表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开启了蒙古国民族学实地考察的先例，成为蒙古国民族志研究与书写的典范。在民族学理论方面，他首先在蒙古语语境下规范了民族学的术语表达，将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从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转向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使民族学从依附于历史学研究转向独立的学科领域。为了明确蒙古国民族构成问题，他用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将蒙古国众多民族部族的族源、文化，利用口头文学、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的结果相结合，不但比较准确地考证了族源模糊的达尔扈特、驯鹿人、和屯人之来源，同时也描绘了蒙古国众多民族部族在近代 200 年间的社会组织、生活情况、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迁。1985-1991 年，S. 巴达姆哈坦先生主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蒙日联合“三河计划”课题，旨在寻找 10-15 世纪三河流域蒙古人的起源、历史、文化，明确了孛儿只斤、泰赤兀等其他部族的地域，并开展了寻找成吉思汗之墓的考察计划。这次考察从历史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对蒙古国境内的 25 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完善了田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依据。1990 年，S. 巴达姆哈坦所著的《驯鹿人民生活概述》（1962）、《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1965）、《孛儿只斤喀尔喀》（1972）、《孛儿只斤宴会习俗》（1973）分别在日本、法国、英国出版，其他论文也分别在俄罗斯、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出版发行。<sup>3</sup>总体来说，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事业，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产生、发展，成为历史学科的独立分支做出了宝贵贡献。蒙古国学者称其为“蒙古现代民族学奠基人”。<sup>4</sup>

### 第二节 解读蒙古国民族志经典《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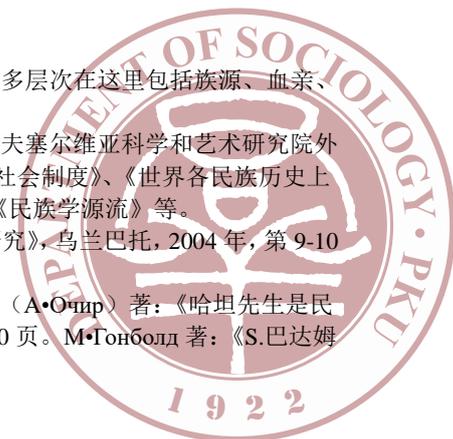
S. 巴达姆哈坦的早期著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是蒙古国民族志经典著作。作者在

<sup>1</sup> 笔者暂将 ястан 译为部族，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多层次内涵，多层次在这里包括族源、血缘、文化、宗教等，随着边界在改变，族称也在发生着改变。

<sup>2</sup>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托卡列夫是前苏联民族学，家、历史学博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代表著作有《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志》、《十七-十八世纪雅库特人的社会制度》、《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宗教的早期形式及其发展》、《俄国民族学史》、《外国民族学史》、《民族学源流》等。

<sup>3</sup> G. 策仁汗达（Г·Цэрэнханд）：《S. 巴达姆哈坦是蒙古民族学奠基人》，《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 年，第 9-10 页。

<sup>4</sup> G. 策仁汗达（Г·Цэрэнханд）：《S. 巴达姆哈坦是蒙古民族学奠基人》，А·奥其尔（А·Очир）著：《哈坦先生是民族学创始人》，分别载于《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 年，第 6 页、第 170 页。М·Гонболд 著：《S. 巴达姆哈坦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载于《史纲》，乌兰巴托，2006 年。第 20 页。



蒙古国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族<sup>1</sup>进行了长达4年的田野调查，前14个月，他作为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小组成员，对500人进行了34种问卷调查。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当地人中间，像他们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用他们的方言交谈，从最稳妥的渠道收集资料——亲自参与观察并记录他们的口头讲述。这本著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几乎收录了达尔扈特部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设计调查计划时，每一年都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工作纲要，积累了大量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材料，用民族志考察的方法考证了达尔扈特部族的族源问题，记述了当地的经济形式、社会变革、家庭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并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研究。蒙古国民族学家G·策仁汗达认为，“S. 巴达姆哈坦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为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sup>2</sup>“他的思想，得到了蒙古国历史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界的肯定。”<sup>3</sup>他关于达尔扈特部族和驯鹿人的专著，于1994年被授予国家奖。<sup>4</sup>

《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一书全面体现了S.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从田野作业到民族志写作，一位民族学家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且还要在其所记录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这才是一部合格的民族志研究成果。1958年，S. 巴达姆哈坦在《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中指出，蒙古国的民族志研究有两个基本方向：“1、研究我国境内民族部族的现代生活，进而认识过去的社会制度结构以及生产生活状况；2、研究近现代以来在人民群众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民族部族的融合，特别对社会主义民族起源形成过程、具有社会主义主题和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成原因进行研究。”<sup>5</sup>该著作所记录的文化现象包括达尔扈特部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如：达尔扈特部族的近现代史、氏族和地名来源、经济情况、居住模式、饮食、服饰、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民间知识、艺术、宗教信仰等，以达尔扈特部族的历史渊源为内在联系，绘制了达尔扈特部族加入民族部族融合、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进程。笔者拟从S.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思想来源入手，进而分析他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本著作中，对民族学理论的构建以及对民族志写作方法的探寻。

### （一）《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写作思想来源

“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演变决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所以如此的缘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如果把民族学从整个社会总体中分离开来，我们所能见到的就只是琐碎的史料的堆积或支离破碎的片断。”<sup>1</sup>S. 巴达姆哈坦对《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思路和观点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留学前苏联的学术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二、20世纪五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的需要。他在中学时代曾受到柯兹洛夫（Киселев）、呼·普日来（Х.Пэрлээ）两位考古学家的启蒙，后来在前苏联罗蒙诺索夫大学、莫斯科大学留学时，师从苏联著名民族学家托卡列夫走上了民族学研究之路。

关于民族学的定义和学科定位，各国专家持有不同看法。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思想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经过了几个阶段。因此笔者不主张将其学术思想与某一学派完全对应，而需要结合蒙古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来分析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

<sup>1</sup> 在库斯古勒省的调查集中于乌兰-乌拉、林钦勒浑贝、巴彦珠尔赫、汗赫苏木，在西北部与前苏联联邦国图瓦、布里亚特自治联邦国家接壤，东部与库斯古勒湖毗邻。

<sup>2</sup> G·策仁汗达（Г·Цэрэнханд）：《S. 巴达姆哈坦是蒙古民族学奠基人》，《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6页。

<sup>3</sup> M. 贡包勒德著（М.Гонболд）：《S. 巴达姆哈坦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载于《史纲》，乌兰巴托，2006年，第18页。

<sup>4</sup>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өрийн соёрхол” M. 贡包勒德著：《S. 巴达姆哈坦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载于《史纲》，乌兰巴托，2006年，第18页。

<sup>5</sup>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页。



特部族》这部民族志的调查和研究思路，具有以下特征：

### 一、注重对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

蒙古国民族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发展，继承了带有欧陆传统的前苏联民族学的学科特点，蒙古国民族学侧重于对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的族源考证问题，而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起，这几乎成了前苏联民族学的中心课题。19 世纪，沙俄为了稳定国内外局势，开始了对国外民族的研究，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民族学发展方向有所转变，为巩固国内革命的胜利果实，要求民族学者重视对苏联境内各民族的调查研究，各民族也要求了解本民族的历史真相，这种需要促进了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1957-1978 年间，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民族一体化”和加强对世界民族的研究。这一指导思想深深影响了蒙古国民族学的发展，在蒙古境内进行考察的蒙苏联合考古队，以及蒙古国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做了大量野外考察和资料积累，对民族起源的最初阶段和居住在蒙古境内的居民文化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论证，都对解决民族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二、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人们喜欢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从民族学本身的学科结构来讲，民族史研究也应该成为其一部分。S. 巴达姆哈坦从丰富的史籍中搜集出大量资料，对蒙古国众多民族部族的起源、精神文化、经济生产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或新的解释，这是蒙古国民族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他在自己的论著中从性质上区分了社会主义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他在原文中称其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在他看来，民族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世界上众多民族的文化类型、经济类型，他们的起源、历史分布、相互联系等，民族学的基本材料是人民”。<sup>2</sup>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民族学能够帮助人民了解真实的历史，能够填补和修正史料记载中的不足和错误，民族学对历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他曾提出：“对历史学著作的创作，需要民族学材料。民族学不仅与国家、人民的历史研究相关，同时也具有在民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对其积极影响、进行讲解的任务。因为民族学能够很好地反映民众的落后思想、信仰和社会道德的起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国民族学的大力发展在对历史学研究的促进方面是不容置疑的。”<sup>3</sup>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他针对民族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提出“我国的民族学是最年轻的学科，因此首先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分界、历史分布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研究保留至今的原始风俗习惯、起源、现代依然流传的原因，为人们做出解释说明，帮助他们远离旧俗，传播社会主义新风貌，是我们的近期目标。”<sup>4</sup>

### 三、民族学与人类学相结合

在蒙古语语境中，民族志称作“Угсаатны зүй”，民族学称作“Угсаатны судлал”，民族志对应现代学术概念中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倾向于理论研究，但是人类学称为“Хүн судлал”，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将民族学和人类学清晰地区别开来，他所使用的“人类学”（хүн судлал），多指体质人类学。在苏联民族学理论中，将人类学视为民族学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Ю.В. 勃罗姆列伊在《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中写到：“人类学新方法的运用，对于解决族源问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sup>5</sup>1958 年，蒙古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同组织田野调查组对前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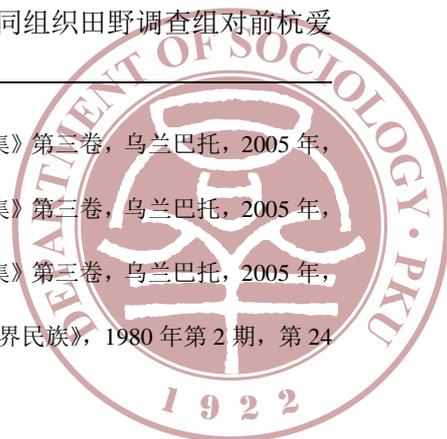
<sup>1</sup> 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第 15 页。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3 页。

<sup>3</sup>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 页。

<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 页。

<sup>5</sup> [苏] Ю.В. 勃列姆列伊著，汤正方译：《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载于《世界民族》，1980 年第 2 期，第 24 页。



省 400 余人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工作。在总结报告中，S. 巴达姆哈坦提道：“这次测量工作的主要宗旨是：清楚喀尔喀部族的体貌身材，平均身高，头部平均尺寸，眼睛色素，毛发，肤色等。同时人类学调查也要了解人的血型，女性几岁月经初潮，几岁停经，蒙古人的青色胎记问题。”在报告中，他特别提出血型测量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民族喀尔喀意义不大，而对于“几百年来分散独立居住的部落中间（例如和屯人、驯鹿人等）进行血型测量，能够确定氏族间的联系等问题。”并且他肯定了应该在中亚地区追溯蒙古人起源的观点，认为是“科学研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sup>1</sup>。

#### 四、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

蒙古人民革命前，外蒙古地区没有自己的工业、农业、贸易，政权操纵在世俗封建主和寺院封建主的手中，处于政教合一的局面。1921 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政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前苏联的协助下，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所有土地和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和牧奴制度。这时期的中央人民合作社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也迅速扩大，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独立起了重要作用。20 世纪三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工业建设，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使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 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蒙古的农牧业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个体经济全部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蒙古国民经济中完全占有统治地位。20 世纪六十年代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S. 巴达姆哈坦完成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一书。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参照。20 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超速的进步是大家熟知的事实。蒙古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将计划经济看作苏联取得建设成就的核心所在，建国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工业、贸易迅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改变了从前落后的状态。结合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情，我们知道全方面地学习苏联，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前苏联是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把各族群看作具有政治意义的整体，通过“民族识别”确定民族成员身份，为各民族划定一定领域并制定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各种政策优惠<sup>2</sup>。源自苏联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虽然影响了蒙古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但 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学研究中始终根植于蒙古的土壤之上，他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认识达尔扈特部族——这一处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疆的族群，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当地，乃至蒙古国境内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 （二）《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理论建构

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学研究中，完善了将蒙古氏族起源、物质和精神文化作为完整集合体的研究模式，他的学术研究使蒙古国民族学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发展方向。概括来说，他的民族学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对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相互影响研究、对游牧文明传统独特性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社集体化的研究，以及对达尔扈特地区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研究等。“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内，历史科学以研究重要文献、历史事件为对象，那么在当今时期，我国人民历史各个方面，或者说构造他们几千年来创造的文化遗产的物质文明早期研究，是民族志研究的新领域。民族志是研究人民物质、精神文明史，进而研究其起源、历史分布、居住习惯、血缘关系发展等问题。”<sup>3</sup>

#### 1. 对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

<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1958 年所做的人类学调查工作》，1959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17 页。

<sup>2</sup>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18 页。

<sup>3</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2 页。



由于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在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中所产生的影响，蒙古民族的起源问题较早时期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193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出版的两卷本蒙古史着重考察了蒙古人的祖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蒙古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在野外考察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论证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著作。其中，S. 巴达姆哈坦的《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分析研究了关于达尔扈特人起源的种种假设，记录了与他们迁徙和起源有联系的传说，他们的民族名称，最后得出了达尔扈特部族组成包括了萨莫耶德、突厥、氐族氏族的结论。他认为：“最近三年，历史所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驯鹿人中间开展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从结果来看，搜集了大量包含达尔扈特族源、血统、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资料。外国学者称达尔扈特部族是蒙古化的图瓦人，但近几年开始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达尔扈特人是蒙古化的图瓦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sup>1</sup>

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他将达尔扈特地区的研究史料与图瓦考古资料相结合，力求对达尔扈特部族的源头做出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在田野工作中，由于缺乏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调查资料，S. 巴达姆哈坦在搜集当地资料的基础上，依靠了前苏联学者在图瓦自治共和国所做的关于突厥、吉尔吉斯、契丹研究中的人类学材料，并通过苏联学者的翻译间接利用了中文文献。S. 巴达姆哈坦认为：“自古以来，达尔扈特部族的范围与图瓦东部地区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的命运。人民革命以后，图瓦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达尔扈特与图瓦之间形成了边界。因此在图瓦的托金苏木以及其他地区进行考古研究所得到的突厥、吉尔吉斯、契丹时期的出土文物，是与我国达尔扈特地区同期墓葬出土，这些文化依然保留在达尔扈特人的生活中。”<sup>2</sup>

由于达尔扈特人在民族文化方面处于突厥语族民族和蒙古民族的结合处，所以他们吸收了萨彦——阿尔泰高原各民族文化的不少成分。S. 巴达姆哈坦论证达尔扈特部族的族源史，缘何强调其与图瓦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这与图瓦地区的历史演变密不可分。图瓦人通常被看作是西伯利亚的突厥人的一部分，和蒙古地区有广泛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在历史上受到了包括突厥语族民族吉尔吉斯人、蒙古的卫拉特人等多重影响。图瓦人又被称作“乌梁海”，同时从突厥语族民族吉尔吉斯人和蒙古的卫拉特人那里获取了文化的和遗传基因的特征。图瓦位于今蒙古国西北部，原为我国领土。都播人是图瓦地区的先民，唐朝以前，先后为匈奴、鲜卑等中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在唐代才和唐朝建立起了臣属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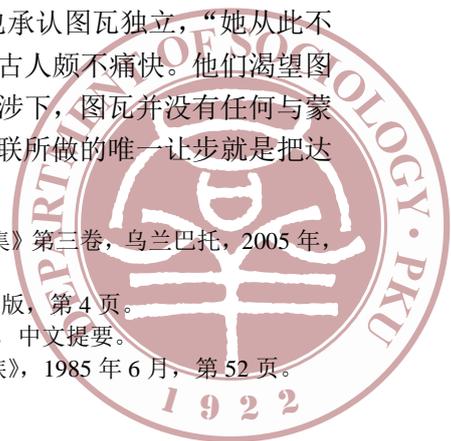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到8世纪中叶，图瓦成为突厥汗国的一部分，继而又处于回鹘人的统治之下。1207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进驻图瓦地区，自此，蒙古人对图瓦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中叶。明朝后期因有乌梁海部落所居，境内有唐努山，因此得名为唐努乌梁海。1726年，清朝曾派遣大臣隆科多等勘查唐努乌梁海地区中俄边界。1758年，清朝在该地区设置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四旗“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部分唐努乌梁海人编为五旗，……另外一部分唐努乌梁海人归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三音诺颜两部王公管辖。唐努乌梁海达尔哈特地方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领地。以上三部分唐努乌梁海人共编为49佐领又一鄂拓克。”<sup>3</sup>沙俄自19世纪以来，从未放弃对图瓦地区的觊觎，清朝对图瓦也提出主权要求。1921年，图瓦诸旗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苏联也承认图瓦独立，“她从此不再称为（唐努）乌梁海，而改称唐努图瓦。面对图瓦事件的转变，蒙古人颇不痛快。他们渴望图瓦成为蒙古的一部分，并且大多数图瓦人也希望如此。”<sup>4</sup>在苏联的干涉下，图瓦并没有任何与蒙古合并的倾向，1924年蒙苏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干涉图瓦内政，“苏联所做的唯一让步就是把达

<sup>1</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4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前言，乌兰巴托，2002年第二版，第4页。

<sup>3</sup> 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中文提要。

<sup>4</sup> [澳] 麦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第52页。



克哈德<sup>1</sup>割让给蒙古。”<sup>2</sup>图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大量反政府的意见，政府处理蒙古与图瓦关系的原则尤其受到冲击。1925年各旗旧官员再次提出“同蒙古共和国联合”的愿望。1944年图瓦成为苏联的一个自治州，但图瓦内部多次政治变革都与蒙古内部事件有关。<sup>3</sup>唐努图瓦被视为苏联亚洲的前线<sup>4</sup>，结合图瓦地区的历史，能够进一步了解 S. 巴达姆哈坦在论证达尔扈特人、驯鹿人与图瓦人族源关系背后更为深层的动机，笔者将其理解为 S. 巴达姆哈坦对俄苏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形势“关心”的潜在对抗。“族群与地域的关系中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由于历史上曾经居住过或占领过等原因，涉及到目前国境外的地域。”<sup>5</sup>现代达尔扈特人、驯鹿人、图瓦人的祖先，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形成了自己传统的居住地域，S.巴达姆哈坦通过对其共同传承的游牧生活方式、氏族组成、如何自称、如何迁徙、在达尔扈特部族形成过程中是否有哈莫尼干人参与、当地人突厥类型的萨满教信仰等问题的观察与考证，发现了其中的联系与相似性。

S. 巴达姆哈坦认为：曾在唐努—萨彦地区最早居住的氏族部落是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从南部（即他们的故乡畏兀儿<sup>6</sup>地区）迁徙而来的 Нэн 族部落，他们被突厥的“秃巴”（Дубо）<sup>7</sup>族人占领后被突厥化，进而拥有了突厥的名称，即现在的图瓦。突厥汗国时期，突厥汗国数次入侵达尔扈特地区，一些突厥语族的新氏族部落也来到当地定居，如达尔扈特部族中的霍拉日（хуулар）氏族就是自那时迁徙至此地定居的氏族。他认为回鹘人镇压了突厥的军队，将达尔扈特地界纳入自己的控制中，图瓦地区现在还有许多回鹘时期的城市遗址。12世纪时，林木中百姓开始迁至 Шишгэд 河谷（叶尼塞河的分支），其中有一支称为乌梁海人。林木中百姓，他们生存在森林中，饲养驯鹿，在山脚下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拉施特在《史集》中将“森林兀良合”和“兀良合”区分为两部分<sup>8</sup>，S.巴达姆哈坦认为，二者在族源上并不相同，森林兀良哈是现今蒙古国驯鹿人、图瓦托金人和乌梁海人的祖先。在这方面他同意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森林兀良哈曾经是早期 Нэн 族和突厥氏族部落的成员。秃巴族人的生产活动、风俗习惯依然保存在 20 世纪中期的蒙古国驯鹿人和图瓦的托金人中。

关于“乌梁海”的名称起源，S. 巴达姆哈坦认为乌梁海内部各部落虽然名称相似，却有不同的族源。他考证出乌梁海这一称谓不是自西向东，而是自东向西传播，这一称谓除了在唐努—萨彦，库斯古勒附近的居民中使用以外，也代表了阿勒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这些自清朝被分离出唐努山的居民。他所提到的唐努—萨彦一带的乌梁海，即中文文献中的“唐努乌梁海”，其内涵是十分复杂的，他提出，几百年的征战不同部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图瓦人就是在长期

<sup>1</sup> 即达尔扈特。——笔者注。

<sup>2</sup> [澳] 麦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第52页。

<sup>3</sup> 1958年牵涉到蒙古的边境事件。参见[澳] 麦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第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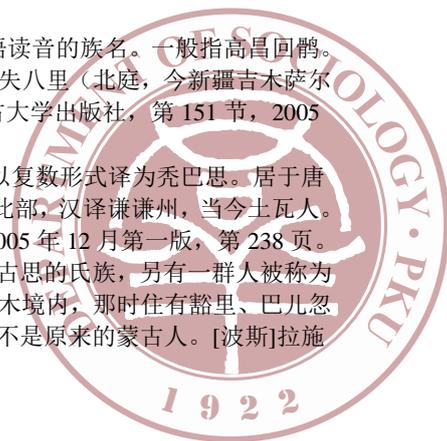
<sup>4</sup> William Ballis: *Soviet Russia's Asiatic Frontier Technique: Tana Tuva, Pacific Affairs*, Vol. 14, No. 1. (Mar., 1941), pp. 91-96.

<sup>5</sup>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15页。

<sup>6</sup> 畏兀儿：又译畏吾而、伟兀、卫吾、委兀、瑰古、乌鹁、外吾，皆“回鹘”蒙古语读音的族名。一般指高昌回鹘。公元9世纪时据有以哈刺火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和别失八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为中心的的地区。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51节，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78-279页。

<sup>7</sup> 秃巴昔（Tubas-i）种行。秃巴：部落名，即唐代的都波或都播。《元朝秘史》以复数形式译为秃巴思。居于唐麓岭（今唐努山）北今乌鲁木齐河和克穆齐河流域，蒙古人以此两河之名称呼此部，汉译谦州，当今土瓦人。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51节，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38页。

<sup>8</sup> Урянка：兀良合，Урянка, лесные：森林兀良合。这个部落出自上述乞颜和捏古思的氏族，另有一群人被称为“森林兀良合惕人”，但这些人与他们不同。这个森林部落[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境内，那时住有豁里、巴儿忽惕和秃马惕部落；他们彼此相近。正如前篇所述，他们的部落和[部落]分支，不是原来的蒙古人。[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5页。



历史发展中由使用突厥、蒙古、通古斯这三个语族语言的部落逐渐融合而成的现代图瓦人。深入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某些部族复杂的民族起源问题，特别是达尔扈特人复杂的民族起源问题，能够澄清一系列与蒙古人的古代史，与他们在民族遗传方面同突厥人、通古斯-满洲人及中亚其他民族相互联系的问题。因此，在考察达尔扈特地区的历史文化时，他从族源上梳理了突厥语族图瓦人与达尔扈特部族千丝万缕的联系。

## 2. 对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相互影响的研究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研究方面，S.巴达姆哈坦的著作具有特别意义。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本书中，他完全按照民族学大纲对达尔扈特部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做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既与大的民族共同体——以喀尔喀人为主体的蒙古民族进行了比较，也与生活在唐努-萨彦岭一带的图瓦人等小族群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和生产生活的横向角度同时梳理，将达尔扈特部族的物质文化置于跨国、跨族群的背景中，从而展现了多民族、多部族文化如何被吸纳到小民族共同体、小民族共同体又如何融入大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小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问题，比人口较多的民族部族更为复杂，S.巴达姆哈坦根据丰富的实地调查材料，从畜牧业、手工业、居住模式、装饰艺术、亲属称谓等方面，撰写了达尔扈特部族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方面与周边族群的关系问题，用达尔扈特部族的发展过程反映出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小民族部族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畜牧业是达尔扈特部族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在当地，个别氏族也同时经营狩猎业、捕鱼业、采集业、家庭手工业等辅助生产方式。虽然喀尔喀文化早在14世纪便随蒙古人的征战被带到达尔扈特地区，在当地人的经济生产中依然保留了许多独特的风俗，这些特殊的生产方法在唐努-萨彦附近的部族中广泛传播，与图瓦人的生产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建造棚舍的模式<sup>1</sup>、使用套绳套马的习俗<sup>2</sup>（而不用套马杆）、狩猎方法等。S.巴达姆哈坦对当地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族群关系问题进行了这样的分析：“达尔扈特地区从事驯鹿业的人，曾经是图瓦山的托金人的一支——图瓦人，他们于18世纪开始慢慢移至山脚下，开始从事畜牧业，渐渐加入达尔扈特部族的组成中，忘记了驯鹿生产的方法，融入了新的生产形式。”<sup>3</sup>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尔扈特人的驯鹿方法，属于唐努-萨彦类型，这与图瓦的驯鹿经济方式是同源的。这段论述从经济生产的角度再次证明达尔扈特人与图瓦人的族源关系。在手工业制造方面，他指出达尔扈特人与喀尔喀人基本相同，只有制毡方法由于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与突厥语族民族中盛行的纺织方法相似。虽然达尔扈特人的畜牧业生产工具与其他蒙古部族没有区别，但他们的狩猎工具类型却与西伯利亚、唐努-萨彦部族相同，他用实物史料证明了达尔扈特人的狩猎文化受到了早期周边氏族文化的影响，这些周边氏族曾加入了达尔扈特部族的形成过程，他们的血统亦保存至今。<sup>4</sup>

达尔扈特人建造棚舍的技术是当地人与周边部族往来的结果。S.巴达姆哈坦通过田野调查主要发现了两方面内容：其一、这些技术具有唐努-萨彦附近部族的特征，在他看来，达尔扈特人的畜牧方法与图瓦人、布里亚特人相似，这是早期贸易往来推动外来文化向达尔扈特地区传播的结果，他批判了一些学者认为达尔扈特人不懂得这项技术的偏见，证明了他们掌握棚舍建造技术

<sup>1</sup> “幼畜的棚舍、马的围栏主要建成四方形，其余的牲畜围栏由4—9个立面组成。如果说喀尔喀人建造的围栏立面之是缝合的，那么达尔扈特人建造的围栏，则在每两个立面间竖起两个2米高的圆木，稍部互相留着50厘米的空隙，可以使之平衡。” S.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8页。

<sup>2</sup> “达尔扈特人的一个特点为，抓马时使用套绳索套马，这一方法在唐努-萨彦、阿尔泰部族间非常流行。喀尔喀、布里亚特等部族主要使用套马杆套马。为牲畜烙印后，有主人为所有参加烙印工作者献茶的习俗。”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03页。

<sup>3</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13页。

<sup>4</sup> “例如：弩箭、弓箭、渔板、手锹、渔叉等铜制工具制作方法，与图瓦、布里亚特、Hagas等部族的制作方法完全相同。”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24页。



的必然性。其二、喀尔喀人建造棚舍的技术并没有传入达尔扈特人中。“这证明了达尔扈特人与喀尔喀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太多联系，然而勿需置疑，全体蒙古人的民族文化在古代已经影响了达尔扈特人。”<sup>1</sup> 喀尔喀作为蒙古民族的主体部族，其文化没有深刻影响达尔扈特人，由此可见，达尔扈特人接受的是整体蒙古民族一般性的文化传统，是各部族在历史上影响的结果。他指出“到处皆是历史各时期迁徙而来的蒙古民族、部落联盟，他们适应了当地的特殊环境，将从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方法在生活中加以利用。”<sup>2</sup>

虽然现代达尔扈特人的基本居住形式是蒙古包，但他们同时也保留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居住特点，即 *урц*、*шоовонтой гэр*、*пүнз*。达尔扈特部族内部从突厥人、*Нэн* 人所继承的居所本称为 *өүке*，*урц* 是当地人对此的称呼，被蒙古人征服以前，他们一直居住在 *урц*，蒙古包则随着蒙古人的征战而第一次传到当地。S. 巴达姆哈坦对居所称谓做了对比，“*Урц* 的分类名称 *урцыг-өүке*，*урцны модыг-алааж*<sup>3</sup>等都是突厥语，驯鹿人、图瓦人称其为 *урцаа өүке*，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后，又称为 *овоохой*。这证明了达尔扈特人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毡包的传统。”<sup>4</sup>不仅如此，蒙古包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达尔扈特和图瓦人早期使用的锥形天窗形式。另外，S. 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地区的毡包类型、家具用品名称进行了总结与分类，并将之与喀尔喀人的概念进行对应<sup>5</sup>，由此可知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它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和重组。

达尔扈特的装饰艺术与邻族文化更有着密切联系。装饰工艺之间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部族方法的对比，可以追溯工艺产生的源头。例如在在马具中雕刻鸟的形象，是达尔扈特人的早期传统，并且具有氏族早期崇拜的含义——骑马与飞翔等同。这都是早期文化在实物史料中的反映，对族源、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马具雕刻鸟的形象之传统，早在突厥部落中广泛流传，达尔扈特部族的成员构成中具有突厥语族部落的成分，并且早期突厥文化源头在达尔扈特文化中得以保存，其文化对达尔扈特人的手工艺产生影响，被纳入达尔扈特文化中。另外，达尔扈特男子的垂饰与全蒙古人没有差别，但有一点特征：垂饰图案和造型与喀尔喀有许多不同：云纹、鱼纹、鸟纹。S. 巴达姆哈坦认为这三者都是早期蒙古或突厥民族广泛流传的花纹，是早期灵魂崇拜的产物。在萨满教产生以前，早期氏族崇拜的对象是：满足氏族联盟生活的重要必需品，猎物、鱼类等生物，图腾崇拜的传统属于猎人的习俗。达尔扈特地区的女性可以使用刀，考虑到这里曾经生活着以狩猎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驯鹿人、乌梁海人等。这些族群的女性直至 20 世纪仍然有佩戴刀的传统，从这看来，可能是受到早期氏族文化传统和狩猎文化的影响。达尔扈特人的装饰品在 18 世纪受到喀尔喀、辉特文化的影响。因为在达尔扈特地区北部居住的 *Шишгэд*，*Шарга* 一带并不使用这些饰品，而是接近喀尔喀、辉特的居民制作饰品，从而传入整个达尔扈特地区。

### 3. 对游牧文明传统独特性的研究

对民族传统独特性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学家的关注重点。“民族学作为研究实际发挥功能的传统的物质文化形式的基本学科，它不得不保证对物质文化也要进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sup>6</sup>在 S. 巴达姆哈坦笔下，零散的物质文化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对于民族学来说，这些综合体只有当它们具有民族独特性时才是有意义的。”<sup>7</sup>正是这一系列物质文化传统赋予并巩固了民族长

<sup>1</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99 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9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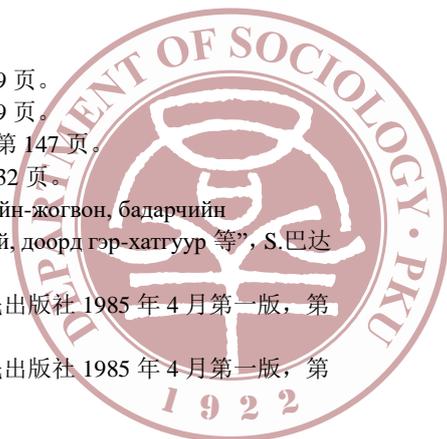
<sup>3</sup> *Алааж*，*alaaju*，意为草棚、窝棚，《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47 页。

<sup>4</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132 页。

<sup>5</sup> “*анхны сууц-урц*，*удаахь сууц-монгол гэр*，*ихсийн гэрийн-өргөө*，*нүүдлийн гэрийн-жогвон*，*бадарчийн сууц-жодгор*，*аяны сууц-майхан*，*ядуусын сууц-улаалж*，*гөрөөчний сууц-овоохой*，*добрд гэр-хаггуур* 等”，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34 页。

<sup>6</sup> [苏] Ю.В.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第 273 页。

<sup>7</sup> [苏] Ю.В.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第



期持有的独特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扈特部族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一直具备游牧和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繁殖牲畜的方法完全受自然条件所控制。他们利用畜牧业各种产品来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活方式是从几千年前沿用至今的传统方式之一。因此，S. 巴达姆哈坦对畜牧业生产的调查目的是：“对达尔扈特部族繁殖牲畜的百年方法特征加以研究，了解达尔扈特人如何工作。”<sup>1</sup>他分析道：库斯古勒省的特殊地形，决定了达尔扈特人的游牧分为山地游牧和草场游牧两种类型；然而根据当地人的访谈，他又注意到在达尔扈特部族具有远处游牧和近处游牧的内部分类，主要是依据游牧方向、游牧次数来区分的游牧类型。他的描述和分析集中于当地人对游牧类型内部分类的探讨<sup>2</sup>，用具体田野调查实例反驳了一些学者对森林地带游牧情况的偏见<sup>3</sup>，并对“富人帮助”（баянчуудын тусламж）、“牲畜驮运”（нуруу ачилгаа）等传统现象做出了解释：由于畜牧业生产的特殊性，牧民在生产中需要联合抵制自然灾害，形成“富人帮助”（баянчуудын тусламж）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压迫情况相混合，形成了独特的游牧现象。“牲畜驮运”（нуруу ачилгаа）是达尔扈特人的基本游牧方式，与驯鹿人完全相同，是受到地理条件影响的游牧方法。与喀尔喀人不同的是，达尔扈特人将行李置于犏牛背上，不是牵行而是同时驱赶，有时候也把物品搭在牛背上将儿童捆在牛上骑行，“这在外人看来也许不能接受，但是当地人世代传承这种传统游牧方法，因此并不在意。”<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部族游牧传统独特性的类似观察和总结颇多，在此不赘述，“在文化所起的为数众多的作用中间，特别指出它的民族功能看来是合理的。在我们看来，执行这个功能的是文化的民族区分特性和民族一体化特性的总和”。<sup>5</sup>这些文化传统上的不同，是民族部族特征的标志，它既联合了达尔扈特人与驯鹿人、图瓦人等，又区分了喀尔喀人，它具有稳定性、继承性，甚至带有文化遗产的色彩，在反复对比中，达尔扈特部族的特性中无数零散的“日常实践”被确立起来。然而 S. 巴达姆哈坦的观察和思考并没有局限在此，他将整个达尔扈特部族的文化层次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之中，他从对库斯古勒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到民族志成书，先后用了8年时间（1958-1965），这恰好处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过渡阶段<sup>6</sup>，这使达尔扈特部族传统及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具有了空前的意义。民族学是一门实用学科，通常来讲，学者的参与对小民族部族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S. 巴达姆哈坦的调查研究紧密地联系社会实践，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分析，切实地关注了发生在达尔扈特地区——处于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巨变。

#### 4. 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社集体化的研究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古人的经济一向是自然经济，其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性，频频

273页。

<sup>1</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0页。

<sup>2</sup> “达尔扈特人的迁徙（尤其是远处游牧），主要以冬夏营地为主，春秋宿营是过渡状态。冬营地有远近两种类型。远处游牧是富人与中产阶级牧民主要采取的游牧方式。”“在游牧方向方面，近处游牧与远处游牧一样，（冬季上行，夏季下行），游牧距离和次数都各不相同，对于近处游牧者来说，春营地、秋营地的宿营地较之远处游牧来看，更加清晰。近处游牧在整体上，游牧距离、游牧方向、游牧次数，相互间都是相似的。近处游牧每年更换4—8次地点，大约游牧30—50千米。近处游牧者每年游牧的距离短、游牧次数少，是小型活动，其一，是因为缺乏交通工具，其二，生活的主要来源——牲畜数量少，因此在近处减少迁徙，能够为牲畜提供抓膘的可能。基于这两个根本原因，不能进行远处游牧，成为利用周围环境的近处游牧。”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5页。

<sup>3</sup> 一些学者认为森林地带游牧的数量、距离，要短于草原游牧。——笔者注。

<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6页。

<sup>5</sup> [苏] Ю.В.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 刘宇端著：《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第57页。

<sup>6</sup>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蒙古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1921-1940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时期（1941-196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1-1990年），民主改革时期（1990年至今）。——笔者注。



被当时各地的旅行家们所指出。在 S. 巴达姆哈坦看来, 清朝与沙俄对蒙古地区的影响, 导致了达尔扈特部族与其他部族民族的隔离, 使文明极为落后, 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当地贫困、愚昧、落后的社会状况。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将私有制的游牧经济变为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政府创立了官僚者和技术员的小阶级, 义务兵役提供了机会来向年轻人灌输大集体的思想。牧民被长期剥夺了他们的领导资源——蒙古王公和喇嘛后裔。……像缝纫机和铁炉等日用品, 已经作为新政权的标志在蒙古包中的出现。他们的牲畜被纳入国家兽医服务的检察中, 也成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他们依赖着国家对消费品的储备, 因为他们不能自己生产。但只要他们能够依赖他们自产的消费品, 他们就能够保留一部分经济自由。”<sup>1</sup>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梁海地区设置了人民临时政府, 削弱了鄂托克和宰桑的权力, 设置达尔扈特管辖者, 确立了达尔扈特的边界, “这是在达尔扈特地区第一次建立民主政权的步伐。”<sup>2</sup>

如果说自治蒙古社会制度的根本特点表现在鲜明的神权性质上, 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却在苏联的引导下投入到“新的使命”中。为了排斥北洋政府的高利贷资本, 政府在 1921 年 11 月批准了合作社章程, 12 月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立。“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以建立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开始了把外国掠夺资本全部排挤出蒙古市场的斗争。这是巩固国家的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条件。”<sup>3</sup> 自 1940 年开始, 蒙古人民政府制定的重要目标是, 巩固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经济, 竭尽全力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 增加牲畜头数和畜牧业产品。此后, 在蒙古国库斯古勒省出现了鱼工厂、奶制品工厂等, S. 巴达姆哈坦称其为“蒙古国新工业的开端”<sup>4</sup>。1948 年人民大呼拉尔第 11 次会议中, 提出了蒙古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2 年), 1954 年又确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 其主要关注的内容是建设人民公社, 在牲畜业生产方面巩固社会主义建设, 将蒙古国牧民、人民、工作者都变成畜牧业社会主义形式的公社成员。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志中对其中的“幸福公社”和“黄金牧场公社”进行了描述, 他统计了 1957-1963 年间公社的家庭、人口、牲畜(骆驼、马、牛、绵羊、山羊), 认为这两个公社已经成为现代畜牧业公社, 在落后的达尔扈特地区产生了新经济, 并得以发展和巩固, 形成了全面保护社会主义畜牧业新形式的大型经济模式。<sup>5</sup>“黄金牧场”公社是合并而来, 对巩固公社建设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这些公社所取得的成就是蒙古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牧业方面取得胜利的重要例证, 与四十年前落后的情况相比, 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sup>6</sup>

S. 巴达姆哈坦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达尔扈特人带来的新变化, 切身关注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改造, 他的研究不是为了提出理论而是为了实际的目的, 即在研究过程中帮助当地人发展, 为社会变革提供事实的依据, 服务于当地人的切身利益。

### 5. 对达尔扈特地区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达尔扈特人, 属于封建喇嘛的牧奴、博克多格根的沙比<sup>7</sup>, 其社会关系具有封建压迫与早期氏族家庭关系残余相混合的特点。S. 巴达姆哈坦从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入

<sup>1</sup> George G. S. Murphy, “Planning i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8, No. 2. (Feb., 1959), pp. 241-258.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 第 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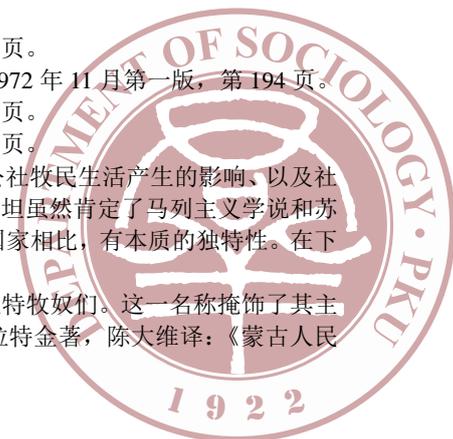
<sup>3</sup> [苏] 伊·亚·兹拉特金著, 陈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11 月第一版, 第 194 页。

<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 第 40 页。

<sup>5</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 第 47 页。

<sup>6</sup> 20 世纪七十年代,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主要以现代民族学发展进程对公社牧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和确立进程为主, 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 S. 巴达姆哈坦虽然肯定了马列主义学说和苏联经验的指导作用, 然而又提出了蒙古国民族问题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 有本质的独特性。在下一章中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笔者注。

<sup>7</sup> 沙比: 是门生的意思, 在蒙古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依存于寺院王公及寺院的阿拉特牧奴们。这一名称掩饰了其主人, 即寺院封建主, 对沙比剥削的典型牧奴制的形式。——[苏] 伊·亚·兹拉特金著, 陈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11 月第一版, 第 36 页。



手，阐释了当地封建落后的社会关系在人民革命期间向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过程。在达尔扈特部族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氏族关系、家族关系和姻亲关系，突厥语族的传统习俗尚存其中。S. 巴达姆哈坦认为，当时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为和屯阿寅勒联合体（хот айлын нэгдэл）及其成员之间的联系。蒙古语中的阿寅勒，是若干个帷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通常是以个别家族或以二、三家族组成的小团体，在一块不大的地面上游牧；和屯的游牧方法即以十个到三十个以上的牧户（阿寅勒）组成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永远是同族人集体进行的游牧。<sup>1</sup>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游牧生活一般地暴露出一个重大的矛盾。用大的牧群的方式来游牧，对于牲畜成群的富牧户，特别是牧马的人，并不方便，出于对自己的畜群和马群的关系，迫使他们不得不追求以阿寅勒进行放牧的较为自由自在的生活。……当中产者和贫穷者以集体（和屯）进行游牧的时候，富有者便力求，并且也不得不以阿寅勒去单独游牧。但是，以阿寅勒游牧，即以孤立的小集体去放牧大量牲畜，只在社会秩序安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达尔扈特人的游牧，划分成三个类型：其一、亲属家族联合和屯阿寅勒；其二、富人穷人的联合和屯阿寅勒；其三、中产者的联合和屯阿寅勒。他的分类依据了当时达尔扈特人的社会结构。S. 巴达姆哈坦指出，早期氏族联合的形式在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变化，即保存着氏族生活的残余，又具有共同生产、相互帮助的特点。他将亲属家族联合类型进一步分为近亲<sup>3</sup>、远亲<sup>4</sup>和屯阿寅勒，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除经济因素外，在民众意识中还存在着早期的伦理和秩序传统。”<sup>5</sup>他认为穷人与封建主的联合游牧，是穷人受制于生活所迫的结果，与喀尔喀台吉的牧奴不同，他们自己拥有薄弱的经济，有可以离开富人的独立自主权，却依然受到封建社会的剥削。在上述各种游牧关系中，他多次强调封建社会制度在其中起的作用，例如认为亲近联合游牧是一种“不公开的剥削”、远亲联合游牧则“在亲属互助的名义下，具有牧奴制的压迫和剥削的潜在形式”。只有中产者的联合才“以工作目的相互依赖，在季节的条件下暂时联合的一种游牧联合体。”<sup>6</sup>这种联合游牧的类型被归因为人力畜力短缺而造成的，是在自愿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不具有任何剥削的形式。

### （三）《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民族志方法

田野工作是民族学家最重要的经验，是他民族学知识的切身来源，也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的洗礼。每个民族学家可能都有“他的‘村庄’、他的‘族群’，也就是他最熟悉的田野调查的地点和当地的人们。”<sup>7</sup>S. 巴达姆哈坦在进入田野前，已经准备好了他的问题、理论与方法、对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方案，以及分析与写作的方式。在田野作业的每个环节，他都需要用已掌握的综合知识，来辨析不同资料有价值的部分，他的学术造诣为其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经验，使他的民族志书写充满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层级学科的研究方法。下文将从调查方案的设置、正史与口述史相结合、对民间知识本土化的解释三个方面来分析 S. 巴达姆哈坦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所运用的民族志方法。

<sup>1</sup> [俄] Б.Я.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第一版，第 296 页。

<sup>2</sup> [俄] Б.Я.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第一版，第 38 页。

<sup>3</sup> “近亲和屯阿寅勒联合游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时期大家族生活的风俗传统依然保留，氏族生活时期的公有制也间或可见。……主要以 2—4 户人家为主。”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4 页。

<sup>4</sup> “远亲和屯阿寅勒联合游牧主要由父亲的母亲亲属组成，有 2—3 户人家，每户人家在人力财力方面往往不同，对贫穷的亲属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按年纪尊长或财力大小来管理此联合体并为其命名。”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4 页。

<sup>5</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3 页。

<sup>6</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6 页。

<sup>7</sup> 凌纯声、林耀华等：《20 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一版，第 4 页。



## 1. 调查方案的设置

“用田野工作得来的个案材料建立假说和解释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的特色之一，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已经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科学的民族志包含着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其一、选择特定的区域；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的语言；其四、先从本土观点的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sup>1</sup> S.巴达姆哈坦在《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sup>2</sup>一文中对民族学研究和范围进行了限定，将民族志调查按内容和方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旅行研究<sup>3</sup>、特定研究<sup>4</sup>、专题研究<sup>5</sup>，这些研究能够全面解释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第三种类型与他的自身经历更加吻合，《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就是最好的明证。蒙古国院士 Ts.达赖曾这样回忆这位民族学家：“巴达姆哈坦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特点是非常认真，孜孜不倦。在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族的多年研究工作，是值得赞扬的。有一次，我与她一起居住在驯鹿人家。连我都不甚清楚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然而哈坦却很高兴，也像一名驯鹿人一样。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和驯鹿人待在一起？哈坦大笑着说道：我已是这儿的女婿啦，驯鹿人都是勤劳善良的人。他又非常严肃地说：‘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如果现在不对他们进行观察和研究，就来不及了。我注意到他们住在草屋里，喝茶吃饭，小伙子与姑娘们相爱，学习骑驯鹿。我的专业工作目标就是这些。’我住了几天就回去了，留下了哈坦独自一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学者。在达尔扈特部族研究的著作中，《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人人知晓。”<sup>6</sup>

然而，S.巴达姆哈坦在文章中提到的调查方案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也不是苏联民族学派所独有的。例如深受历史民族学影响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提出过相同的旅行研究方法，因此要对其加以辨别。如果追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民族学，可以知道那时第一次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家的学者队伍<sup>7</sup>，这一切首先在田野搜集工作上产生了影响。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民族学资料出自旅行家、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简述，他们无人接受过民族学的训练。大约自 19 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由专业人员撰写的第一批民族学专业著作和田野调查记录，即民族学科学考察旅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学的实际材料大幅增加，民族学出版的学术水平也较从前意外的观察者记录的质量高出很多。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民族学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提倡，他们信仰实证主义哲学，用民族学资料研究社会问题，许多民族学著作都注重对社会的整体研究，重视知识、承认历史过程的规律，认为这些可以为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提供资料。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任务就是寻找人类历史

<sup>1</sup> 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思想战线》2005 年第 1 期，第 75 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 页。

<sup>3</sup> “旅行研究首先要前往从未被研究的地点，对当地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进行表面性描述，在此基础上绘制当地民族、部族分布地图。通常旅行研究会为下一步方案的执行选择调查地点，通过地图来了解还有哪些人在语言、起源等方面与当地居民的情况相接近”。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版，第 5 页。

<sup>4</sup> “特定研究应对调查点和当地人的生活情况有提前认识，与旅行研究相比涉及了更深的内容，并需要长期融入当地生活，对当地文化及风俗进行调研，应与旅行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可以在任意时间进行，调查时间应依研究者的调查条件而定。其主要形式为，在每个季度进行 1—2 个月的调查，此举可以深入了解当地人如何将生活与季节相适应。”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版，第 5 页。

<sup>5</sup> “专题研究以了解某一县或苏木的专门历史为目标，因此研究时间根据研究者的资料准备程度而定，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当地定期工作几年，这样才能解决当地人民起源、历史分布、经济生活的发展阶段问题。”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5 页。

<sup>6</sup> Ts.达赖：《我的朋友巴达姆哈坦》，《民族学研究》2004 年，乌兰巴托，第 165 页。

<sup>7</sup> 泰勒、卢伯克、麦克伦南、魏茨、利珀特等。[苏] IO. B. 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 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第 90 页。



和文化发展的规律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特殊的，应力求以事实确证来阐明见解”<sup>1</sup>，历史民族学派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掌握了详尽的民族学资料。

## 2. 文献史料与口述史相结合

在民族学调查中，仅靠调查者个人观察和所准备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的资料主要依靠当地人提供。在许多优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中，许多关键性的材料往往是根据这些人的口述整理的，或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的。S. 巴达姆哈坦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详细考证了正史、史学著作和档案资料，利用大量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民间口述史，作为精英历史的补充。在访谈中，他特别强调“要清楚地了解访谈对象内心的真实想法”<sup>2</sup>，他重点提出了几点要求：让访谈者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谈话，在访谈结束后再进行补充提问；使用当地人的方言及专有名词记录同样的问题；调查当天务必重新阅读所记录的内容，对存疑之处重新访谈，如有新的想法或问题，可将其写入记录或加载于问题中。利用民间的口述史料，他解决了许多正史或档案记载中未解的难题，仅以达尔扈特人的起源问题为例：

S. 巴达姆哈坦认为，研究达尔扈特起源最基本的材料是口头传承并保存至今的氏族名称，这些氏族名称能够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起源、迁徙和历史问题。通过对年长者的访谈，他清楚地统计了历史范围内的达尔扈特部族各个氏族，并将 J. 策旺 (Ж. ЦЭВЭН)、G. D. 桑杰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曾经记录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应增加 16 个新氏族的结论。在对黑达尔扈特 (хар дархад) 氏族来源的研究中，除了参考历史文献记载以外 (《蒙古秘史》、《史集》、《王公表传》)，他找到一位老人<sup>3</sup>讲述的书籍《达尔扈特人起源的历史》(“Дархад хүмүүсийн анхлан буй болсон түүх”)，那本书已经失传，S. 巴达姆哈坦将老人对书的记忆记录下来<sup>4</sup>，并且尽量搜集了其他讲述达尔扈特人来历的相关传说<sup>5</sup>。他认为，在达尔扈特当地居住的氏族部落既有原驻民，也有由 Хараа, Ерөө 迁徙而来的居民，迁徙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止刚刚成为博克多格根沙比的乌梁海人与卫拉特人结盟，然而这些背景离乡的人思念故土，又迁回了乌梁海的故乡，因此出现了“黑达尔扈特”这个从达尔扈特内部引申出来的新称谓，意为“从外部迁移过来的其他鄂托克居民”。这些结论都是 S. 巴达姆哈坦在史料不足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访谈而推断出的，在他看来，“保存至今的传说源自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虽然几百年来不断变异，但是保留了基本原意，因此具有历史真实性。”<sup>6</sup>

由此段论述可以看到，S. 巴达姆哈坦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充分运用了人类学调查方法，

<sup>1</sup> 马克继：《历史民族学与民族历史学简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46 页。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著：《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7 页。

<sup>3</sup> 老人名为 Дамдингийн Дүвжир，属于 Урьд 氏族。S. 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59 页。

<sup>4</sup> “很早的时候达尔扈特当地荒芜人烟。一个名为成吉思汗的人渡过腾汲思河，住在这里打猎的时候，几个人从 Хараа, Ерөө 出发为了与成吉思汗见面而来，回家乡之后说：腾汲思这个地方是打猎的好地方，于是将人们带到此地，建立了行政机构，开始生活在这里。就这样生活着，直到满清的时候又被收回至 Хараа, Ерөө 的地方。但是，回到 Хараа, Ерөө 的人因为想家，怀孕的母马流产了，怀孕的母亲也流产了，不适应，所以人们穿着用狍子皮做的大衣，戴着有狍子角做的帽子，向博格多汗说明情况，同意这些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成为达尔扈特沙比。于是他们被赐予达尔扈特的名字。从此以后，他们自称达尔扈特，成为博格的达尔扈特，不用服兵役也不用纳贡，只向博格多交纳黄茶税。于是又来到了 Шишгэд 地区。但是没有来到 Шишгэд 地区的人们留在了 Хараа, Ерөө。留在当地的人称做 Хэвгэрэн 达尔扈特。在 Хараа, Ерөө 地方居住的人是从 Онон, Улз 分离出来的布里亚特民族。” S. 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第 59-60 页。

<sup>5</sup> 传说一：在达尔扈特地区原来居住着乌梁海人，并且他们的首领将管辖的人献给大格根，使他们成为大格根的达尔扈特沙比。成为达尔扈特沙比之后，他们虽然被迁移到 Хараа, Ерөө，但是他们水土不服就又返回了原地。” S. 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60-61 页。传说二：我们达尔扈特人从来都没有迁移至 Хараа, Ерөө，原来一直都在这里生活着。

<sup>6</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60 页。

来弥补正史及档案资料的缺失，他兼顾历史事件与民间的记忆，既有描述又有解释和比较，用田野资料再现了鲜活的历史场景。

### 3. 对民间常识的解释

人类学家探求亚群体或社区的错综复杂性以描述其所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研究这些细节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会找出那些使得整个秩序系统运作的潜在力量。这些文化要素能统合或分裂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或者信仰，但它们往往有共享的焦点。<sup>1</sup>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记录的文化，是 S. 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部族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观察记录的总和，在这些基本事实背后，实际包括了当地人的思想、信仰以及知识等“表现特定群体人们特征的因素”，他不但了解这些文化行为，并且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观察视角以便能够描述这些文化，然而我们从他的写作中也能发现，他并不着重发掘当地人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的思考和行为，而侧重于考证这些独特文化现象的来源，或者说这些文化的享有者之间的族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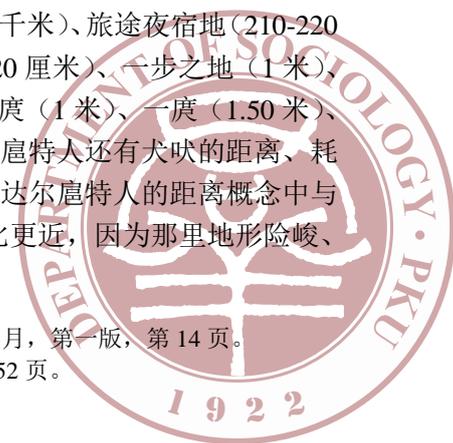
上一小节中，我们提到了 S. 巴达姆哈坦关于“富人帮助”与“牲畜驮运”的描述，下文将以饮食禁忌和女性佩饰的记录为例，对他的民族志书写做进一步分析。他在田野中观察到，达尔扈特人拥有特殊的饮食价值观，遵循着独特的饮食禁忌：他们食用牛、绵羊、牦牛肉，视马肉为格外珍贵，S. 巴达姆哈坦认为，原因在于马肉较之其他肉类能提供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达尔扈特人抵御山林地带严寒气候的需要。他还观察到，达尔扈特人认为羊脑对人脑具有治病功能。他认为这是一种早期的传统知识，图瓦人曾经拥有类似的饮食传统，但是否完全掌握达尔扈特人的制作方法还不曾确定。另外，男人女人和儿童各有红食禁忌，例如，儿童不能吃腰子、尾巴、肺、心脏、肝等，被认为是这些部位都是柔软的，不利于儿童健壮地成长。鸭、脑、骨髓等若给孩子吃，会把孩子变笨、使他流鼻涕、让其不能学习。如果将头骨打碎给男子吃，不打碎是不能给女人的。羊、马的头不能随便挂起来而要挂在高处、树枝上。不能打碎种马、种牛、种羊尤其是种羊的头，剔肉后要将五种颜色的布料缠在它的角上，放在圈上。50 岁以上的女人才能够啃肩胛骨等等。<sup>2</sup>他完整地描述了达尔扈特地区的饮食传统，记录了民间解释，却没有面面俱到地给出进一步分析。达尔扈特的女性佩饰中也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女性对刀具的佩戴，这种习俗是在依靠狩猎为生的早期氏族中产生的，女性参与狩猎后的工作：剥皮、卸羊、处理内脏，因此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所致。他认为，女性在狩猎时期的佩戴刀具传统保存在达尔扈特人中，因为当地居住着曾经从事狩猎生活的驯鹿人、乌梁海人等群体，这些群体中的女性直至 20 世纪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因此这或者说是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或者说是受到了狩猎居民文化影响的结果。

除了通过民间常识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S. 巴达姆哈坦在写作中搜寻了当地“内部的”术语，并将其与“外部的”术语进行了仔细而严谨地对照，用实实在在的民间常识记录了达尔扈特人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的生活符号：

“达尔扈特人对年、月、日的计算与蒙古人完全一样，使用占星术，然而他们对长、短、轻、重的概念有独特的理解。例如：他们将远距离分为拴马的地方（25-50 米）、牧羊场地（1-2 千米）、牧牛场地（2-2.5 千米）、牧牛犊场地（1 千米）、牧羊羔场地（500-1 千米）、牧母马场地（4 千米左右）、半天时间（40-45 千米）、一天时间（90 千米）、一昼夜（120-130 千米）、旅途夜宿地（210-220 千米）等等。他们又将近距离分为靶子之地（50 米）、弓箭之地（1.20 厘米）、一步之地（1 米）、载运皮革（3-4 米）、拴马皮革（4-6 厘米）、一肘之地（33 厘米）、半度（1 米）、一度（1.50 米）、一拃（20 厘米）、一小拃（15 厘米）、一根手指（2 厘米）等。达尔扈特人还有犬吠的距离、耗牛的距离、艾勒艾玛克距离等对长度的衡量方法。”S. 巴达姆哈坦将达尔扈特人的距离概念中与喀尔喀人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其草场距离、昼夜距离与喀尔喀人相比更近，因为那里地形险峻、

<sup>1</sup> 大卫·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第一版，第 14 页。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52 页。



草场丰美。在喀尔喀人的近距离概念中，用骆驼的运载工具绳子、骆驼鞍褥衡量，这在达尔扈特人中是没有的。但是用牲畜背部运输的皮带衡量，反映了在古代达尔扈特地区，骆驼并不像如今这样普遍，运输车也没有占主要地位的情况。其他度量衡与蒙古人普遍相同。衡量重量的办法也是早期流传的最普通的方法，达尔扈特人测量重量的传统方法是用装在皮囊中的奶干逐一衡量的。生活中定期需要的皮革器具在重量方面的参照点，是源自生活的民族知识的一种。

S.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人生活常识的分析，以喀尔喀人作为衡量的标准，喀尔喀人的常识属于他自身的文化体系，达尔扈特人的常识相对于他，属于异部族的文化体系，他用自己的观察、智慧和领悟，再现了达尔扈特人自古以来对自然、宇宙的理解和认识，肯定了其“对人民进步文化知识史的研究”价值所在——“因生活需要创作和利用而产生的传统明确的知识经验”<sup>1</sup>，反驳了“将民间知识单方面认为每一件都与灵魂崇拜、宗教信仰有关的落后蒙昧”的观点。

#### （四）《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评价

S.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部族来讲，并不是外来的民族学家，但是达尔扈特部族对属于喀尔喀部族的他来说，无异于一个“少数民族的边疆社会”，是蒙古国境内的“内在他者”，对这个个案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民族志方法的探讨，而要将这部个案纳入蒙古国整体的、历史文化，在综合的广阔视野下进行分析。蒙古国后世民族学家对这部专著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即肯定了S.巴达姆哈坦作为民族志书写奠定者的地位，他的民族学理论建构和民族志写作方法，开启了蒙古国民族学实地考察的先例，成为蒙古国民族志书写的典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他对民族起源问题、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问题、游牧文明的独特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社集体化的问题、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用漫长的田野经历、扎实的实地调查方法搜寻大量社会事实，从民族学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转为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他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用访谈、理解和解读的方法，将考察结果文本化。在行文中，他不断强调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从建立事实入手，去建立理解当地社会的角度和立场，他用踏踏实实的考证工作构筑话语权，澄清了对当地部族具有争议的历史观点，对整个蒙古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

然而，S.巴达姆哈坦的学术价值并不止于此，他的民族志理论建构过程，自始至终关注着各民族部族在历史长河中千丝万缕的族源和文化关系问题，在这部民族志专著中，他为庞杂而凌乱的民族志材料赋予了一个民族学家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sup>2</sup> S.巴达姆哈坦用资料构筑了话语权，将图瓦人历史文化纳入蒙古国边疆社会的体制，间接证明了图瓦人与蒙古国的渊源关系，他认可早期俄苏的调查资料，却又反观他们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他的笔下，一个族群的生存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建构了蒙古国境内一个族群的历史，发出了一名具有民族精神的本土学者的声音。在他后来的研究中，遵循了通过对小部族的研究，从而阐述民族主体喀尔喀形成过程的研究步骤。1962年，S.巴达姆哈坦曾指出：“民族志研究工作继续发展的目标是，进一步为我国民族部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史搜集更多资料，并且尤其是尽量推广喀尔喀人中的民族志研究工作。”<sup>3</sup>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证族源的研究侧重点，他在七十年代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则进一步演变成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反思，其学术思想也进一步趋向成熟。

<sup>1</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91页。

<sup>2</sup> 高丙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培养扎实的民族志基本功》，《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第107页。

<sup>3</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2页。



## 第二章 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以及在学术上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 第一节 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1957-1998年，S.巴达姆哈坦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为蒙古国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民族学思想，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将游牧文明的价值与蒙古文化和思维特征相结合，他的学术贡献得到了蒙古国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界等的普遍肯定。在蒙古国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他首先在蒙古语语境下规范了民族学的术语表达，将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从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转向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使民族学从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出来，使民族学从依附于历史学研究转向独立的学科领域。本节拟从他对民族学概念的界定、民族学研究对象与目的的观点入手，进而探讨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 (一) 西方和俄苏民族学概念引入蒙古

民族学基本概念是民族学界所讨论的热点话题，西方民族学的“族群”(ethnic group)理论与俄苏的“民族”(этнос)理论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西方学者、俄苏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学术话语不完全对应，导致民族学的基本概念涵盖的内容也不一致。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蒙古国民族学理论受到俄苏民族学学派的影响极深，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成为蒙古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要依据。然而，蒙古国的民族学概念没有完全套用西方或俄苏民族学的定义及认知，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基本概念的反复定义，结合了不同历史时期蒙古社会的特点，是在蒙古语语境中创立的，他对民族学基本概念的的定义工作推进了蒙古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

#### 1. 学科术语的辨析

20世纪三十年代，蒙古国翻译家贡格尔扎布(Гонгоржав)将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译成蒙古语，在这部学术经典译著中俄苏民族学术语第一次被翻译到蒙古语语境中。译者将俄语的“народность”(意为：部族，少数民族，民族)译为“ястан”，将“племя”(阶级社会以前的部落；部族；<转，旧>民族)译为“аймаг”，将“род”(族，氏族，世系)译为“овог”<sup>1</sup>。在此基础上，S.巴达姆哈坦把翻译语言由普通词汇提升为学术词汇，为蒙古国民族学学科确立了基本概念，并使用这些概念对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进行了辨析。他第一次用现代民族学理论，通过对喀尔喀蒙古语族(нийт монгол хэлтэн)的分析，将“部族(ястан)，种族(угсаатан)，民族(үндэстэн)”分别对应为“народность，этнос，нация”，他认为喀尔喀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种族/民族”(тусдаа угсаатан)，而是民族学理论发展形成的新概念——“族群”(бүлэг)。“氏族”(овог)是10—12世纪蒙古社会的基本单位，S.巴达姆哈坦对17-19世纪构成喀尔喀七旗的社会单位和亲属族群的称谓，避开以“氏族”(овог)命名，而使用了“овог аймаг”，“гөрлүүд”，“хөршийн хүй”，“их гэр бүл” патроними，“бичил хэсэг”，“орон нутгийн соёлын өвөрмөц хэсэг бүлгүүд”等称谓，在他的研究中，将中世纪的盟、氏族名称分为前代“дээд өвөг”和后代“удам угсаа”，他还指出，蒙古历史著作中将喀尔喀人习惯称为“ястан”，实为现代民族理论中的“族群”(угсаатны бүлэг)<sup>2</sup>。这是S.巴达姆哈坦基于社会主义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要求而做出的定义。

#### 2. 对民族(үндэстэн)和种族(угсаатан)的甄别

种族和民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们共同体。种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尽管受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体质形态特征上，构成了人类的自然属性特征。种族之间

<sup>1</sup> A. 奥其尔：《哈坦先生是蒙古民族学创始人》，载于《民族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171页。

<sup>2</sup> L. 毕力格图著：《S.巴达姆哈坦的喀尔喀部族研究遗产》，载于《民族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22-23页。

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生物现象的区别,本身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民族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人们共同体。<sup>1</sup>民族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的生物或物理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sup>2</sup>

在各种语言词汇中出现的“民族”和“种族”实际上“反映了各种场景中产生的地方性‘身份认同’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相互交流。”<sup>3</sup>在蒙古语语境中的“民族”与“种族”甄别问题上,S.巴达姆哈坦认为蒙古国的民族成员是由同一具有共同种族起源的部族(нэг удам угсаагай ястнууд)组成的社会主义蒙古民族(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Э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民族和种族问题虽然似乎有同一种理解,其实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民族是在具体历史时期,即封建社会灭亡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所产生的,民族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定义;而种族是自氏族公社时期开始,以氏族共同体(удас угсааны нийтлэг)为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继承了盟(аймаг)、部族(ястан)概念的社会概念。<sup>4</sup>他认为,民族和种族在理解上最根本的区别是:一、民族是资本主义市场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产物,而种族是在氏族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的概念;二、民族以独立为目标,是民族解放运动、政治领导力量的客观基础,而种族是以族源文化、语言集合为基础形成的;三、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所关注的内容是能够制定社会经济一体化,以及远景发展任务,而种族发展,是阐明各部族融合、同化,形成种族新的统一体(угсаатны шинэ нэгдэл)的过程。<sup>5</sup>

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和种族的定义和区分,显示了他对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他没有拘泥于斯大林“民族”定义<sup>6</sup>中四个特征的概念和束缚,而是从现代性角度讨论了实际生活中民族与种族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民族和种族的差别不仅存在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间,他认为,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所体现的是各部族、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的新变革,他们之间相互融合、同化,形成新的民族团体,即现代种族的发展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与资本主义种族的发展有本质区别。<sup>7</sup>欧美各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始终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处理白种人族裔的关系时,可以恪守他们所谓“文明社会”的准则,然而白种族群对待所谓“野蛮人”的关系,则把他们当作“非文明人类”来对待,不承认当地土著人自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则,只是靠武力和奴役来达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的。S.巴达姆哈坦一向主张批判资本主义的种族理论,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奴仆、为殖民主义所服务。

## (二) S. 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从1957年开始,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学调查工作,主要在各省和苏木创办研究所,收集、整理民族志,调查当地人的生活情况与民族特征,进一步为明确民族来源和划分民族成分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对婚礼习俗和民间服饰的考查等。1958年,S.巴达姆哈坦在《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一文中为民族学做出如下定义:“民族学是研究人的学问”,“民族学的

<sup>1</sup> 杨昌儒:《民族学纲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第165页。

<sup>2</sup>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4页。

<sup>3</sup>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3页。

<sup>4</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2页。

<sup>5</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4页。

<sup>6</sup>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sup>7</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2页。



诞生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联系”<sup>1</sup>，同时他把民族学研究看作对历史学的补充，他提出：“民族志研究是历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民族志研究，就不能正确认识和研究人民的历史。即使在文献史料中有人民历史和生活的记载，也是不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也反映了民族志研究是历史学所必不可少的内容。”<sup>2</sup>1962年，他总结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40年来的民族学研究经验，肯定了民族学在历史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他对民族学再次定义，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人民物质、精神文明历史，进而研究他们的起源、历史分布、居住习惯、血缘关系发展等问题的学科。”<sup>3</sup>20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族学调查工作如火如荼，尤其侧重于对少数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进行调查和资料的搜集，S.巴达姆哈坦提出，“对文化遗产和物质文明的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民族学研究方面继续发展的目标是，进一步为我国民族部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史搜集更多资料，尤其尽量推广在喀尔喀人中的民族学研究工作。民族学专业人数稀缺，我们要通过增加各地民族学积极分子、记者等人数，收集更多民族学材料，在他们的帮助下，研究当地风俗以及现代人民生活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新变化，广泛收集物质文明资料的工作。”<sup>4</sup>

20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以现代民族学发展进程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社牧民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和确立进程为主，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方针。<sup>5</sup>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S.巴达姆哈坦在肯定马列主义学说和苏联经验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又提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问题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本质的独特性”：从民族构成角度来看，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部族间没有尖锐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建设也增进了他们之间在经济、文化、语言上的联系，使他们达到同一水平，是加强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同时各民族、部族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发展民族部族文化的中坚力量。S.巴达姆哈坦还指出，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贯彻马列主义思想，是形成统一思想的社会主义民族的基本条件。总体来说，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思想，淡化了民族的界限，主要强调各民族部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1973年，S.巴达姆哈坦提出了“当前民族学研究的目标”，他说：民族学研究首先对于社会主义民族组成、众多部族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统一性和特殊性，以什么形式对社会主义统一文化形成影响进行研究，并对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性质，传统与更新的问题，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进行跟踪研究，揭示其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主要包括三点要求：一、理论上应对蒙古各民族部族最初的组成以及几百年来历史更迭进行关注，对民族部族新共性产生的原因、不同民族部族之间产生的融合与渗透规律等问题提出理论判断；二、对蒙古民族传统物质和精神文化所包含的焦点、蒙古人对中亚文化繁荣做出的贡献，以及中亚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形态，其共性和特性进行研究；三、继续研究现代合作社牧民的经济，工人阶级在牧民社会、家庭经济与生活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确立中的角色，工人与合作社牧民的阶级关系，城市与牧区关系问题等，研究社会领导者、政策的制定者、主要劳动者有效而紧密的联系，重视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

<sup>1</sup>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3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3页。

<sup>3</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2页。

<sup>4</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5页。

<sup>5</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概述（1970-1980）》，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14页。



的民族发展特征。<sup>1</sup>他认为：民族问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关系，主要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种族）进程中社会发展的部族、民族经济、文化所发生的新变革，他们之间的融合进程（ижилсэх явц），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угсаатны шинэ нийтлэг），对逐渐确立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组成产生哪些影响等形式。

从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民族学的定位是从历史学的补充，慢慢走向学科独立的。

## 第二节 S. 巴达姆哈坦对蒙古民族形成的论证

蒙古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并不简单，国内外学者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蒙古民族经历了各民族部族间多方面、多层次关系发生的复杂过程，大部分蒙古国学者认为，原始蒙古人在蒙古民族的形成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论述喀尔喀蒙古人——作为蒙古民族主体组成部分的起源问题。S. 巴达姆哈坦对主体民族喀尔喀蒙古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喀尔喀部族是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共同体，是使蒙古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族群，他领导开展“三河计划”，通过寻找成吉思汗墓葬、发掘古代蒙古先汗与贵族的“宝地”，奠定了喀尔喀蒙古在整个蒙古民族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他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群也展开了详细调查和研究，通过对族群个案的研究，完成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命题的论证。

### （一）蒙古国境内民族分布情况概述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了囊括东方和西方广阔疆土的蒙古帝国，15 世纪这个庞大的帝国又分成了许多小汗国。1921 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外蒙古爆发人民革命，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蒙古人的觉醒，蒙古民族开始形成，并组成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家。”<sup>2</sup>然而在蒙古国学者看来，蒙古民族意识的形成，蒙古民族的形成不是经历过一场革命风暴骤然形成的，S. 巴达姆哈坦用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论证了蒙古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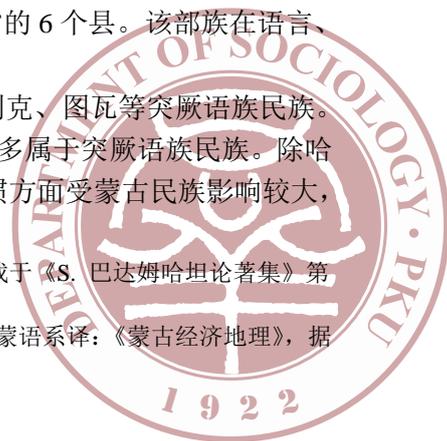
从民族构成上，蒙古国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蒙古民族主要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喀尔喀人、以及杜尔伯特、巴雅特、布里亚特、达里岗嘎、扎哈沁、乌梁海、达尔扈特、土尔扈特、额鲁特、明阿特、巴尔虎等部族和少数内蒙古人（察哈尔、乌珠穆沁等）构成。蒙古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语族的哈萨克人、和屯人、驯鹿人、图瓦人以及少数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华人。

喀尔喀人是蒙古民族构成中最大的部族，是蒙古国的主要人口，主要居住于蒙古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杜尔伯特、巴雅特、额鲁特、乌梁海、土尔扈特、扎哈沁、明阿特等部族属于历史上的卫拉特部。他们自古生活在贝加尔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萨彦岭、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及阿尔泰丛林中。居住在蒙古国的这些部族，现今大多生活在蒙古国西部边疆省份。他们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喀尔喀人有一定区别，杜尔伯特人长期与和屯人、巴雅特人杂居生活，在各方面对他们有很大影响。而额鲁特人与扎哈沁、土尔扈特人长期杂居，从而彼此吸收各自的文化，他们的方言和风俗较为接近。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北部和东北部，即东方、肯特、色楞格、库斯古勒等省的十几个县。由于历史、地缘和人文环境的原因，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受俄罗斯文化和语言影响较多。巴尔虎人在语言、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分布地域上与布里亚特人较为接近。达里岗嘎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南部苏赫巴托省的 6 个县。该部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喀尔喀人区别不大。

蒙古国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是哈萨克、和屯、驯鹿人、乌兹别克、图瓦等突厥语族民族。虽然和屯、乌梁海、驯鹿人、图瓦中也有属于蒙古部族的人口，但大多属于突厥语族民族。除哈萨克之外，其他各族人口均很少。现在，这些民族已在语言及风俗习惯方面受蒙古民族影响较大，

<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概述（1970-1980）》，1982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118 页。

<sup>2</sup> [蒙] B. 贡嘎达希著，俄译者 A. B. 杜比宁、A. P. 林齐奈，辽宁外语专科学校俄蒙语系译：《蒙古经济地理》，据 1969 年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69 页。



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有所不同。从地域分布上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蒙古西部省份。

## (二) S. 巴达姆哈坦对蒙古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

蒙古国境内上古居民的民族起源和民族史、蒙古部族的形成,是蒙古国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对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一般要基于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对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群体、各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S. 巴达姆哈坦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区别、如何相互称呼、如何看待群体差异本质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各个维度,对于历史上持续发生在蒙古各民族部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都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分析。

### 1. 对主体部族——喀尔喀的确认工作

S. 巴达姆哈坦在喀尔喀部族的民族学研究中指出:“现在,对我国诸族群的民族起源、民族志写作还没有被研究。这类研究先应从占我国人口 80% 的喀尔喀人开始进行,因为喀尔喀部族在蒙古人的历史上是蒙古氏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自 16 世纪下半叶始,在封建社会时期众多蒙古部族的确立进程中拥有特殊地位,同时喀尔喀文化也是全体蒙古氏族民族文化的集合,以上为喀尔喀部族民族学研究的缘起。”<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明确提出喀尔喀部族是组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分,他从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双重研究中,对喀尔喀的称谓来源、喀尔喀部族的形成、确立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他将研究中所记录的氏族部落名称与喀尔喀内部的氏族血缘关系相联系,认为喀尔喀人在 18-19 世纪之间与邻族组成大家族,并沿用了早期蒙古人的主要姓氏,将他们的经济、物质与精神文化都作为民族文化统一体的构成因素。对于“喀尔喀”的称谓来源,S. 巴达姆哈坦认为,“喀尔喀”第一次出现于 14 世纪后半叶至 15 世纪初,即达延汗统治时期蒙古左翼六万户中的“喀尔喀万户”。关于“喀尔喀”的原始含义,他写道:“‘喀尔喀’一词有三个含义:一、山水地名(喀尔喀悬崖),二、人的脸颊,三、具有‘喀尔喀化’、‘喀尔喀’的含义。但这是否与氏族、血缘关系相联系,在《蒙古秘史》、《史集》等主要文献中没有定论,由此看来,一些学者认为‘喀尔喀’是氏族、联盟的名称一说,是值得怀疑的。”<sup>2</sup>他将喀尔喀的称谓来源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元朝灭亡后蒙古人回到原来地域,重新建立政权,称为“喀尔喀”;二、达延汗的九子格埒森札汗继承了父亲的领土和子民;三、喀尔喀万户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出现了“халх”、“халхавч”、“халх түшиг”、“харуул халх”等词汇。<sup>3</sup>在对喀尔喀部族的形态、确立的讨论中,S. 巴达姆哈坦持有这样的观点:喀尔喀作为地域和文化上的民族共同体并不是 16 世纪中叶才形成,而是民族觉醒、联合的过程,从喀尔喀万户到喀尔喀七部,再到更小的鄂托克单位,大多是 13 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主要氏族部落。<sup>4</sup>

对于喀尔喀与当今蒙古国的关系,蒙古国学者和我国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蒙古国学者认为,喀尔喀就是蒙古民族的中心部分,从而证明蒙古国的历史就是蒙古民族的历史,为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寻找依据,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800 周年庆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论调。中国学者则认为,喀尔喀是 14 世纪后才出现的。达延汗时代,是蒙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鉴于蒙古政治生活中长期出现的社会动荡局面,达延汗执政以后,决定进行社会改革,他在蒙古地区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这六个万户又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津万户和永谢布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大汗直接统治,右翼三

<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民族志导言》,《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三卷本,第一卷,乌兰巴托 1987 年,第 4 页。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49 页。

<sup>3</sup>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50 页。

<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51 页。



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除了兀良哈外，达延汗把其余五个万户都封给自己的儿子领有，这就大大加强了大汗的封建集权地位。达延汗的五子阿尔苏博罗特和九子格呼森札共同领有喀尔喀万户。<sup>1</sup>阿尔苏博罗特统率内喀尔喀五部，格呼森札领有外喀尔喀七部，外喀尔喀七部一直驻牧于哈刺和林一带，S.巴达姆哈坦在文章中所讨论的“喀尔喀部族确立过程”，实际为格呼森札从达延汗手中继承的统治区域，他认为喀尔喀部族的确立基础是自16世纪中叶以来，格呼森札及其子孙喀尔喀七部和喀尔喀三部汗，这为喀尔喀部族的成立打下了地域、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基础。17-20世纪之间，喀尔喀部族又具有了封建社会的民族特征，形成了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sup>2</sup>S.巴达姆哈坦对喀尔喀部族集体性身份认同的论证，是将族群的、文化的因素与社会阶级认同的历史阶段性相联系而形成的，因为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阶级身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认同身份。<sup>3</sup>他进一步指出，促成喀尔喀部族形成的条件主要有三个：“喀尔喀蒙古”在全体喀尔喀人的意识中形成了地域统一的概念；喀尔喀地区有统一的经济、物质与精神文化；为了国家的独立解放，封建社会时期诞生的国家观念变成了民族统一紧密团结的观念。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比较来看，S.巴达姆哈坦也将族群认同纳入领土、经济、文化范畴，但他尤其强调了喀尔喀部族确立的政治含义，通过政治上的民族认同加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社会基础，将其视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族群。

### 3. 对少数民族群的确认工作

除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以外，S.巴达姆哈坦对蒙古国境内许多民族部族都进行过详细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与《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共同构成了对“蒙古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题的论证。其中包括《库斯古勒省驯鹿人（乌梁海人）的起源问题》（1960年）、《关于阿尔泰乌梁海的婚姻习俗》（1960年）、《乌布苏省的和屯部族》（1990年）、《卫拉特民族的族源历史概述》（1993年）、《明阿特部族情况》（1993年）等。蒙古国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群是哈萨克、和屯、驯鹿人、乌兹别克、图瓦等突厥语族民族，他们是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确立蒙古民族构成问题，S.巴达姆哈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结果，从氏族起源、物质和精神文化等角度指出了蒙古民族文化存在的联系与共性，理解和分析蒙古国境内的族群历史、族群现象和族群界限。下文拟从蒙古国境内的驯鹿人研究入手，分析评价S.巴达姆哈坦在蒙古国少数民族群确认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人、驯鹿人中间开展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不仅收集了达尔扈特人、驯鹿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总体资料，还关注了氏族起源、氏族称谓、社会经济、游牧类型等问题。驯鹿人居住在蒙古国库斯古勒省的北部边境地带，在《蒙古秘史》和《史集》中称为“唐努乌梁海”和“萨彦乌梁海”，驯鹿人自称为乌梁海部族的畏兀尔（*урианхай угсааны уйгар*）。根据1935年统计，驯鹿人有40户人家、300余人口，1958-1959年减少为200余人口，他们饲养有400头左右驯鹿，其中主要生活在大森林中从事驯鹿业生产的人数仅为30余户人家，120余人口。在1956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包括对驯鹿人地区的统计。1956年后，当地人自愿成为蒙古国公民，开始投身于所隶属的苏木公社生产生活中，这使从事驯鹿业生产的人更为减少，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数逐渐增加。驯鹿人的族源与图瓦自治省（*Тува муж*）人口众多的托金人有密切联系，S.巴达姆哈坦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结论，对俄苏学者的观点做出判断：苏联学者近几年所做的田野调查，认为图瓦西部和中部人口，大部分保存着中亚传统，但东部驯鹿人则体现了贝加尔湖的特征。

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也赞同将驯鹿人分为两部分的观点。他记录了库斯

<sup>1</sup>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68—70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69页。

<sup>3</sup>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古勒省驯鹿人的体貌特征<sup>1</sup>，用自然科学为依据证明了驯鹿人的血统中加入了蒙古化的氏族与民族联盟。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林木中百姓在成吉思汗时代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在随后的700年间，其语言和文化发生了蒙古化，由此看来，苏联学者认为图瓦人在体貌特征上的变化很小的猜测是错误的。按苏联考古学家捷别茨（Г. Ф. Дебец）的分类，图瓦人的体貌特征属于萨彦特征（Сияны хэв шинж），他们不是源自同一个血统（种族），而是融入了曾居住在欧洲、亚洲的古代先民的血统。图瓦人通常被看作是西伯利亚突厥人的一支，然而和蒙古地区文化与历史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变得复杂。有些分析家认为，俄国和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记载故意地忽略图瓦和蒙古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作为俄国对这一地区提出主权要求的根据。然而，在事实上，作为16世纪以来各方竞相争逐的领土上的居民，图瓦人同时从突厥语族的吉尔吉斯人和蒙古的卫拉特人那里获取了文化的和遗传的基因特征。<sup>2</sup>由于驯鹿人与图瓦自治省的血统渊源关系，S.巴达姆哈坦对图瓦复杂的民族成分之论证，涉及了跨境民族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他们是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蒙古国也可以称作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

#### 4. 蒙日联合“三河计划”

蒙古国民族学界一般认为，三河流域的蒙古居民在蒙古民族起源和语言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三河流域蒙古人始终是形成的统一蒙古民族共同体最稳定的核心。<sup>3</sup>现代喀尔喀人基本上与现代三河流域蒙古人的族源相同，他们继承了三河流域蒙古人的基本地域，随着三河蒙古人附近蒙古语部族的并入，以及突厥语族部落也发生同化，加强了地域统一和部族的集聚。蒙古国学者利用他们的民间口头传说和文献史料研究三河流域蒙古人，就是为了证明古代喀尔喀蒙古就是古代蒙古的核心——三河蒙古人的后裔，以此确立喀尔喀蒙古在整体蒙古民族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蒙古国家意识形态的树立。

“三河计划”是蒙古国与日本联合提出的研究课题，具体实施于1990-1993年，主要目的在于寻找成吉思汗的陵墓，S.巴达姆哈坦是蒙古国一方的学术领导者，田野调查部门负责人。他很早便对该问题产生了兴趣，1985-1989年，他成立了“10-15世纪三河蒙古人的起源，历史，文化”研究部门，为孛儿只斤、泰赤兀等部族地域的详细确立、为寻找他们的墓葬工作，做了重要前期工作。其间，他在三河流域五次成立了考古学、民族学联合调查田野机构，推行了一些发掘工作，他结合其工作导师呼·普日来的观点，亲自勘察《蒙古秘史》中出现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地区，多次进行详细研究。1988年，他开始论证“三河计划”课题，在技术、交通、参与人员方面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90年开始执行。“三河计划”课题对三河流域地区做了一次历史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考察，发掘了蒙古帝国时期的25座墓葬。S.巴达姆哈坦用这项研究成果证明了蒙古先汗、贵族埋葬之“宝地”，埋葬圣主成吉思汗的“秘密之地”，位于肯特汗乌拉山盆地的推测。<sup>4</sup>蒙古国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从未间断对成吉思汗墓葬地点以及三河流域蒙古人的研究，蒙古国科学院院士呼·普日来早在契丹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就曾提出，室韦和三河蒙古具有直接遗传亲缘。三河流域的那部分蒙古人又衍生出一些与其亲近的氏族部落集团，构成了古代蒙古部族的核心。D.贡格尔、Sh.纳楚克道尔基也都曾经论述过，远古时候定居在鄂嫩河、克鲁伦

<sup>1</sup> “库斯古勒省的驯鹿人拥有宽阔的脸庞，头部短胖，眼部呈线性，小，眨眼频繁（аньсага хөгжсөн），直直的鼻子，鼻梁矮，嘴脸高，鼻翅宽，颧骨宽并隆起，粗而黑的直发，肤色为黄色、淡黄色、黄褐色、褐棕色，体毛稀疏，平均身高为男性158-162厘米，女性平均身高为153-155厘米。”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驯鹿人（乌拉海）族源问题》，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1页。

<sup>2</sup> [俄]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载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56页。

<sup>3</sup> [苏]X. Ц. 拉拉丁 Г. Г. 斯特拉塔诺维奇：《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载于《世界民族》1980年第6期，第30页。

<sup>4</sup> D. 策旺道尔基（Цэвээндорж）：《S. 巴达姆哈坦与蒙日联合“三河计划”》，载于《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20页。



河和土拉河谷地上的蒙古语族部落是喀尔喀部族的核心。可以说 S. 巴达姆哈坦领导的“三河计划”继承了蒙古国民族学、历史学的学术传统。

### 第三节 S. 巴达姆哈坦对蒙古民族族群关系的分析

S. 巴达姆哈坦不但对蒙古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考证，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民族关系的产生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他运用了人口普查数据，着重分析了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问题，并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梳理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民族在认同方面的变化。

#### (一) S. 巴达姆哈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工作

民族识别不仅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一项严肃而又艰巨的科学工作。这是由“民族”这一概念本身的科学规定性，以及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长期性、复杂性所决定的。民族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以及包括作为“民族”这个特殊的共同体所应具备的条件等，都属于民族学研究范围。民族识别无疑是属于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集社会实践性与科学性为一身的民族识别任务，历史地落在了蒙古国民族学工作者的肩上。

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家对科布多、乌布苏、东方、苏赫巴托、南戈壁省等地区进行了民族学调查，S. 巴达姆哈坦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民族学研究中，这对民族学调查方法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他曾提出，调查时要注意当地民族部族的分布，绘制地图；与访谈对象对话时，要对当地人的来源、原因、谁属于哪个部族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访谈对象的内心想法；与访谈对象谈话时最好能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评价。比如“本地区居民（族群、民族）对自己及该地区的命名”问题，“邻近的居民对此如何称呼”问题，“该地区的居民对邻近地区的民族如何称呼，其中有哪些内容涉及自身起源问题”，“该地区人群自认为隶属于哪个部族。访谈对象自己曾属于哪个氏族，氏族名称”问题等<sup>1</sup>。这都是民族划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在 1958 年蒙古—捷克合作组织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中，S. 巴达姆哈坦认为，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方法对氏族联系（尤其是分散独立居住的部族之间）的确定也有一定帮助<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通过对 1956-1963 年的人口普查与民族识别结果对比分析，指出了在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民族认同变化。他注意到，1956 年人口组成中共有 23 个部族，而 1969 年的人口构成中只剩 10 个部族。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总数却由 84.55 万升至 120 万。根据 1969 年的统计结果，以撒尔都拉、辉特、阿巴嘎、浩济特、哈莫尼干命名的部族已经几乎消失，乌梁海的人数较 1959 年有所减少。对此现象，他认为，这是以蒙古民族重要组成部分—喀尔喀语言文化为基础，确立社会主义蒙古民族国家民族一体化的明证。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的部族组成中有喀尔喀、杜尔伯特、巴雅特、土尔扈特、明阿特、布里亚特、达里岗嘎等具有人口规模的部族，这些部族从封建社会开始以民族独立统一的形式产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点。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政策对现代社会主义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作用，同时各部族的方言和独特文化也被民众意识所吸收。在有些地区，民众的不再发自身氏族名称为“姓氏”，而以新的民族一体化之名称作为“姓氏”的称谓。<sup>3</sup>其原因是，人民革命胜利后，扎布汗省一些苏木中有许多居民为了区分自己与喀尔喀人，自称为撒尔都拉人，然而后来又自愿改称为喀尔喀人，在巴尔虎、喀喇沁、达里岗嘎等部族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是在西蒙古杜尔伯特、巴雅特、扎哈沁

<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 页。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1958 年所做的人类学调查工作》，1959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17 页。

<sup>3</sup> “例如：在库斯古勒省、扎布汗省一些苏木中，辉特人占人口比例最大。1956 年为 1368 人，然而 1963 年仅变成 151 人，而喀尔喀人占该部族人口比重的 99%。”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额鲁特、明阿特、土尔扈特等部族中，仍然普遍存在着依据氏族起源为姓氏的传统说法。<sup>1</sup>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自我认同变化的研究，证明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民众意识中发生的民族一体化思想。

## （二）新型民族关系的产生

通常来讲，衡量民族关系有以下几个变量：1. 文化，尤其是语言宗教的文化差异；2. 社会交往或社会结构的相互进入（实质性的渗入）；3. 通婚；4. 族群意识；5. 偏见；6. 歧视；7. 观念与权力冲突。<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通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对蒙古现代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新型民族关系，其中包括族际通婚、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以及各民族部族在文化方面形成意识形态的统一。

### 1. 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能够深刻地反映族群关系深层次的状况，这是因为族群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观念之中，从而使人们把周围的人群区分为“同族”与“异族”两类。每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为“可以接受”和感到十分亲近的时候，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她）缔结婚姻的问题。两族成员之间的通婚愿望，是得到本族人群体的支持还是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当两个民族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达到一致或者高度和谐，两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sup>3</sup>

S. 巴达姆哈坦根据 1969 年人口调查材料，对乔巴山省 19 个部族代表，共 1718 户家庭（没有丈夫或妻子的家庭排除在外）进行统计如下：喀尔喀—喀尔喀为 69%，喀尔喀—布里亚特 2%，布里亚特—布里亚特 59%，布里亚特—喀尔喀 41.2%，巴尔虎—喀尔喀 1%，达里岗嘎—喀尔喀 2%，同时杜尔伯特—喀尔喀，明嘎特—喀尔喀，额鲁特—喀尔喀，乌梁海—喀尔喀，达尔哈特—喀尔喀，扎哈沁—喀尔喀等部族间也有通婚。从该指标中，未能与同族女性结为夫妻，而与异族女性组成家庭的情况来看，喀尔喀 4.7%，布里亚特 2.6%，巴尔虎 1.7%，乌珠穆沁 1.6%，达里岗嘎，杜尔伯特，达尔哈特，扎哈沁。

以科布多省为例来看（共 1022 户家庭，14 个部族），喀尔喀—喀尔喀 50.8%，喀尔喀—扎哈沁 2.5%，喀尔喀—明嘎特 1%，扎哈沁—喀尔喀 2.5%，扎哈沁—扎哈沁 9.1%，明嘎特—明嘎特 3.7%，土尔扈特—土尔扈特 1%，哈萨克—哈萨克 9.7%，除此以外，喀尔喀—杜尔伯特，喀尔喀—明嘎特，喀尔喀—土尔扈特，喀尔喀—巴雅特，明嘎特—喀尔喀，明嘎特—扎哈沁，土尔扈特—喀尔喀，土尔扈特—扎哈沁，土尔扈特—额鲁特，乌梁海—喀尔喀，哈萨克—乌孜别克，哈萨克—额鲁特，巴雅特—额鲁特，和屯—杜尔伯特部族间也有通婚情况。与其他部族女性组成家庭的有：扎哈沁 10.2%，额鲁特 7.0%，喀尔喀 5.1%，明嘎特 2.4%，土尔扈特，乌梁海，哈萨克，乌孜别克，杜尔伯特 1.5%。<sup>4</sup>

在 S. 巴达姆哈坦看来，族际通婚体现了民族一体化中产生的新现象：人们的观念中遵循氏族、亲族、民族的观念逐渐消失，在亲族和民族的立场上互相视为异乡人，而产生仇视和怀疑的现象也不复存在，外来人口来到当地城市，与当地居民在风俗习惯上已经没有区别，逐渐自认为属于该城市，表现出同一城市统一思想，在组成家庭时，部族关系并不重要，在家庭中子女的族

<sup>1</sup> “例如：1956 年杜尔伯特人口 2.56 万，土尔扈特人口 0.47 万，1963 年时杜尔伯特人口为 3 万，而土尔扈特人口达到 0.6 万。”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sup>2</sup>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55 页。

<sup>3</sup>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166 页。

<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属按父亲的部族或当地主要居民部族的情况几乎占了 100%，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民族种族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sup>1</sup>

这些人口统计数据，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S.巴达姆哈坦利用人口普查材料，从统计学意义上对蒙古民族一体化做出了有力论证。

## 2. 民族融合（харилцан ижилсэх）与同化（нийлэх）现象

通过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S.巴达姆哈坦注意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部族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现象，“如果说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民族或部族，那么同化现象则主要发生于不同民族或部族中”。<sup>2</sup>民族同化表现在“两个不同族源的部族共同生活几百年，一个接受了另一个的语言、文化，却保留了自身部族的意识观念。”<sup>3</sup>在民族融合和同化现象深处，反映了民族意识与族群关系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在 S.巴达姆哈坦看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喀尔喀、哈萨克部族语言文化的发展为依托，其他部族与这两个部族发生融合、同化，逐渐形成两个基本民族共同体，其一：由杜尔伯特、巴雅特、额鲁特、扎哈沁、土尔扈特构成的共同体，其二：由喀尔喀及其所包含的族群构成的共同体。对 S.巴达姆哈坦提出的两个民族共同体，需要结合当时蒙古历史与当时整个蒙古历史来理解。这两个民族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东西蒙古，只是西蒙古加入了突厥语族的成分。在 14-17 世纪，一直发生着东西蒙古争取蒙古正统汗权的斗争，而东西蒙古在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了重新组合，S.巴达姆哈坦对两个民族共同体的论述，表达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西蒙古之间的斗争已经被新型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所取代。

## 3. 文化与族群的关系

S.巴达姆哈坦对文化与族群关系的论述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将传统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意识形成的核心，认为民间文化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精英文化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利器；二、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蒙古国各民族部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下，发展蒙古国民族部族的关系，目的在于消除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情况，统一各民族部族的意识形态，共同促进与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对喀尔喀部族文化进行探讨时，他将蒙古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和“黄教”区分开来，他认为尤其在 20 世纪初，“喀尔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虽然处在外来侵略者的压迫之下，条件非常严峻，但是保护创造历史的民族，发展文化的愿望，对于有创造力的劳动力，与东方其他受到压迫的民族一样，巩固了民族统一，发展了传统文化”<sup>4</sup>。在他看来，喀尔喀部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民族意识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民族独立而战斗思想的主要武器”<sup>5</sup>。

20 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主要以合作社牧民生活、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形成的进程作为主要研究目标。S.巴达姆哈坦认为，现代民族进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族群间推行氏族文化现象。古代各族群拥有各自的方言、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人民革命年间，尤其是畜牧业合作社化活动胜利后，人民个体户占第一位，成为牧民，在此后二十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主要阶级合作社员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民族文化发展进程，

2005 年，第 122-12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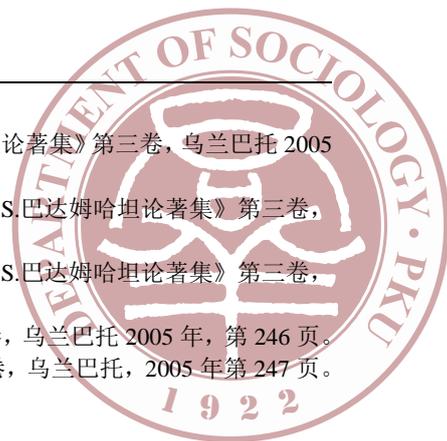
<sup>1</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122-124 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sup>3</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sup>4</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46 页。

<sup>5</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247 页。



迈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族关系，具有本质的独特性，“首先，我国有90%的人口属于蒙古民族，既有统一民族，也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民族问题并不尖锐也并不错综复杂。在人民革命年间，哈萨克、乌梁海、和屯等少数部族的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卓有成效，他们已成为社会主义蒙古民族家庭的平等成员。”<sup>2</sup>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推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以少数民族群为对象进行了制度性安排。举例来说，1940年，根据哈萨克、乌梁海人民的传统聚居区建立了巴彦乌列盖省，在该省成立了少数民族省党委、行政机构，由民族代表组成苏木、公社等。在少数民族群的教育方面，全省共有24所学校，出版了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刊行的省刊《新生活报》以及各种文艺书籍；在社会经济方面，巴彦乌列盖省成为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大省之一。S. 巴达姆哈坦认为：“这些并没有使部族间的意识关系更加尖锐，而是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语言上的联系，使它们达到同一水平，是拉近他们彼此关系的有利条件。”<sup>3</sup>他意识到这些制度性安排的积极作用，这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群成员利益的有效保障，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他赞成各民族部族知识分子视作对发展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提倡对多元民族文化的弘扬。<sup>4</sup>其实，S. 巴达姆哈坦强调弘扬多元民族文化，实际上是站在全体蒙古国人民保持“政治一体”的立场上所提出的观点。S. 巴达姆哈坦在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上指出：“全蒙古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各地缘蒙古人分支、蒙古人的各民族集团以及非蒙古起源的各小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作用和相互丰富的结果。语言发展过程和民族自我意识性质上的变化，标志着在蒙古社会主义民族形成过程中，地缘蒙古人分支在进一步聚合，并发生融合。方言正在消除，全蒙古标准语正在喀尔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原先那些地缘部落名称——它们只是作为一种残余或作为一种对其历史的回忆而存在于各民族集团代表人物的记忆之中——的作用的降低，说明在民族自我意识上正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一种属于蒙古社会主义民族的意识正在巩固。还可以看到小的民族共同体同较大的民族共同体融合的过程。”

#### 第四节 S. 巴达姆哈坦在学术上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群体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族群和身份认同。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人类群体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所以出现了“民族”（nation）的概念。<sup>5</sup>“民族”根植于政治的领域，任何民族主义思潮都具有基本的政治诉求，并且与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作为一名民族学家，S. 巴达姆哈坦从学术资源上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多层次蒙古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探讨了近代蒙古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民族统一带来的影响，将蒙古民族的历史置于20世纪初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完成了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学术建构。

##### （一）多层次系统的蒙古族群认同意识

“从部落到国家，民族意识在多层次系统的族群认同体系中，在人们心目中与行为中最核心、最重要的”<sup>6</sup>，S. 巴达姆哈坦对喀尔喀部族形成的论证中，梳理了民族意识形成与巩固的两个层级：

<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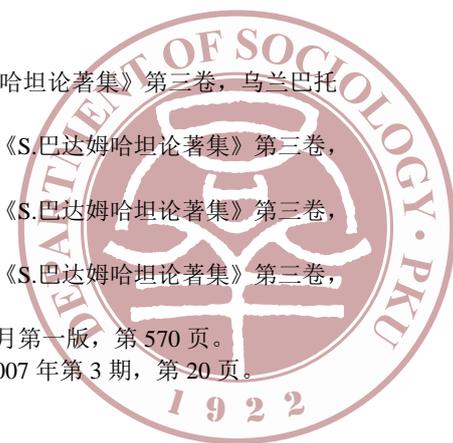
<sup>2</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2页。

<sup>3</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3页。

<sup>4</sup>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3页。

<sup>5</sup>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570页。

<sup>6</sup>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0页。



以血缘传承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部族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sup>1</sup>。他认为，“民族意识与族群关系的概念是自人类产生以来的传统社会现象，而在完成社会主义民族一体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消失，这个概念仅遗留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sup>2</sup>“这个概念”便是民族部族认同与血缘家族认同的意识。

17世纪三十年代，漠南蒙古各部完全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喀尔喀三汗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彼此协调，并联合卫拉特各部以防来自清朝的军事压力。清朝把蒙古地区划分为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两部分，外藩蒙古又有外札萨克蒙古和内札萨克蒙古之别。1688年，喀尔喀归顺清朝，属于外札萨克<sup>3</sup>。1691年的多伦诺尔会盟完全改变了喀尔喀三汗所分别统治的独立政治体制，增设札萨克，编审旗分和佐领，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统治，巩固了北部边防。<sup>4</sup>盟和旗本不是蒙古部所沿用的传统社会政治军事体制，而是应清朝对蒙古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新体制，在S.巴达姆哈坦看来，继格呼森扎统领喀尔喀万户以来，蒙古部落历来沿用的亲族联盟体制就逐渐被地域联盟的新体制所取代，“鄂托克”、“万户”、“旗”成为封建统治的稳定团体，促进了蒙古诸民族部族的联合，从而萌生了“统一全体蒙古民族”的“封建国家意识”。<sup>5</sup>

S.巴达姆哈坦认为，喀尔喀部族在17-20世纪之间完成了由内部氏族血缘关系认同到形成民族文化统一体的转变，拥有地域、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基础，具有封建社会的民族特征，由此形成了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这种认同意识的改变，明确和强化了以喀尔喀为代表的蒙古族群的边界，能够“推动以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行为”，民族与血缘并不一定有自然意义上的直接联系，但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S.巴达姆哈坦针对血缘氏族关系认同和封建国家意识认同的理解，提出了这两个层级认同的复杂性，认为喀尔喀政权虽然具有军事性质，和屯阿寅勒在社会和家庭范围内依然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关系，依据氏族和家族划分族群的传统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他认为喀尔喀人是古代蒙古人血统中的主要氏族，血缘关系是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的重要力量；喀尔喀地区也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的发源地，是蒙古人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故乡（祖国）”，为民族统一提供了客观条件；他将18-20世纪喀尔喀对抗清朝的战争，看作“为民族国家独立而开展的喀尔喀人民解放运动”<sup>6</sup>，这种观点为民族认同赋予了政治功能，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

## （二）对蒙古民族工业兴起的研究

“19世纪下半叶，西方英法国家发动了‘鸦片战争’，战胜了清朝，加强了对中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统治，在当地任意区域开展自由贸易，从此，蒙古地区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注意。”<sup>7</sup>用1840年鸦片战争来划分资本主义市场对蒙古地区的影响研究并不多见，而S.巴达姆哈坦在他的民族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探讨蒙古民族形成过程中提到这个重要因素，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S.巴达姆哈坦认为，鸦片战争使蒙古地区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趋势，对喀尔喀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与蒙古国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

蒙古民族的传统社会经济主要是一种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家庭手工业主要为畜牧业生产、生活服务，生产原料是现成的皮毛、奶类等畜产品，经过加工后供自家消费，或被迫提供给封建统治阶级享用。鸦片战争前，蒙古的商品市场尚未被外人打开，手工业规模小

<sup>1</sup> 在这里要注意中国学者与蒙古国学者对蒙古民族历史和蒙古国历史的不同看法。——笔者。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3页。

<sup>3</sup> “外札萨克盟无兵权，并受当地将军或办事大臣及参赞大臣节制。”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347页。

<sup>4</sup>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52页。

<sup>5</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60页。

<sup>6</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69页。

<sup>7</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6页。



而且分散，在整个蒙古地区的经济生产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学者一般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外国产品虽然仍没有完全打开蒙古市场，“但是，外国产品的冲击对蒙古幼稚的手工业部门的存在和发展，打击同样是沉重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廉价的工业产品，摧毁了我国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使蒙古和内地一起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sup>1</sup>在这个问题上，S.巴达姆哈坦站在蒙古国民族学家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重点关注了蒙古地区原有的传统民族工业如何蜕变为现代工业的问题。

他认为，虽然19世纪中期，达尔扈特部族的手工业还未从畜牧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具有辅助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性质，然而各种手工制品的生产已经逐渐以工业化生产为主。<sup>2</sup>在喀尔喀蒙古地区更是出现了种植业、手工业<sup>3</sup>、工艺品制造业<sup>4</sup>独立发展的倾向，“这成为当时新的、觉醒的、进步的事情”<sup>5</sup>。他不仅仅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来解释工艺品制造业的发展，更认为它具有“宗教和民间艺术形式独立的生产形态”。同时，他提出喀尔喀大库伦寺庙成为当地内外贸易中心，蒙古民族内部市场的发展特别为喀尔喀部族的统一带来了质变的新趋势。<sup>6</sup>

19世纪末，除官办企业外，蒙古还没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工业，只是在俄罗斯与清朝边境城镇有一些俄商经营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工厂。这些工场一般规模不大，利用当地劳动力进行畜产品加工，生产出的成品或半成品就地销售或运往俄国。俄国工商业者在蒙古投资厂的目的，并不是要将蒙古的封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他们所关心的是掠夺蒙古的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毫无助益，中国学者把这种经济类型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手工业经济”。<sup>7</sup>然而，在S.巴达姆哈坦看来，蒙古地区的商业具有繁荣的局面：大库伦、乌里雅苏台、彻辰汗盟的孛儿只斤将军贝勒旗西、东乔日、三音诺颜汗盟的达赖却音霍尔王旗等喀尔喀众旗、库伦寺庙，都出现了专门培训宗教艺术的手工业短期学校，对有天赋的年轻手工业者进行教育，同时，制作民间生活必需品、畜牧业产品的马鞍匠人、家庭木匠、制帽者、制靴者、打铁匠等人都集中在库伦寺庙和牧区，辅助畜牧业工作。不仅如此，在牧区例如库斯古勒省达尔汗旗等地区，出现了生产手工艺品的定居匠人。<sup>8</sup>其实，外蒙古的手工业主要分布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几个重要城镇，民族工业兴起的现象并不普遍，但是S.巴达姆哈坦将其纳入工业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强调手工业发展中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用这一独特性形成了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 （三）S.巴达姆哈坦眼中的“民族解放运动”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运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具有“单一政权与官僚制度”的“一块容易得到认同的领土及地域”，享有“一个共同起源的神话与历史”以及其他诸如语言和肤色等文化特征的人群，一个作为民族主义思想中坚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土基础主要是由殖民政权提供的。<sup>9</sup>以领土为基础，以推翻殖民政权为目的的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由此看来，以S.巴达姆哈坦为代表的蒙古国民族学家，将17世纪以来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至20世纪初外蒙古地区独立的200年间历史，视为“内受封建压迫，外受殖民统治

<sup>1</sup>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sup>2</sup>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23页。

<sup>3</sup> 家庭必需品、服饰、帽子、靴子等

<sup>4</sup> 金、银、铁艺、制作佛像工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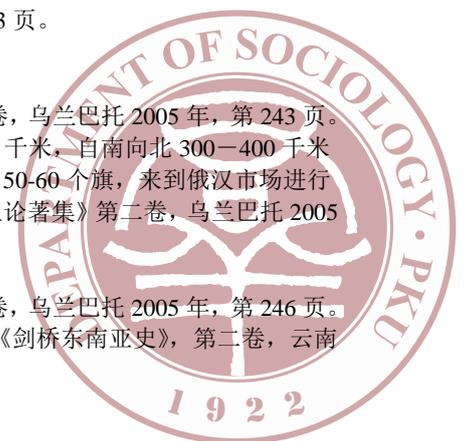
<sup>5</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3页。

<sup>6</sup> “仅对大库伦来说，根据历史学家Ц.Насанбалжир的研究来看，东西300—600千米，自南向北300—400千米的地区，是喀尔喀中心，在东西40余个旗内部形成了贸易市场中心，喀尔喀50-60个旗，来到俄汉市场进行贸易活动。”S.巴达姆哈坦著：《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5页。

<sup>7</sup>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39页。

<sup>8</sup>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6页。

<sup>9</sup>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胡华生、牛振明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10页。



的最艰难时期”，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称作“一个为国家地区独立觉醒，为民族发展扩大而斗争的时代”。<sup>1</sup>世界进入 20 世纪以后，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sup>2</sup>S.巴达姆哈坦认为，“由于蒙古地区被帝国主义国家视为竞争之地，高涨的反抗清朝运动演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新特点使该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sup>3</sup>

S.巴达姆哈坦对蒙古地区的历史研究，完全体现了“民族主义中的建国愿望”，他将源自血缘氏族民族意识认同转化为“民族意识”，力图在学术研究层面，为蒙古国（当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的政治实体，塑造“以喀尔喀人为主体的‘蒙古民族’意识”，论证独立的“蒙古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的合法性。以喀尔喀人为主体的蒙古民族，不但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也具备相对固定和公认的集中居住地（“领土”），其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各国蒙古学家所关注的焦点。S.巴达姆哈坦通过毕生努力，从历史、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论证了蒙古民族的“族群特征”，并对其赋予了潜在的政治含义，在对蒙古民族发展历史的写作中，逐步完成了一个民族学家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 结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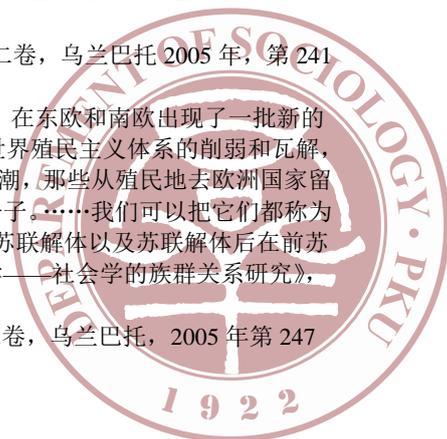
S. 巴达姆哈坦先生是蒙古国最重要的民族学家之一。自留学苏联以来，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在蒙古国内外的学术界传播，成为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民族学家。他在蒙古国民族研究实践和民族学学科建设事业中，为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的学术事业从民族学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开始，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从书斋中汲取知识，而注重实地考察，力求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社会的全貌，这是将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可贵尝试。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学本身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S.巴达姆哈坦积极参与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不但对蒙古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蒙古国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民族学家，他积极投身于政府边疆建设部门的筹建工作，于 1972-1977 年间担任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中央委员第二秘书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大呼拉尔第八次选举中，当选为库斯古勒省人民大呼拉尔代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七次大呼拉尔中，当选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S. 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重视，可以说是对蒙古国现实社会迫切需求的关怀，在他毕生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他为祖国的命运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对于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的界定，我认为，他在学术上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其民族学思想的核心。他的民族志书写，为这一思想提供了最佳注脚。

S. 巴达姆哈坦在苏联的留学经历，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定型时期。他最关怀的是如何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建构，以及蒙古国境内各民族部族如何面临现代文明挑战的问题。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解边疆民族的情况成为蒙古政府当局的迫切需要，S. 巴达姆哈坦凭借一名民族学家的职业精神，深入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严格按照田野调查的要求，把各少数民族群

<sup>1</sup>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41 页。

<sup>2</sup>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到欧洲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称为第三类即‘解放型’的‘民族—国家’。……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 90 年代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第一版，第 573—574 页。

<sup>3</sup>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247 页。



的民族志纳入特定的时空坐标。他既是田野调查者，又是民族志的作者、民族学理论的探索者，他在民族志写作中（以《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为例），不仅能够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力求“完成‘解释的解释’和描写民俗生活的生态和民俗传承”<sup>1</sup>，而且逐步在民族形成、民族关系、游牧文明的传统与变迁、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等方面，完成了一名民族学家在学术上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蒙古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中，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具有奠基性意义和深远的作用，笔者通过对其进行整理，可以得出以下思路：

### 一、民族起源与民族关系

蒙古国境内的民族构成，实际上包含了历史经验非常不同的多民族来源，S.巴达姆哈坦用田野调查资料作为对文献史料的补充和佐证，深入了解了这些复杂的多民族起源问题，力图澄清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不同方式，被整合到“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研究中，他强调将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相结合，探讨了诸民族部族如何在“统一国家”的权威下，保持自身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问题。S.巴达姆哈坦在关注各个民族志写作个案的同时，又将蒙古国境内民族部族的氏族起源、物质和精神文化等作为完整的集合体，以阐述各族群之间的渊源与交往关系，证明了跨境民族是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论证了蒙古国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的命题。

“民族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政治统一，而政治的统一则倾向于同社会的统一融为一体。解决传统民族差别问题的习惯方式是同化或涵化，另一种解释传统民族差别的方式是发展多元形式。”<sup>2</sup>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关系现状开展研究时，除了理清古代蒙古史上不同民族部族的族源关系问题，更侧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多民族、多部族文化如何被吸纳到小民族共同体，小民族共同体（达尔扈特人、驯鹿人、和屯人等）又如何融入大民族共同体（喀尔喀蒙古人）的过程。他将这些民族部族的文化层次置于不断更新的动态之中，提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生了新型民族关系：蒙古国的民族在古代确立的关系格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重新组合，同时一个以喀尔喀部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完全形成。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方面，比较注重对某个少数民族的单位研究，相比之下，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却更侧重于民族关系的相互影响研究，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 二、传统民族意识与现代民族认同

“在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这两个层次之间，人们的意识甚至需要有某种断裂带似的跳跃，而不一定是简单的过渡。从传统民族意识进到高一层的现代民族意识，不完全是量的积累过程，而可能需要某种质的飞跃。”<sup>3</sup>S.巴达姆哈坦有意识地对蒙古国民族的主体——喀尔喀共同体的形成进行历史性论证，并结合17—20世纪以来的喀尔喀历史，在反复论证中完成了民族意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形成过程。他明确提出，喀尔喀部族是组成蒙古民族（这里的蒙古民族应该指蒙古国的民族，而不是包括中国内蒙古在内的世界上的所有蒙古人的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是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共同体，是使蒙古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族群。他通过论证喀尔喀部族在蒙古民族的核心地位，证明了蒙古国的历史就是蒙古民族的历史，为建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寻找依据。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以及沙俄和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为蒙古地区的疆域形式带来了所谓“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民族学”的涵义也在此时被赋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内容，成为

<sup>1</sup> 陈岗龙：《蒙古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与民俗志写作的反思》，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第17页。

<sup>2</sup>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63页。

<sup>3</sup>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63页。



界定国家历史的有效工具，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塑造提供了合法性。S.巴达姆哈坦对喀尔喀民族共同体确立的论证，使其成为“现代国家话语的忠实表达者”，然而他在关注精英层面的声音以外，也同样重视族群认同意识在“民间”的表述。由此可以看出，S.巴达姆哈坦用学术研究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统一了“民间”与“官方”的界限，使人们形成对“民族国家意识”毫无保留地认同，并在持续不断的积淀中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解放运动”。

### 三、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

蒙古国（原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较之其内部传统民族悠久的历史，是相对短暂的，各个传统民族部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依赖于国家的统一和整体社会的进步。以民族学家为代表的文化精英阶层，必须要在思想上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做出奠基工作。我们应看到，S.巴达姆哈坦从民族学角度对蒙古历史的研究，其着重点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意义，在“在解释框架的意义上立足于现代社会”，为传说中的历史找到了科学依据。他将历史事件与现代意义的阐述交织在同一话语中，从而强化了各民族部族（尤其是缺乏编年史材料的少数民族部族）的认同心理，这就是“历史性建构”对现代国家、现实民族共同体的意义。S.巴达姆哈坦像史学家一样从内部观察蒙古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轨迹，尤其结合了近现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巩固了“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他为蒙古国“民族学”所做的贡献，加深了蒙古人的历史意识，而无论“民族学”还是“历史学”的编纂，都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建。1981—1995年间，S.巴达姆哈坦负责出版了三卷本《蒙古国民族志》（第一卷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2003年，蒙古国博物馆馆长A.敖其尔教授又负责编辑出版了五卷本《蒙古史》，他曾经指出：S.巴达姆哈坦对氏族和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为撰写民族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些民族学和史学著作，对蒙古国众多民族氏族起源、民族历史、民族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蒙古民族发展的内部规律问题，从而论证了蒙古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实体的历史过程。以族群为对象建构的关系是历史性的，学者们通过对族群关系的历史重构，完成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

现代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按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个社会从前现代性质到现代性质的转变，对于传统民族的影响是最大的。”<sup>1</sup>蒙古国的现代民族发展过程，居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是S.巴达姆哈坦非常关注的问题。蒙古地区自近代以来，大抵经历了从畜牧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发展途径，其经济形态也从分散落后的畜牧业，发展为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商品经济。S.巴达姆哈坦用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资本主义市场进入蒙古地区的划分依据，认为传统家庭手工业在这个历史时期，逐渐蜕变为现代蒙古民族工业。S.巴达姆哈坦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对游牧文明的传统与变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切实关注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带来的巨变。

S.巴达姆哈坦毕生致力于蒙古国多民族历史与发展现状的研究，在实践经验中，他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相结合，着重表达了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抛开S.巴达姆哈坦的政治立场，我们应该对他毕生所付出的学术劳动给予肯定，“政治”这一范畴难以涵盖他的学术价值，其民族学思想和治学精神，为蒙古国民族学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蒙古现代民族国家与蒙古民族的历史之间，铸造了割裂不断的“血缘联系”。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专著、译著：

1. 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

<sup>1</sup>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57页。



2.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
3.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
8.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
9.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 杨昌儒：《民族学纲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
13.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何锐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
16. 大卫·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
17. [波斯]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18.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20. [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编，高丙中等译：《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
21. [蒙] Б.贡嘎达希著，俄译者 А.Б.杜比宁、А.Р.林齐奈，辽宁外语专科学校俄蒙语系译：《蒙古经济地理》，据1969年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
22. [苏] 伊·亚·兹拉特金著，陈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72年。
23. [苏] P.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据1934年版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
24. [俄] 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焄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25. [俄] 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的民族关系》，载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26. [苏] C.A.托卡列夫著，汤正方译：《外国民族学史》，据1978年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7. [苏] Ю.Б.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
29. [日] 松原正毅著，杨海英审译，赛音朝格图译：《游牧世界》，民族出版社，2002年。
30. [新]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胡华生、牛振明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1.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2. [英] 爱德华·B.泰勒著，连树声译：《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3. [英] 马凌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

## 二、中文期刊论文：

1. 陈岗龙：《蒙古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与民俗志写作的反思》，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2. 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3. 高丙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培养扎实的民族志基本功》，《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4.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 马克继：《历史民族学与民族历史学简论》，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 [澳] 麦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
7. [苏] X.И.拉拉丁 Г.Г.斯特拉塔诺维奇：《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载于《世界民族》，1980年第6期。
8. [苏] Ю.Б.勃列姆列伊著，汤正方译：《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世界民族》，1980年第2期。

## 三、蒙古语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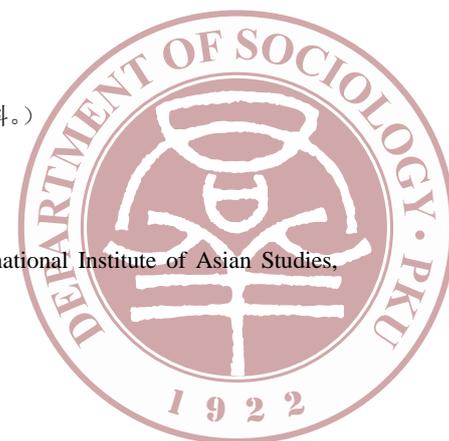
- S. 巴达姆哈坦：《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三卷本，乌兰巴托，出版于2002年、2004年、2005年



1.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алгаа хийх арга барилын тухай (1958) 《关于民族志研究的方法》
  2. С.Бадамханан. 1958 онд хийсэн хүн судлалы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ил (1959) 《1958 年的人类学调查工作》
  3.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үндэсний хувцас (1959) 《蒙古民族服饰》
  4.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Алтайн урианхайчуудын хуримлах зан үйлийн тухай (1960) 《关于阿尔泰乌梁海的婚姻习俗》
  5.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 аймгийн цаатан (урианхай) ардын гарлын асуудалд (1960) 《库斯古勒省驯鹿人(乌梁海人) 族源问题》
  6.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Увсын хотон нарын галын асуудал (1960) 《乌布苏省和屯人的族源问题》
  7.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Увс аймгийн хотон нарын гарлыг овгийн үлдцээр судалсан нь (1960) 《从民族的遗留资料看乌布苏省和屯人的族源问题》
  8.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ны гарал угсааны асуудалд (1961) 《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族的族源与族属问题》
  9.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цаатан ардын аж байдлын тойм (1962) 《库斯古勒省驯鹿人的生活情况概述》
  10.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 орны угсаатны зүйн судлалын байдлаас (1962) 《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
  11.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Дархад ястны хар дархад, илжгэн, хоролмай овгуудын гарал угсаа, түүхийн асуудал (1964) 《达尔扈特部族中 Har Darqad、Yiljigen、Qorolmoi 氏族起源和历史问题》
  12.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Дархад ардын дээл (1964, Х.Нямбуугийн хамт) 《达尔扈特部族的民间服饰》(与 Х.Нямбуу 合著)
  13.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 аймгийн Мандал нэгдлийн түүх 《库斯古勒省曼德勒公社史》
  14.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ан (1965) 《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15.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алх ястны угсаатны байдал (1968-1970) 《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
  16.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оржигин найрын дэг ёсноос (1969) 《孛儿只斤的宴会习俗》
  17.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оржигийн халх (1972) 《孛儿只斤喀尔喀》
  18.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НМАУ-ын үндэстний ба угсаатны хөгжлийн асуудал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和部族的发展问题》
  19. С.Бадамханан. Өнөөгийн монголын өрх гэр (1973) 《今日蒙古家庭》
  20.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Элжгийн газар усны нэр, холбогдох зарим домог (1973, Г.Лувсаны хамт) 《Yiljigen 的地名、相关传说》(与 Г.Лувсан 合著)
  21.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ний хувцасны түүхэн асуудалд (1974) 《蒙古民族服饰的历史问题》
  22.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ын газар усны домог (1974, Х.Сампилдэндэвийн хамт) 《蒙古地名传说》(与 Х.Сампилдэндэв 合著)
  23.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АНХ-аас үндэстний асуудлын талаар явуулсан бодлого (1980) 《蒙古工人统一联合会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
  24.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н судлалын товч тойм/1970-1980/ (1982)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概述 (1970-1980)》
  25.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хөгжлийн явц (1982)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发展进程》
  26.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Алтайн урианхай (1990-) 《阿尔泰乌梁海》
  27.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Увсын хотон ястан (1990) 《乌布苏省的和屯人》
  28.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Ойрад угсаатны угсаа-түүхийн тойм (1993-) 《卫拉特部族的族源历史概述》
  29.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янгад ястан угсаатны байдал (1993-) 《明阿特部族情况》
    -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三卷本,(第一卷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
-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боть1) . У. Б. 1987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боть2-3) . У. Б. 1996
- “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лал” 《民族志研究》
  - “Угсаатан судлал” 《民族学研究》
- (以上两部为蒙古国科学院学术期刊, 主要作为查看蒙古国民族研究的学术资料。)
- Монгол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н удиртгал. У. Б.1992  
 《蒙古民族学导论》, 乌兰巴托, 1992 年。

#### 四、英文文献:

1. Anatoly. M. Khazanov and Andre Wink, *Nomads in the Sedentary Worl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1.
2.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1986.
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3.



4. David Theo Goldberg, *Modernity, Race, and Morality, Cultural Critique*, No.24.(Spring, 1993), pp. 193-227.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5. Fujiko Isono,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0, No.3. (1976), pp. 375-394.
6. George G. S. Murphy: "Planning i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8, No. 2. (Feb., 1959)
7.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nman,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New York, 1999.
8. William Ballis: "Soviet Russia's Asiatic Frontier Technique: Tana Tuva", *Pacific Affairs*, Vol. 14, No. 1. (Mar., 1941)

**专有名词对照表:**

Монгол хэлтэн	Mongolian group	蒙古语族
Түрэг хэлтэй угсаатан	Turkic group	突厥语族
Угсаатны судлал	Ethnology	民族学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Ethnography	民族志
Угсаа-нийтлэг	Ethnic community	民族共同体
Угсаатны интеграци	Ethnic integration	民族一体化
Угсаатны бүлэг	Ethnic group	族群
Угсаатан	Ethnicity	种族
Үндэстэн	Nation	民族
Хүн судлал	Anthropology	人类学
Ястан	Tribe	部落、部族
Овог	Clan	氏族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	Fieldwork	田野调查
Явуул судалгаа	Journal study	旅行研究
Сэдэвчилсэн судалгаа	Theme selection study	特定研究
Монографи судалгаа	Monography study	专题研究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57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